

# 中共党史资料

71

总第七十一辑

1999年9月出版

第一次全国普选和人口调查登记文献选载

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胡耀邦在黄湖干校

忆1992年智利总统艾尔文访华

江阴要塞策反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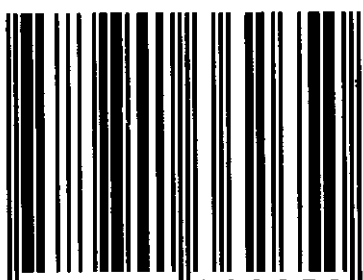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

解放战争时期的傅秋涛

瞿家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ISBN 7-80136-265-9



9 787801 362650 >

ISBN 7-80136-265-9/K · 231

定价: 10.00 元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刘荣刚

责任校对:邹祖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7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9

ISBN 7-80136-265-9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181 号

## 中共党史资料(71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60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

ISBN 7-80136-265-9/K·231

定 价:10.00 元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目 录

## 文献资料

第一次全国普选和人口调查登记文献选载…………… (1)

附:第一次普选和人口调查登记的基本情况…………… 周玉文(29)

## 回忆录

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黎 白(33)

忆济南战役…………… 王济生(61)

胡耀邦在黄湖干校…………… 杨春祥(73)

忆1992年智利总统艾尔文访华…………… 朱祥忠(82)

## 专题资料

江阴要塞策反经过……………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93)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和在华外国

资本的政策…………… 刘志光(101)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制度,推翻“两个估计”…………… 黄如军(116)

## 人物介绍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 丁敏京(135)

解放战争时期的傅秋涛…………… 蒋 杰 谭允智(142)

会议介绍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章学新(153)

史实考证

“西北军委”实际是中央军委…………… 王健英(171)

地方党史

川南古蔺、叙永老区革命斗争历程  
…………… 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183)

译文选登

1736

中苏关系的转折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 马贵凡 译(190)

小资料

李敦白谈修订和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些  
情况…………… 程慎元 译(215)  
新中国军衔制概览…………… 谭 铮(221)

封面照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瞿家湾

# 第一次全国普选和人口调查 登记文献选载

## 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 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政务院第一百七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使全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必须做好登记选民的工作。而选民的登记,又必须以人口登记为依据。因此应在选举工作同时,举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以利选举工作的进行,并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

为完成这一工作,除颁发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表式及填写说明外,并作如下指示:

一、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必须结合选民登记同时进行。为免重复与遗漏,确定以公历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旧历五月二十日)二十四时为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计算标准时间。所有调查登记工作应于九月底前全部完成。各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应将所辖

地区人口汇总统计于十月底前报省、市；各省、市及中央直辖行政单位应将所辖区人口汇总统计于十一月十五日前报中央。

二、负责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的机构：中央由内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省（市）由民政厅（局）会同有关部门成立省（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在各该人民政府之下成立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受同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并为同级选举委员会办事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做好这次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除全体从事选举工作的干部应参加进行外，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还应根据实际需要，动员适当数量的教员、学生、人民团体的干部及其他人员在一定限期内，参加本地的调查、登记及汇总统计等工作。

四、各级人口调查登记机构及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应对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表式及说明等加以研究，掌握不重复、不遗漏、全面、确实的原则，做好调查登记工作。

五、在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前，必须展开广泛宣传，使人民彻底了解这次人口调查的意义和目的，以取得人民热诚的响应和支持。

六、调查时设调查登记站，无论采取户主到站登记的办法，或在必要时采取调查员逐户访查的办法，均应力求便利人民，在乡村尤应利用农事间隙，不得妨碍农业生产。

七、人口调查登记所需各项经费列入各级选举预算之内，由国库报销。所用调查登记各项表式，各省（市）应依据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格式，统一筹划，分别不同情况由省或交由专、县印刷。

这次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领导，认真检查督促，以保证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的顺利完成。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表式及说明附发。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

第一条 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做好选民登记工作,并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特举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

第二条 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进行之:中央由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组成,由内务部主持;省(市)由民政厅(局)、公安厅(局)、统计局(处)等有关部门组成,由民政厅(局)主持;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由各该人民政府直接主持,由各有关部门组成。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并在同级选举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应进行登记。

第四条 人口调查登记以户为单位:

一、凡家庭成员在一起住宿者,作为一户;

二、独身住居者,作为一户;

三、凡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山、农场、合作社、公司、工地、作坊、商店、医院、托儿所、教养院、收容所、寺院、教堂、船舶等单位内之人口,各以其单位作为一户。但上述各单位所属的分支机构和在外的宿舍以及在上述单位内居住的家庭,均应分别立户。

第五条 人口的调查登记按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所划



的选举区域设立调查登记站,采取户主到站登记的办法,必要时亦可采取调查员逐户访查的办法。

人民武装部队的调查登记,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办理。

国外华侨的调查登记,由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

驻外使馆领馆人员的调查登记及在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中服务的中国人的调查登记,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办理。

国外留学生的调查登记,由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统一办理。

**第六条** 确定公历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旧历癸巳年五月二十日)二十四时为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计算标准时间:

一、在标准时间以前调查登记的地区,应在标准时间后数日内,按照标准时间的人口实际情形进行校正。即:在调查登记后至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前死亡、婚出、迁出的人口,应予注销;在调查登记后至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前出生、婚入、迁入的人口,应补行登记计算。

二、在标准时间以后进行调查登记的地区,应按照标准时间的人口实际情形进行登记。即:在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后出生、婚入、迁入的人口,不予登记,在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后死亡、婚出、迁出的人口,仍按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前的情况,予以登记计算;但于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前迁出,于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后始到达新住所的人口,和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后全户迁出、未在原住所登记者,均应在新住所予以登记计算。如新住地已调查登记完毕,应补行登记上报。

**第七条** 人口调查登记的年龄,一律按周岁年龄计算,以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旧历癸巳年五月二十日)为计算年龄的标准时

间,不论在标准时间以前或以后进行调查登记,均自出生之日起至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周岁数计算年龄。不满一周岁的填“不满一岁”;满一周岁以上不足两周岁者填一岁,其余类推。

出生年、月、日一般以公历计算,不记得公历只记得旧历出生年、月、日者,即以一九五三年旧历癸巳年五月二十日为计算年龄的标准时间,按其旧历出生年、月、日计算。

第八条 人口调查登记采用调查登记常住人口的办**法**。每人均应在其常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人只能在一个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不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

在外人口同时予以登记,但计算总人口时,只计算常住人口。

一、本户人口临时外出公干、旅行、探亲、访友、跑生意、打短工、从事交通运输等,仍登记为常住人口。

二、本户人口外出参加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厂、矿山、作坊、公司、商店、医院、农场、合作社及建筑工地等工作学习不在家住宿者,登记为在外人口。在调查期间临时回家居住者仍登记为本户在外人口,在其工作学习地点登记为常住人口。

三、本户外出人口,不能判明其是否在外常住及行踪不明者:凡离家未超过六个月者,仍登记为常住人口;已超过六个月者,登记为在外人口。

四、业已迁出原住所尚未确定新住所及无常住所的人口,均在调查时所在地登记为常住人口,并在其迁移证或相当的证件上注明。

五、受轮流供养的人,以调查时所在之轮养户登记为常住人口。

六、在本户临时居住的人口另有常住所者,不予登记。

第九条 下列各种人口的调查登记规定如下:

一、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山、农场、合作社、公司、作坊、

商店、医院、托儿所、教养院、收容所等单位内经常住宿的工作人员、学生、受托儿童、收容人员及眷属等登记为常住人口；不在内经常住宿的上述人员在其经常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

二、建筑工地的职工、经常住宿工地者，在现住工地登记为常住人口；经常回家住宿者，在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但参加治河、筑路等民工，则一律在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

三、在训练班、干部学校等住宿的学员，如系轮训的在职人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则在原住所或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如系离职人员和招考录取人员，则在训练班、干部学校登记为常住人口。

四、医院、疗养院住院病人，招待所及旅店住客，在原住所或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未确定服务处所或另无住所者，即在医院、疗养院、招待所及旅店登记为常住人口。

五、监禁及劳动改造的人犯，由其执行机关办理登记，在其家中登记为在外人口。在拘留所拘押者，在其原住所或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无原住所或无家者，在拘留所登记为常住人口。

#### 第十条 人民武装部队人口的调查登记：

一、凡现役军人不论居住在军事机关以内或以外，均作为该军事机关内的常住人口，由军事机关办理登记。

二、现役军人的家属和雇用人员等非军籍人员，在军事机关内经常住宿者，作为该军事机关的常住人口，由军事机关办理登记，移送当地人口调查登记站，不计入该军事机关的总人口数内；不在军事机关内经常住宿者，在其常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

三、无军籍的随军服勤人员，由军事机关供给者，均作为该军事机关的常住人口，由军事机关办理登记；不由军事机关供给的服勤人员，一律在服勤前常住所或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

四、人民武装部队附设的机构，如军事工厂、子弟学校、医院、托儿所等，除现役军人按本条第一款办理登记外，其余人口按第九

条第一款办理登记。

五、保留军籍的非现役军人及县、区人民武装干部，在其常住所按一般户口进行登记。

六、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办理登记的人口，除规定移交当地调查登记站者外，一律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综合统计，移送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不计入当地的总人口数内。

第十一条 水上人口的调查登记：

一、凡以船舶为家的水上人口，按户口在其船舶所属之港籍登记为常住人口；港籍未定者，在调查时之停泊地登记为常住人口，并于登记后给予证明，以便检查。

二、凡陆上有住所仅在水上营生者（包括水上临时工人等），在其陆上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

三、公私轮船上的员工，在陆上有住所者，在其住所登记为常住人口，无住所者，在其轮船所直接隶属之公司登记为常住人口。

四、在外籍轮船上服务之中国籍海员，一律在其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

第十二条 游牧人口以其所属基层行政单位为常住地，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 外侨已取得中国国籍者、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者和外侨户中的中国人，均按一般户口进行登记。

第十四条 为防止人口调查登记之遗漏、重复及填写错误等弊病，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于人口调查登记进行中和完成后，如认为必要时，得举行抽查或复查，发现有错误时，即时予以纠正。

第十五条 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应将调查登记工作进行情况逐级上报。

第十六条 人口调查登记表在城市每户填写一份,送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无户口管理基础者可多填一份,存派出所)。在乡、镇每户填两份:一份存乡、镇,一份送县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如在技术上有困难时,亦可每户暂填一份,送县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县、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根据所颁综合表的要求,作一级综合统计,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底填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一份送省、市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一份直接送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各省、市及中央直辖行政单位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作二级综合统计,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填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两份送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

第十七条 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按照本办法进行人口调查登记有困难时,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拟订变通办法,报请省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施行。

第十八条 人口调查登记表应统一使用国家统计局所制订的格式,各地不得变更和增加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所用表格及说明,并加印该民族的文字。

## 中央宣传部关于普选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已于今年一月间通过决议,定于今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已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政务院已分别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

示》、《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文件。全国范围的普选工作即将开始进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因此,全党应当提起注意把这件事情办好。

为了把这次选举办好,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地认真地参加这次选举,真正达到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目的,就必须向人民群众进行深入普遍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明白实行普选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明白广大人民起来积极参加选举的重要性。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进行这样全国规模的普选,广大人民在这方面缺少经验,所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就更加重要。因此,必须把普选宣传工作看作是整个普选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把做好普选宣传看作是做好整个普选工作的前提。普选的宣传应力求最大限度的普遍和深入,以便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关于普选的宣传教育。

## 二、普选宣传的内容应着重下列各点:

1、应说明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说明它与过去的人民代表会议(在乡村是农民代表会)的不同,说明实行这一制度对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干部的作风、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的力量等各方面的重大意义;教育人民认识选举的重要性和选举权利的庄严性,每个依法有选举权的人都要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利,积极参加选举。

2、宣传和解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第一、应说明我们的选举的普遍性。说明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至于依法被剥

夺选举权利的人则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小部分。第二、应说明选举的平等性。我们的选举的平等性表现在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武装部队的成员与其他公民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选民登记等许多方面。同时应说明,为了使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阶层人民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及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对少数民族、城市和工矿区、武装部队及海外华侨加以适当照顾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的团结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加强的。第三、应说明选举法规定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实行直接选举,而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许多人民尚缺乏选举经验,因此,立刻采取完全直接选举的办法尚有很多困难,而在县以上采取间接选举的办法则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情况。第四、应说明选举法规定在县以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法,而在基层单位则一般地采取举手表决方法(条件可能时也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这完全是由于我国目前大多数人民尚不识字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3、应向人民群众说明进行选民登记的意义和目的,动员他们认真地对待选民登记工作。应说明选民登记的目的就是要正确无误地确定哪些人应当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应该剥夺选举权,以便不使一个应当有选举权的人误被剥夺了选举权,也不使一个应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非法窃取了选举权。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应对选民资格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什么样的人应该有选举权,什么人没有选举权,什么人应被剥夺选举权。这种解释工作应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若干选民资格问题的解答》去进行。应当教育那些依法享有选举权的人,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利,积极关心和协助选民登记,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提出意

见或提出诉讼,更要检举那些应当依法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防止他们窃取选举权的非法行为。

4、人口调查工作要和选民登记工作同时进行,所以在宣传选民登记的意义时,也要把进行人口调查的意义和目的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动员人民认真地对待人口调查工作。首先,要说明选民登记必须以人口调查为依据,所以只有同时进行人口调查工作,才能够很好地进行选民登记工作,保障那些依法应享有选举权的人获得选举权,防止那些依法应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窃取选举权,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选举工作的进行。其次,要说明人口调查也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这是国家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建设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就要知道全国男女劳动力的数目及其分布状况等等;在文化建设方面,就要知道学龄儿童的数目,每年人口的增殖和死亡的状况等等。我们国家的很多重要工作,都要以确实的人口统计为依据。所以人口调查无论对于目前的选举工作或今后的国家建设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5、教育人民认真地进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并对候选人名单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慎重的鉴别。说明这次选举的目的是要把坏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而为人民群众所极不满意的分子从各级政权机构中清除出去,而把人民自己认为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出来,代表他们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因此,应当教育人民按照这个原则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人当代表候选人,而把自己认为不适当的人从候选名单中毫不留情地去掉。应该把选举法所规定的候选人提名办法向群众交代清楚,并说明实际上应该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方式为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提出的名单一定要经过郑重考虑,经过这个方式提名就可以使候选人提名工作更有秩序地进行,并且可以更好地照顾到候选人的广泛代表性。应该向人民群众着重说明,



在代表候选人提名时,要注意到代表大会的广泛的人民代表性,即注意到各阶层、各民族都在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名额。尤其要注意选举适当名额的妇女代表,因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妇女在政治上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也才能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6、应该着重宣传在这次选举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保障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任何人在选举中都不许有强迫命令、压制民主、违法乱纪和营私舞弊的行为。应该说明选举法已有许多具体的规定,以保障选民的权利,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应该把选举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协助和监督选举工作之进行,说明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受理所属区域内对于选举中违法行为之检举和控告,对于选民名单的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正确的处理。这些人员之中,如有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人民群众有权加以检举和控告。

### 三、宣传的方式

1、各地报纸和广播电台对普选应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应当使普选的宣传在自己的全部宣传中经常占有重要的地位。省(市)以上报纸除发表对于选举法及其他有关文件的通俗解释和关于普选的报道外,并应组织一系列的文章,例如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主的观点,解释我国目前选举制度的各种特点,选民和选举工作人员应注意的各种问题等。省(市)以下报纸着重根据上述宣传内容进行通俗宣传。新华社应经常报道全国各地准备普选和进行普选的情形。各地杂志也应有计划地进行普选的宣传。

2、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应当把普选宣传当作一个时期内的最重要的任务,用作报告、演讲、召开小型座谈会及个别访问等方式,并按照上述内容,结合每一具体步骤,积极地进行宣传。为了使报

告员、宣传员正确地进行这一宣传,各地党的组织应当组织报告员认真进行关于选举法的学习,各地县委应召开宣传员代表会,布置普选宣传。各地省、市委和县委宣传部应编写供宣传员用的通俗宣传材料。报告员的报告工作也应在各级党委的统一布置下进行。

3、应当利用夜校、民校、识字班、互助组、集市、庙会、物资交流大会等场所,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普选的宣传,讲解选举法的内容。在选民登记日、选举日及庙会、集市,宣传员和群众宣传队应进行宣传活

4、各地文化馆、放映队、幻灯队、宣传队、读报组、收音站、屋顶广播等都应注意进行普选的宣传。

5、应当注意到用图画、大鼓、快板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各地文艺工作应注意创作这方面的作品。

6、出版社应注意出版有关选举的文件、宣传品。

四、普选的宣传工作应密切结合普选运动的实际步骤去进行。普选的步骤大致如下: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选举定于今年五月开始,今年十月底以前全部结束。十一月以后召开县、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再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各地应即进行关于普选意义及选举法内容的宣传,选举开始后,即应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群众宣传工作。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选举是整个普选工作的基础,这一段选举所占时间最长,任务也最繁重,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许多工作都要在基层选举中去做,做好基层选举工作就是做好整个选举工作的关键。因此,普选宣传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做好基层选举的宣传工作。在基层选举的宣传中,除了反复进行关于普选意义和选举法内容的宣传外,并应根据各项具体工作(如人口调查、选民登记、划分选区、提出和讨论候选人、举行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等)的需要去确定每个时期的宣传重点。基层选举宣传工作的主

要任务,就是使人民懂得怎样进行选举,懂得什么人有什么选举权,什么人没有选举权,懂得应当选举什么人,不应当选举什么人,为什么提出某某人作候选人,从而动员最大量的选民积极参加选举,保证基层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在基层选举结束后,各地应该继续配合县(市)、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去进行宣传工作。

五、普选的宣传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应即召集宣传、文教、文艺及出版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和制定普选宣传的具体计划,准备宣传品和宣传材料。党委宣传部应经常注意检查普选宣传的内容,以便保证普选宣传的正确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应当在普选宣传工作中将宣传网加以整顿,使宣传网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在普选宣传工作中,应力求避免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并注意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防止乱提口号乱作解释的错误作法。此外,基层组织的选举工作,适当农忙时期,因此,基层的普选宣传应注意生产季节,和生产宣传相结合,不得妨碍和影响生产。

六、全国区乡以上的机关干部和部队、学校应普遍在五月上半月用一周时间进行一次选举法的学习,学习的时间,由各地自行规定,适当掌握,原则上不得停止理论学习。学习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邓小平同志关于选举法的说明,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学习目的是使大家认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意义,明了选举法的基本内容及实行普选的大体步骤;对区乡干部则应着重进行民主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实行普选和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学习中除阅读文件外,并应进行一次讨论。为了帮助干部的学习,各地党政负责人应作一次关

于选举的问题的报告。

## 中央选举委员会转发北京市、 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 施细则(草案)的通知

各省、市选举委员会并各省、市人民政府：

(一)《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及《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两草案，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原则上加以批准。兹转发各省市参阅。

(二)按照选举法规定，各省市应否制定细则，可按实际情形决定。如无十分必要，可以不必制定细则，而对于选举法没有规定的若干问题，写一若干条的决议(名曰决定或细则均可)，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而后公布施行。这种办法的好处，可以避免写出与选举法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的指示相重复的许多条文，使人一看就明白本省本市有的一些什么特殊的和具体的规定，实行起来，更较便利。所以北京市和河北省两个细则草案只能作为参考，而不一定要照样地去草拟细则。

中央选举委员会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日

### 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草案)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第六十五条及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均依现行行政区划,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现驻本市的人民武装部队得单独进行选举。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区下辖有乡、镇者,其乡、镇应选出席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得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

第四条 凡现住本市、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一、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
- 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
- 三、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
- 四、精神病患者。

前列各款,均按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办理之。

第六条 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 第二章 选举委员会

第七条 在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下成立各该级选举委员会,办理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

市选举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区选举委员会由市人民政府任命之;乡、镇选举委员会由区人民政府任命之。

第八条 市、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的组织:

一、市选举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委员二十人组成之，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下设办公室，内分若干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

二、区选举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委员六至十二人组成之，下设办公室，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三、乡、镇选举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委员四人至八人组成之。

市、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由各该级选举委员会任命之。

第九条 市选举委员会的任务：

一、监督选举法及本细则的确切执行；

二、指导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的工作；

三、就选举法和本细则及其他有关文件，进行宣传；

四、组织训练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

五、制订选举工作计划，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六、受理对于选举中的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并作出处理之决定；

七、登记市人民代表大会之当选代表，公布代表名单，并发给当选证书；

八、其他有关选举事宜。

第十条 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的任务：

一、在各该所属区域内监督选举法及本细则的确切执行；

二、在市选举委员会统一布置下，就选举法和本细则及其他有关文件向各该所属区域内的人民进行宣传；

三、按照选民居住情况划定选区；

四、登记、审查并按选区分别公布选民名单；

五、分发选民证；

六、分编选民小组；

七、受理对于选民名单的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处理之决

定；

- 八、登记代表候选人名单，并按选区分别公布之；
- 九、规定选举日期及选举方法，召开并主持选举大会；
- 十、计算票数，确定当选代表，公布代表名单并发给当选证书；
- 十一、其他有关选举事宜。

第十一条 选举后，各级选举委员会须将关于选举的全部文件、公物，送交同级人民政府保存，并应迅速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选举委员会作选举总结报告。

第十二条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全部完成后，选举委员会即行撤销。

### 第三章 选民登记

第十三条 选民登记工作，由区、乡、镇选举委员会按所划选区设立选民登记站办理之。

第十四条 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选民在其住宿所在地的选区进行登记，如选民的工作、学习与住宿处所分在两个选区以上者，得在其工作或学习所在地之选区参加选举，但须取得其住宿所在地的选民登记站之转移证明。

人民武装部队之随住家属及无军籍的雇用人员，持本部门证明文件，至所在选区选民登记站进行登记。

驻京外国使、领馆之中国员工，除在本市另报正式户口者外，得持外交机关的证明，在当地选民登记站进行登记。

第十五条 选民按照选民登记表登记之。

选民登记站由选举委员会所组织的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在各该选区选民参加之下，负责审查选民资格。

第十六条 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三十天以前按选区公布之。

选民名单依照所划选区的街巷门牌或房屋座落次序排列之。

登记截止后，选举前，选民如有特殊原因而未登记者，得向区

或乡、镇选举委员会申述理由，经审查认可后，补行登记并公布之；选民变更住址者，应向区或乡、镇选举委员会办理转移手续，领取转移证明书。

第十七条 选民名单公布后，应由选民小组在选举委员会领导下，审查讨论。凡对公布之名单有不同意见者，得向区或乡、镇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区或乡、镇选举委员会应于五日内作出处理之决定；申诉人如对处理意见不服时，得向人民法庭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庭或区人民法院应迅速进行审理。人民法庭或区人民法院之判决，即为最后决定。

第十八条 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前填写选民证，分发选民。

#### 第四章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九条 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在二千以下者选举代表十五人至二十人；人口在二千至五千者选举代表二十人至三十五人；人口在五千以上者得多于三十五人，但最多不得超过五十人。

各乡的代表名额由区人民政府分别规定之。

第二十条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在一万以下者选举代表二十五人至三十五人；人口在一万以上者得多于三十五人，但最多不得超过五十人。

各镇的代表名额由区人民政府分别规定之。

第二十一条 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按人口每五百人至二千人选举代表一人。但代表总数最少不得少于三十五人，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人。

各区的代表名额，由市人民政府分别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人口每五千人选举代表一人。

各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应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市



人民政府分别规定之。

现驻本市的人民武装部队应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

**第二十三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均包括在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之内。

市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由市人民政府规定之;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规定之。在上述规定名额外,少数民族选民凡有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者,不计入规定名额内。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的代表,凡聚居境内的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者,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或人口数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的聚居的同一少数民族的代表,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均得少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特少者,亦应有代表一人。

## **第五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四条**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由各该级选举委员会按人口和居民居住情况划分之。

**第二十五条**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每一选区,原则上得选举代表二至三人;人口稀少、境域辽阔的地区,每一选区得选举代表一人。

一个选区下亦得设若干选举分区。

每一选区的人口数,应与其应选的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区、乡、镇聚居的少数民族得按当地民族关系和

居住情况单独划分选区或与汉民族联合划分选区。

##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二十七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均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之。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亦得由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出之。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亦得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选民联合或单独提出之。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亦得由选民联合或单独提出之。

单位或个人联合或单独提出的代表候选人,不得超过各该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应选之代表名额。

第二十八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同一级的代表候选人只得在一个选举单位或一个选区内应选。

凡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者,选举委员会应即通知其本人;如同一代表候选人在两个以上的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被提名为候选人者,在接到选举委员会通知后,应即选择一个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应选,并公开声明之。

第二十九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三十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候选人初步名单应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汇总发交各代表小组充分酝酿、讨论,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应由各该级选举委员会于选举日二十天前将各选区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分别汇总发交各该选区选民小组,充分酝酿、讨论,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

第三十一条 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一般应与各该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应选的代表人数相等。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亦得多于各该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应选的代表人数,但最多不得超过应选代表人数的一倍。

第三十二条 提出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单位或个人,在向各该级选举委员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应由提名单位的代表或提名人在名单上签名,并应叙明代表候选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职业、住址等项。

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名笔划排列之,笔划少者在前。

第三十三条 选举人可按代表候选人名单投票,亦可另选自己愿选的其他任何选民。

##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四条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应根据上级人民政府之决定,定期举行之。

第三十五条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分别召开选举大会进行之。每一选区得根据实际需要,分别投票,集中计票。

第三十六条 区、乡(镇)之选举大会须有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始能举行。选举大会之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之,选举委员会代表为主席团的当然主席,其余二人由大会推选之。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之。

第三十七条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根据代表候选人名单,逐一提付表决;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人如

系文盲或因残疾而不能写票者，得请其他选举人代写。

第三十八条 选举人凭选民证或代表当选证书进入选举大会会场，领取选票；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进行选举时，选举人须持选民证或代表当选证书举手。

第三十九条 选举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须有选民或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进行选举；如出席选民或代表不足过半数时，应由选举委员会或主席团定期召集第二次大会进行选举，并即报告上级选举委员会，但第二次如仍不足过半数时，应即进行选举。

第四十条 投票结束后，由大会推选之计票人员，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大会主席签字。

第四十一条 每次选举所投票数多于投票人数者无效，少于投票人数者有效。每一选票所选举之人数多于规定人数者作废，少于规定人数者有效。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进行选举时，每一选举人举手次数，不得超过各该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应选代表人数。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获得出席选民或代表半数以上选票时，始得当选。得票超过半数之候选人，多于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如有两个以上候选人所得票数相同时，重付表决。

第四十三条 投票结果，当选代表不足应选代表名额时，其不足之代表名额，应补选之。

第四十四条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主席团根据选举法确定是否有效，并宣布之。

第四十五条 选举委员会派赴各选区的代表，不得为各该选区的选民，在其主持的任何一个选举大会中，均不得参加选举。

第四十六条 代表在任期间，经其多数选民或选举单位认为必须撤换者，得按法定手续撤回补选之。

第四十七条 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出后,由同级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 第八章 选举经费

第四十八条 市、区、乡(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经费,由市选举委员会统一编制预算,报经市人民政府核转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统一领支。

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选举经费,由区选举委员会统一制订领支计划,报请市选举委员会审核拨付之。

第四十九条 区、乡、镇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结束后十日内,就选举经费领支情况,逐级向市选举委员会做书面报告。市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结束后一月内就选举经费领支情况向市人民政府做书面报告,并制订决算,报经市人民政府核转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条 凡用暴力、威胁、欺诈、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阻碍选民自由行使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均属违法行为,应由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给以二年以下之刑事处分。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选举委员会的人员,犯有伪造选举文件或虚报票数、隐瞒蒙混等违法行为者,应由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给以三年以下之刑事处分。

第五十二条 对于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任何人均有向选举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司法机关检举、控告之权;任何机关或个人均不得有压制、报复行为,违者应由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给以三年以下之刑事处分。

##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之解释权,属于市选举委员会。

# 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草案)

(略)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目前全国选举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市委：

兹将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二月十一日的报告的第一第二两部分转发你们一阅。

中 央

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

## 关于目前全国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

### 一、目前全国基层选举工作的进展情况

(一)截至一九五四年一月底止,全国已经完成选举工作的共五二五五六个基层单位,计一亿四千二百七十四万人口,占全国进行选举工作的二二〇九八〇个基层单位的百分之二三点八,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四点八。其中:东北完成的最多,占该区基层单位的百分之七三点二;其次是:西南完成百分之二四点五,华东完成百分之二三点九,西北完成百分之一九点二,中南完成百分之一〇点七;最少的是华北,完成百分之八点一。

(二)目前全国正在进行选举工作的共二六七五三个基层单

位,约计七千九百一十九万人口,占全国进行选举工作单位的百分之一一点八八,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三点九九。其中:东北最多,占该区基层单位的百分之二三点四;西南占百分之二二点一;华东占百分之一五点一二。尚未全面展开基层选举工作的有河北、河南、湖北、广东、云南五省。

(三)以省、市为单位,各地进度如下:

一九五三年底全部完成基层选举工作的共七市:鞍山市、旅大市、本溪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抚顺市、西安市。

一九五四年一月底以前完成的共二市三省:重庆市、上海市、吉林省、热河省、青海省。

预计二月底以前完成的共二市六省:天津市、沈阳市、辽东省、辽西省、松江省、山东省、江西省、宁夏省。

预计三月底以前完成的共三市十七省和一个自治区: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河北省、山西省、绥远省、黑龙江省、新疆省、甘肃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预计四月底以前完成的共三省:广东省、广西省、陕西省。

## 二、基层选举工作的新情况

(一)各地的选举工作,都是紧密地结合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教育、以及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贯彻来进行的,因而更丰富了选举工作的意义和内容。主要表现在:

(1)各地基层选举中挑选代表的标准有了新的条件:谁积极宣传总路线,积极搞农业生产互助组,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就是谁能带领大家走互助合作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挑选谁当代表。

(2)在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很大一批干部有了新的变

化,群众通过自己切身的历史经验,体会到“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是大道”,感到前途“有奔头”;干部们深感过去觉悟不够,没有做好政治教育工作,互助合作抓的不紧,现在明确了国家总路线,认为“前途有奔头,干起来更有劲”,因而消除了“想换班”、“怕民主”等糊涂观念。

(二)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新发展也反映到选举工作中来了,这就是代表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反对粮食统购的余粮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实际是代表农村中的富农路线),在基层选举提代表候选人名单时,积极活动,打击干部和积极分子。如热河承德县跳沟村大余粮户张连,在选举时组织小团体攻击粮食统购中积极工作的村长,破坏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达到自己当选代表的企图。这个斗争与以前地主窃取选举权利打击干部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表现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后者主要表现在代表候选人提名时;前者是敌我问题,而后者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个斗争目前虽然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应作为重要的政策问题引起警惕,必须谨慎而适当地处理,以便在选举工作中,也能体现坚固地团结中农,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地主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结合。

(三)这一段基层选举工作中,有三种值得注意的情况:(1)对结合生产,创造了较好的经验。但有的地区或部门,仍有要求结合过多的现象,如有的想藉选举弄清社情,有的想藉此弄清土地改革后的一切遗留问题等,这样势必造成基层任务繁多,冲淡选举,特别会影响生产,且易出偏差。(2)由于基层任务繁重,普选完成时间一再推迟,普选干部抽换,质量数量降低,也有些地区的普选干部因取得了一些经验,产生了自满情绪,因而发生急于赶任务这种潦草从事的现象。(3)从若干已完成基层选举工作的地区检查出一些选举工作遗留下来的“尾巴”。如东北、华东一些省检查出:选民资



格上错给、错剥了的尚未纠正；新当选的干部工作上办法较少，新老干部关系还不够协调，从而使基层工作推动有所困难；若干地区有些群众因选举教育不够所引起的极端民主倾向极待补课克服；甚至有少数基层组织选入了不纯分子等等。这些情况应请各地领导上根据具体情况及时作出适当处理，加以补救，并在今后工作中予以严密注意。同时也有些问题是在运动中事先注意可以防止其发生的。

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 附：第一次普选和人口调查登记的基本情况

周 玉 文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举行，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确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确定我国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原则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而建立的，是一种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府。”这些都指明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

但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全国范围内，军事行动还在进行，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所以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立即实行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也

不成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是在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渡形式。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人民的努力，国家在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除台湾外，大陆上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无论在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了召开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赞同，并且作为政协会议建议交中央人民政府讨论决定。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周恩来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作了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国家经过三年的努力建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筹备和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适时的。大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分别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选举法草案的工作。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2次会议，听取邓小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作的说明，经讨论一致通过，并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彭真、邓小平等28人为委员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1953年2月25日中央选举委员会成立。同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第1次会议批准通过了以邓小平为秘书长（兼）、陶希晋、屈武、辛志超、孙起孟、孙志远、王子宜等七人为副秘书长的工作人员名

单及《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简则》。《简则》指出：“中央选举委员会设立办公室，为其工作机关，它在秘书长领导下办理一切选举事务工作。”4月3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第2次会议与政务院第173次政务会议联席会议通过并以中央选举委员会名义发布《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据此，各级人民政府及各级选举委员会将正式开始进行选举工作。

1953年4月，政务院决定配合1953年下半年即将进行的人民代表普选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进行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4月3日，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指示》明确提出在选举工作的同时举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是为了便于选举工作进行，规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到1954年4月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全国参加这次调查登记的工作人员达250余万人，查得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其中选民为323,809,684人。这就为选民登记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准确的人口数字资料。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根据《选举法》规定，先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然后乡、县、省（市）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组织，并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侨等方面的选举，产生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据统计，全国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达2.78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9万人，其中妇女占17.31%；选出全国人民代表1226人，其中包括有各民族、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

做好这次的普选工作，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选开始以前，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工作人员的训练、人口的调

查、选民的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的提出和介绍等等。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使人民在充分地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把大家认为最好的和必要的人选到国家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中来。这就是说,选举是要使人民真正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同时要让被选出的人民代表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它反映到人民的政权机关中去。经过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次规模空前的普选,极大地增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热情和民主意识,把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4年9月3日,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第5次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完成的报告》。邓小平说,今年6、7月份,全国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自治县、县一级单位和170个中央直辖市的区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有些暂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专区级、县级单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他们按选举法规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出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从7月底到8月中旬,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发表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已经按照选举法规定分别选出,除台湾省暂缺外,总计代表1226人。至此,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基本完成。

# 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黎 白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其中,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为贺龙元帅,副主任为许光达大将。杨秀山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编写的领导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奉调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至1962年战史初稿完成。

在3年的编史时期,我们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原件和其他历史文献、敌伪资料和档案,也访问过凡是能找到的当时职务比较高的敌、我、友各方面人士。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当时湘鄂西地区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几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组的编写人员及有关领导同志谈了他从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失败后返回上海奉中共中央指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一直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止的历史。其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932年至1934年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的“肃反”。

下面,我就以回忆贺龙谈“肃反”为中心,联系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进一步的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作一回顾。

(一)

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4次“肃反”。长达近3年的“肃反”其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以贺龙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而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消弱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苏区的丧失,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的流窜,濒临绝境,陷入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恶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湘鄂西和红三军的“肃反”并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的,它来源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肃反”这个名称却是来源于苏联共产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政权建立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即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为的事宜。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用坚

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蠹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进行反对“AB团”的大规模肃反，但并没有波及到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肃反，从此就在苏区和红军中全面地展开了。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凡是对中央派来的分局书记夏曦提出政策、方针方面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



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去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当时,夏曦虽受到广大干部的批评,却固执己见,自认为正确,矛盾日益尖锐,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而中共中央仅仅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等等,但在总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责批评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给夏曦打了气,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这期间,红三军在贺龙、邓中夏率领下早已在1930年10月离开苏区,渡江南征,转战湘鄂经年,至1931年10月才与在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会师返回苏区。贺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早就相识的夏曦。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知六军讯息后(六军即红九师),我即写信叫李士奇去接段德昌,信上并请邓中夏同志签了字。李士奇同志是苏联回来的,出身是工人,湖北人。第二天,德昌就来了,并给我一封信。信是夏曦写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上海与我分手后就到苏联去了,后来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回来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我是委员等……”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师出去的

一个谈话和一个决议。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联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候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从周老咀到刘候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候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到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

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许光达是打龙王集负的伤，这颗子弹打得好，不然早就叫夏曦杀了。”

“回到周老咀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并没有撤我军长的职，可是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剑如的家，同住的有李剑如、艾逸之（外号叫马克司）。3个人睡了一晚上。（李剑如是原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是工人出身，原叫去当独立师师长的，后来留在九师当政委。他在苏联时，就与二十八个半作斗争的。）次日，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在第二天又闹了一台，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的谈话和决议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

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在刘侯集会师时，万涛曾侧面告诉过我说‘出将入相’，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过后才明白是夏曦的阴谋。”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同志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能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在政治报告中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说：“四大开会的第一天下午和第二天，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送出苏区，发展苏区、江南失败、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老新口时遭

散伤员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曦在上面像死人一样。”

“在这次大会上搬书本的有两对夫妇，一是夏曦夫妇，一是潘家辰夫妇，他们根据书本辩论很激烈。我们那时不大懂这个问题。我同下面的一些干部只是因为先是邓中夏同志来，使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现在夏曦又来整红军，有一种不相信偶像的思想。”

“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休会，关、尉到了，同一些人谈话，后来休会一天，再开会时，尉士均首先发言，他说向中央报告夏曦的问题是错误的，江南失败是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错误的，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尔后，关向应代表中央讲话，于是就把整个代表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杨光华同志在关讲话后有个发言，很不好。他讲了之后就再没有多少人发言了。潘家辰夫妇有个反驳，争论激烈。潘代表着地方干部的正确意见。尉士均在这次大会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把正确的东西否定，帮夏曦打击地方干部，与地方干部形成一条大鸿沟。关向应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帮了教条、宗派主义的忙。他代表中央的一篇讲话有力量，压下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意见。为什么关向应要起这么个作用呢？他是在反立三路线时受打击的。在立三路线时期，关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

“关向应来洪湖，中央给他的职务有三个，一是三军政委，二是分局委员，三是军委分会主席。但夏曦实际上只叫他当了三军政委。‘四大’以后，三军军部出发时叫他当政委，但不配政治机关，是光杆政委。而且就是任三军政委也还是讲了条件——以孙德清当军参谋长，才叫当的。当时孙德清已经站在夏曦那边，他当参谋长是来监视我同关的。对于不配政治机关的问题，各师（那时已成立了三个师），议论纷纷。段德昌同志在新沟咀就说：没有政治机关，

我们的政委怎么工作呀！军长，你和政委以后不大好工作。我说：为什么？段说：一个是立三路线，一个是旧军人……。关向应听了此话，很不好过。”

“四大”前后，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虽面临敌人的“围剿”，但夏曦仍进行“肃反”，并且在军事上只要部队在洪湖内部打，对此广大指战员与之进行了斗争，结果进行了分兵，导致了指挥不统一，最后失败。贺龙回忆说：“龙王集战斗是有计划出去打的。夏曦本不准出去，是经过争论之后才许去的。‘四大’前，部队情绪很坏，意见颇多，不设法打好仗，提高部队情绪更不利，所以与夏争，争取让部队出去打仗。打这一仗的部队，实有3个团（含汉川独立团）9000人。段德昌虽然名义上是个团长（取消了师，段德昌这位九师师长自然免了职）却指挥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先后歼敌第四师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敌旅长张联华以下近4000人。”

“打瓦庙集、台李庙之前，夏曦也是不许红军出去，也是争出去的。我们主张到白区去打，因为苏区没饭吃。而到襄北则是在陆地上，并且有饭吃，能集中兵力，还可发动群众，有利条件多。……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反四次‘围剿’期间，我带5个团在荆当远（荆门、当阳、远安）消灭了王太、崔二旦部，尔后回洪湖打新沟咀。打新沟咀时，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参加，把敌人赶到老新口，我们在这边一堵，消灭了范绍增部。当新沟咀战斗正紧张时，王一鸣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打！打胜了。”

“在敌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巩固老区。这时，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要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做碉堡。段一面做，一面笑，为此事，段还受了处分。夏曦同某些地方干部坚定在洪湖打，是一派；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出去打。争论了四五天，结

果是分兵。”

“分兵后，留在洪湖内部的部队受了很大损失，十多个警卫团、警卫营都丢了。新沟咀战斗中，七师政委鲁易阵亡。我们到襄北后在大洪山打圈子，在一次战斗中，仓促遇上了敌五十一师，因为我带少数部队坚决抵住，收容了队伍，未受多大损失。这使参谋长唐赤英对我有了新的看法，从这以后他才开始与我合作的。他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的部队就完了。”

“与敌五十一师打了上面讲的那一仗以后，又转到襄河边接了七师，后来又会合了夏曦他们，这才知道洪湖失败了。”

## (二)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1932年12月19日，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及保卫局局长也被“肃反”肃掉了，杀一批，换一批，再杀一批，再换一批，所以，不久就变成由夏曦一个人决定就执行

的局面。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犯纪律——杀鸡、杀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了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展开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芦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到周老咀专门看守‘改组派’犯人去了。”

“夏曦之不相信党，早有表现。在文家墩战斗后，他就下令捉了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场不妙，走时，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并且走两天白区没有人跑，如果他们是反革命会这样吗？”

“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



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杨光华的这份向中央的报告是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肃反”后的当年写的，也就是洪湖苏区斗争失败，杨光华单身离开洪湖到达上海后住进中央机关时所写的，与展开“肃反”的时间相距很近，他又是除夏曦之外参与主持“肃反”的省委书记，因此，他所写的这份万余言的报告无论从事实和观点上都是符合当时真实的。

贺龙在谈到杨光华时说：“杨光华同志对一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是省委书记，为什么省委要作决定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红三军为五大团？为什么江南失败省委要作决定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呢？在建党、土改方面的错误，杨也有责任。在‘肃反’问题上，杨的观点很坏，他是肃反三人小组的一员，他应该写一点材料。”

1959年至1962年，我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时，杨光华与我同在一个组，即写湘鄂西地区的编写第一组。杨光华是一组的

顾问,是贺龙亲自点名邀请来的。我有很长的时间和机会与杨光华交谈,我曾问过他关于他写的那份给中央的报告。他说,洪湖突围时他与少数同志到了洞庭湖东山地区,得知洪湖苏区已被敌军完全侵占后,才去了上海,找到了中央,才写了那份报告给中央。他还说,报告中所写的一切情况,至今他都记得十分清楚,并且坚持认为夏曦的领导和“肃反”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忠实执行中央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我听后,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事隔30年之后,而且中共中央早在1945年就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特别是建国已10余年之后,杨光华却犹如“天外来人”似的,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及后来中共中央的正式结论居然毫无所知呢?

原来,杨光华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任一年以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乘中苏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列车到苏联路经哈尔滨,事先秘电杨光华,令杨及其他省委领导人登车汇报工作。杨光华就与只在省委机关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随王明到了莫斯科。刚下火车,王明就向到车站来迎接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讲随自己来的几个满洲省委领导成员都是反革命。于是杨光华等当场被捕,关进苏联远东地区的“共产国际劳动营”,一下子劳改了十几年。集中营中所关押的全都是各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十几年,大部分被处决或经受不住折磨而死去,满洲省委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已死去,杨光华却幸存下来,在1945年初,苏德战争紧张时期,守卫集中营的苏联红军调往战场,一些工作由犯人逐渐接办,杨光华担任了每天向犯人和附近集体农庄社员们分发饭食的管理人员,才活了下来。直到1949年至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时,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共一些留在苏联的同志名单,要求苏联将他们放回中国,以便参加国内的革命和建设,名单中有杨光华,这样他才于50年代

中期回到祖国。此后，杨光华住在中央组织部，并未分配工作，他本人也并未抓紧去学习和了解国内 30 年的变化发展及重要方针政策，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及中共中央的结论等等也没有学习阅读。当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组成、贺龙建议向中央组织部借调杨光华来担任第一编写组顾问后，这时的杨光华虽然是生活在 50 年代，但他的思想仍一成不变地停留在 30 年代初期。当他在向编委会全体人员介绍当年历史情况时，确实毫无顾忌地依照他本人的记忆和认识，讲述了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和夏曦的领导情况，并且认为包括肃反在内的所有路线、政策都是正确的。他有着颇强的记忆力，把当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罗列的一系列反革命分子都几乎倒背如流地讲了出来。因此，引起全体与会者的愤慨，特别是引起几位在“肃反”中深受其害的原红三军干部的极大愤怒，使得杨光华不知所云，惶恐不已。从此，他表示对过去的历史都已记忆不清，闭口不谈湘鄂西地区的历史了。由此看来，他本人在肃反和被肃反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

关于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肃反”诬杀同志的严重程度，这里引用一个并不很完全的、经过慎重调查的被“肃反”诬害的领导同志的名单，以补充贺龙的谈话。

在第一次“肃反”中被诬害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包括领导和参加在湘鄂西地区举行秋收暴动的成员；另一类是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参加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的老党员以及党派到苏联学习后奉调回国参加苏区和红军建设工作的；再一类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后来起义的，以及党派入敌军中做兵变工作后又回到根据地和红军的。他们是：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原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

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委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等。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即柳直荀),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政治部主任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俦,参谋长张应南、胡梯,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此外,还杀害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红三军中的团、营干部,以及很大部分基层干部。在党的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及此前曾经批评和反对夏曦所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和大会代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被杀完了。

### (三)

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是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败,红三军撤离,其他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特委和各小块苏区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此后,在夏曦直接领导下,尽管各个苏区大都

已不复存在,红军已受到了严重损失,而“肃反”却从未停止,一波又一波,连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肃反”。由于苏区已经丧失,没有地方干部可杀,“肃反”的重点是一再诬杀红三军各级军政干部,致使红三军已经处于濒临绝境的境地。

关于红三军撤离洪湖后和继续展开“肃反”的情况,贺龙是这样讲的:

“红三军在大洪山以北地区发现红四方面军布告,知他们已经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大洪山地区。这时部队就酝酿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枣阳王店,开分局扩大会议,夏曦、关向应、宋盘铭和我4人参加,在会上讨论行动方面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主张坚持洪湖,把王炳南独立团改组一下,换一批干部,组织湘鄂边党委,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少数人主张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两个意见在会上争论不休。到晚上仓促决定由豫南西进,经陕南回湘鄂边坚持。夏曦的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收复洪湖。本来夏曦坚主守洪湖而不同意以主力打出去,就是怕万一洪湖失守,他要向中央承担责任,洪湖失败后,他率余部到大洪山与主力会合后,又拖延不走,除了继续进行“肃反”杀人之外,什么计划也没有,也是出于不敢离开洪湖太远,怕担责任。他看到布告,知道了四方面军已经撤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也是可以的了,即使中央追究,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在先么!至此,夏、关、宋就商量如何转法,他们没有胆子,转不过去。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么?这时,我就说:你们决定,部队我带走。就这样,我就带着部队翻过桐柏山,由伏牛山西进……”

“这次行军路线是有计划这样走的,这是因为部队没有战斗力

了,要避免与敌作战,从陕南过汉水,从巴东过长江,皆比较容易。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他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没有。我说:你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闹的下不了台。关向应出来调停,说夏是共产党员。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我和关向应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夏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我两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走大巴山时,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气嘛!我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以后到巴东,我对他说:我们到巴东去住一天,休息一下,睡一夜好觉再走!”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减员很大,损失有1/3左右,部队从大洪山出发时有一万四五千,到鹤峰时还剩9000人了。”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

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么！”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会后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贺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

贺龙提出，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还是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共同商量。他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

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形成了流窜。

红三军攻击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坚持认为仍然是军内暗藏的“改组派”捣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突然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全体与会同志强烈的反对。

贺龙回忆当时的争论情况说：“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

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德昌接着也补充发言，段不满意，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夏曦提出莫斯科支部局的例子充当先例，实际上，莫斯科支部局提出的是停止党的活动、清党。而是对是错，外国党的问题，当时分局会议上的同志都不清楚。不过，夏曦这个拿尚方宝剑的说法没有吓着人，仍然遭到一致反对。虽然没能达到解散党的目的，却使夏曦深为不满。一个记仇的、心胸狭窄的最高领导人，在时机有利时是要报仇，要人性命的。

果然，过了不到两个月，夏曦不顾敌情严重、红三军处境更加艰难，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5、6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军政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连续几次的“肃反”，红三军中的军政领导干部被杀了几茬，有经验的各级干部几乎杀光了。

贺龙回忆杀害段德昌的情况时，说：当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时，我极为不满，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我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



我火了,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理屈,却仍叫着:“一定要杀!”

我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拍着桌子狠狠地说:“哼,我决定了!”

面对夏曦动用党严格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热泪。在对段德昌行刑前,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要段德昌在被杀前饱吃一顿。段德昌临刑前,当面向夏曦提出三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这是何等的壮烈,何等的慷慨啊!

贺龙与夏曦争论对段德昌的杀与保的时候,关向应在坐。小屋外边站着夏、贺、关3个人的警卫员,贺龙拍桌子,大喊大叫的声音传出屋外很远,可见贺龙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了,但是,他仍无法保住段德昌的性命。

至于诬杀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的经过,贺龙说:“那天晚饭后,我和夏曦、小关(指关向应)在村头走过,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那时天气还冷,王炳南被剥光了上身,打得浑身没得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那是三月天啊!他看见夏曦,就大喊着:‘夏曦,你娘的,我是什么改组派?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就朝我叫着:‘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他怎么会是改组派,从小跟着我,当营长的时候,周逸群秘密介绍他入党的,那时我还是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的时候,他入党比我还早呢。南昌暴动他有战功,后来又和我一起创建湘鄂边

苏区和红四军，是一员猛将啊！我为他，不知和夏曦争了多少次。我也明白，夏曦把他搞成那个样子，结下深仇了，以夏曦的为人，他哪里会不杀王炳南？他逮捕了宋盘铭，来不及杀就分了兵，宋盘铭由我带，我就把他放了。夏曦带七师返转回来和我会合，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掉了。他怎么会放王炳南？我当时就向王炳南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朝我点着头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他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夏曦杀掉段德昌、王炳南等一批领导人后，于3月24日，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还是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后来，有当年和夏曦、贺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将军曾这样说过：“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得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德昌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的。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这时，红三军又由9000余

人锐减到 3000 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人数，却并没有两个团那样的战斗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进入黔东，形势相对稳定，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夏曦除了仍坚持零星“肃反”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他不反对也不积极。实际上，他只要不蛮横干扰，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政委关向应至此时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主动权。又陆续配备了一些团政委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提拔了一批干部，开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 600 余人。在 1 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先后组成了 1500 人的 5 个地方独立团和 400 人的 10 个游击队，又将千余当地“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成黔东独立师。到了 1934 年 9 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 5 个县，17 个区，67 个乡政权，10 万以上人口，并且分配了土地，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不久迎接并与红六军团会师奠定了基础。贺龙对黔东时期的工作评价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1934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 5 月 6 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 1933 年和 1934 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斥责。指示中写着：“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

作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猜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政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已在这个时期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指出：“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正常状态，自下而上地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高峰时期的产物，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同样也是“左”倾高峰时期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3年“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未能实施，并停止了“肃反”，使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夏曦本来是全力推行中央“左”倾路线的，而他所亲自领导进行的“肃反”错误严重到连“左”倾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容忍，可见他在“肃反”问题上走得多么远，比“左”倾的中央还要“左”得多。这可以看出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由于“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了。

在这里，我引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第一部分的基本总结的一段：“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

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而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以至于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在总结湘鄂西“肃反”教训时，有人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改组派只有夏曦一人。当然，实际上夏曦也并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和改组派。他后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功过作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结论。在“肃反”中深受其害而幸存下来的同志，在情感上难于平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四)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到逮捕并准备处决的职务较低的同志。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这里,我叙述一下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段往事。

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给我们讲完了整个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事实后,问我们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问。只有我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湘鄂西肃反问题。我说:“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也确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是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

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专政”打入“牛棚”。在1967年冬天，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专案组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提审”我。我被“专政”的多个帽子中的一个帽子就是“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所以，许光达专案组“提审”我，自有原因了。他们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批示成立专案对许光达进行审查的文件，然后，问我有关许光达在我们编写战史时讲过的一段话是否是事实。我如实地讲了这条揭发许光达“罪状”是不真实的，并且应他们的要求，写下了文字证据。他们已经完成了向我调查的任务，却突然问我：“我们在提审编委会几个将军时，他们说你在编写战史时期是唯一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贺龙的，是吗？你能不能讲一讲？”

我回答说：“我没有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过他。”我就把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讲完了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历史后，我向贺龙提问的问题以及贺龙如何回答的告诉了他们。我还说：贺老总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贺龙的夫人薛明同志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10余名同志，包括许光达，都一起离开了贺龙的家。出门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我回答是：因为我执笔，我搞不清楚怎么写？

我向许光达专案组这样讲，当时并没有察觉其中利害，我讲时用了贺老总、薛明同志、许光达同志这种称呼，这在当时一旦被发现，至少会受到一顿责骂，或来一阵“喷气式”，给自己添一点儿“罪行”的。幸好，他们大约是忽略了。

过了30年,我参加《贺龙传》的编写工作时,我分工修改的内容包括了上述这段历史,我在研究如何写这一段历史时,再次提出了在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贺龙家里谈及红二方面军历史时我的提问、贺老总的回答。我认为这次回答可以认为是贺龙同志一次很重要的正式讲明他自己对当时“肃反”认识的、极少有的讲话,是应该写入传里去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因为1961年那次谈话,是贺老总已经讲完了历史,停止了录音之后,我才向他提问的,所以,没有留下录音和记录。不过,听到贺龙讲话的,目前也还有一两位将军和几位编写人员健在,他们会记得的。经过反复研究并找了几位当时在场听过贺龙讲话的同志加以核实,最后决定把这一段话写入《贺龙传》中。

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当时贺龙讲过的有关的话。谈到“肃反”杀了许多指挥员时,贺龙朝许光达说:“光达啊,国民党在你肩膀上那一枪打得好哇,你负伤送到上海,疗伤去了苏联,不然,‘肃反’开始,你是第一批就会杀掉的。和你一起从中央派来的孙德清,就是头一批让夏曦杀了的嘛。”

许光达说:“我运气好些子啰!也是必然性的偶然性吧!”

他们这个对话,表面上是笑谈,内心却是深沉、悲痛和苦涩的。我当时坐得离他们很近,他们的语调、神态,我看得很清楚。当然,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他们一位元帅、一位大将居然会在十年浩劫中被诬害逝世。

对于贺龙在“肃反”中所能起到的抵制作用,1961年4月,他所讲的认识,我当时就认为是真实的、合理的,也是很朴实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我对贺龙讲过的那段话,体会得更深了一些。我想,凡是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身体会的人,就会理解贺龙在1932年对待“肃反”所能持那样的态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按照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党，因为有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

以湘鄂西地区的情况而言，中央这个决议的估计和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贺龙等一批同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却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下起到改变错误的作用。

# 忆 济 南 战 役

王 济 生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喜庆年。在举国欢庆的时候，我想起了亲身经历的济南战役和为攻克济南牺牲的烈士们，深感胜利来之不易。

1948年7月中旬，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我当时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政治处主任。七十三团奉命进至泰安以东山口镇整训。在整训中战士们自发地提出“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团报随之刊登，极大地激励了战士们的练兵热情。就在大家热火朝天练兵的时候，纵队政治部仲曦东主任来电话找我。仲主任严厉地问我，你们团报上登“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了吧？我回答后，仲主任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怎么乱提口号呢？我说这是战士提出来的，我们觉得登出来，鼓舞士气。仲主任说战士们说说可以，你们怎么把它登在团报上呢？我还要解释，仲主任说别说了，赶快处理掉，把团报收回来。我虽然不解其意，但立即照办了。事后，仲主任给我解释：这个口号是华野已经内定的战役口号。过早提出口号，暴露战役企图，惊动王耀武，于战役行动不利！

9月16日，济南战役全线展开。经6昼夜鏖战，至9月21日晨，我纵兄弟团队将济南东郊敌军外围主阵地茂岭山、砚池山、燕翅山等全部攻克，东线我军进逼外城下，给济南城之敌以巨大震撼。同时，西线守敌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被迫率部举行战场

起义,我攻城部队乘势逼近商埠和内城。9月22日凌晨,我团进入攻击出发地霸王桥。霸王桥是外城永固门通往东郊的一座古老石桥,离永固门只有1里多,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城城墙、敌设工事及敌人的活动。

为了不给敌喘息机会,我团奉命当天攻击外城永固门。此次由于白天在开阔地攻击,受到外城敌之火力侧射及暗堡火力杀伤,攻击失利。

聂凤智司令员打电话直接找张慕韩团长说:王耀武在我军迅速攻克外围据点后,最头痛的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我们就是要发扬连续作战、勇猛突击的作风,不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趁敌人部署混乱、举棋不定的时候,攻下外城攻内城。又说:有许多兄弟部队向你们挑战,条件就是看谁先攻进城去。为了迅速攻下外城,上级特派来4辆坦克给你指挥。张慕韩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向聂司令员表态说:“请首长放心,今晚一定攻进外城。”

张慕韩放下电话即命一营长董万华来开协作会议。

这是七十三团第一次召开步兵、炮兵、坦克兵协同作战会议。为了郑重,参谋人员还特地用弹药箱拼成了“桌子、椅子”,团首长各自拿出自己的香烟招待客人。会议开始,董万华首先介绍了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下一步攻击方案。炮兵、坦克连长因为都已看过永固门外地形、敌堡和敌城头的工事,也提出了作战想法和对步兵的要求。团长张慕韩听过大家意见后,激动地说:“今天是我们团,也是我们师,部队历史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第一次,我相信一定能配合好,一定是胜利的开端!”随即讲了联合作战的具体部署,特别要求一营:首先必须抓住坦克攻击有效时机歼敌,占领敌人阵地,攻占永固门;二是要绝对保护坦克的安全。

下午16时,攻击开始。榴弹炮首先怒吼起来,一发接一发地向预定目标轰击,一时敌人哑巴了。坦克直向永固门外敌人工事扑

去。鹿砦被碾碎，铁丝网被压垮，穿甲弹、高射弹一发发准确地钻进敌人的工事里爆炸。

这一下把敌人打蒙了，他们不相信“共军”也有坦克。有的敌人钻出地堡，一边打着联络信号，一边扯着嗓子骂：“你他妈的往哪儿打？瞎眼啦？我们是保六旅，八路在那边……”，话音未落，两声炮响，那个喊叫的家伙就和地堡一起上西天了……

坦克打得好，战士们从战壕里跳出来叫好。跟随坦克冲击的二连战士，更是把什么都忘记了，他们和坦克比赛起来。排长于子安带领战士于瑞荣也连续炸毁敌3个地堡，又消灭了一批残存在地堡内的残敌，使攻城道路更为安全。董万华向团里报告：“永固门外敌人已被肃清”。张慕韩团长马上命令榴炮营长胡建胜“向永固门开炮”！永固门上立刻火光闪闪，浓烟翻滚。永固门在我炮火和坦克攻击下很快便垮了。

董万华一看，永固门城楼不见了。此时，离总攻时间还差10分钟，为不失时机，他果断命令三连向城头突击。三连连长董崇信，政治指导员尹秀亭率领全连奋不顾身搭梯登城，迅速占领永固门两侧。顷刻间，部队潮水般冲上城头，巩固扩大突破口。战士冷乃福在随队冲击城头时，突然发现城门北侧还有一个地堡在射击，他三步两步冲上去，向地堡扔了2个手榴弹，说了声“见鬼去吧”，地堡随即哑巴了。与此同时，副班长和另一名战士也把2个地堡消灭掉了。一营、二营迅速突进城关，展开激烈巷战。

在此前，七十五、八十、八十一团也突破了敌防御前沿，登上城头，并打退敌多次反扑，扫清了城头之敌及火力点，下城投入纵深战斗。渤海纵队由花园庄突入，三纵队由杆石桥突入，十、十一纵队又攻下永镇门。西线我军也攻下商埠敌占各点。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攻击。

所谓“聪明过人的国民党才子王耀武”没想到我军这么快攻老

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一面急切地向蒋介石求援，但蒋介石要王耀武沉住气等待援兵，叫他像陈明仁守四平街一样来死守济南。

9月23日拂晓，天降寒雨，敌人出动多批敌机向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战场上炸得乌烟瘴气。我团指战员忍受着寒冷和彻夜作战的疲劳及敌机的轰炸，顽强勇猛地向敌突击，步步逼近内城护河城边。

为了不给王耀武以喘息的机会，兵团指挥部命令各攻城部队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今晚攻内城的准备工作。

团长张慕韩带参谋到三营阵地前沿观察敌情和地形，选择突破点。他看到城墙约有十四五米高，在此处拐了一个90度的弯，这里正是内城的东南角。城上有一高大建筑物气象台，它是全城的制高点，敌人利用城东南角可以封锁好大一片地区。城墙上又有上、中、下3层火力点，城墙根躺着一条宽大的护城河，此处水流缓慢，只在东南角拐弯处激起漩涡。这里靠近黑虎泉，那一抱多粗的老虎头，还喷着水柱。张团长感叹地说，想不到这个供人欣赏的胜景，如今成了战斗的障碍。

经过观察并与营连干部研究后，张团长立即召开团党委会，研究攻内城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突破口选在城东南角比较合适，这里护城河虽宽，但水流不急，亦不很深。城东南角上有气象台，便于我登城部队扩大和守住突破口，王耀武不会料到我们在他认为最安全之处登城，打他个“出敌不意”。

张慕韩将团党委研究的方案报告给师、纵队首长。不长时间，电话铃响了。聂司令员说的第一句话是：“张慕韩，你们好大的胆量。”聂司令员接着说：“你们的方案，我和刘政委研究了，你们决定的是正确的。从东南角突击，看来困难很大，但我们可以打敌人料不到的地方，敌人是不会认为我们敢从险地选突破口的。”聂司令员继续说，“山东政府和人民授给我纵‘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的大旗，纵队党委研究就授给你们团，希望你们团不辜负山东人民的希望。”张慕韩立即表态：请纵队党委首长放心，我们团一定把胜利红旗首先插上济南城头。

会后，团领导各自深入营、连，帮助做今晚攻城的准备工作。张慕韩到三营，研究攻城的具体部署，我到七连送旗，并帮助做攻城思想政治工作。

23日下午4时许，我和团政治处干事冒着敌机轰炸，来到七连，在指导员彭超陪同下，看望和问候全连干部和战士。随后，在靠近护城河东南一座院子里，七连召集全连各战斗组的骨干，举行授旗仪式。我在讲话中说：“同志们，我是代表团党委给七连送旗来的。这面红旗是山东3800万人民授给九纵队的，纵队党委又把它授予担负主攻内城任务的连队，这表示上级对我们七十三团和英雄连的信任。我相信，七连的英雄们，共产党员同志们一定能把这面旗子插到城头上！”大家齐声回答：“请上级放心，我们一定把红旗插到城头上！”

9月23日18时整，夜幕刚刚降临，我军总攻城的炮声响了。刚才还一片沉静的内城，顿时炮火轰鸣。我军远射程炮摧毁着皇亭体育场、警察局以及旧省政府等处的敌炮兵群。各种抵近射击的炮、轻重机枪，各自对准预定的目标，准确地射击着。城东南角城头上一团团火球升起，声响如雷。大地震动了，天空被撕裂，曳光弹飞驰，照明弹腾空，城上敌人被打哑了。

炮火延伸后，攻击信号升起，紧靠护城河半壁街的七连开始攻击。连长肖锡谦立即命令五班爆破手孙喜上。孙喜抱起炸药包，趁着烟雾掩护顺着河岸的一条斜坡小路而下，趟着水过了河。爬上岸一看，原设鹿砦、铁丝网已被我军炮火炸得七零八落，不用爆破了，随即他扒开一条通道。忽然，城墙根下响起一排枪声，一看，暗堡敌人在那里作怪。他悄悄地从侧面上去，把炸药包贴在暗堡上，一拉

弦，敌人的暗堡上天了。六班长孙高亭随即带领全组扛着百斤重的炸药杆踏着孙喜指引的小石桥冲过护城河，靠近城墙，找准爆破点。孙高亭用力举着炸药包，两个战士各持一撑杆，3人用熟练的动作，迅速把炸药竖起。炸药杆稳后，一拉弦，“轰”的一声巨响，城墙上砖头石块乱飞，火光中看到城头上出现了一个缺口。肖锡谦认为口子太小，命令继续爆破，王硕文、曲传海、张云青按照孙高亭指给他们的路，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冲过城河。高大的城墙已被我军的炮火和刚才的爆破炸得面目疮痍，乱石、碎砖成了他们竖炸药的最大障碍，他们3人吃力地竖了几次才弄好。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清醒过来，拼命地向城下投手榴弹。张云青负伤了。王硕文叫小曲把小张背下去，小张说，组长，不用管我，我能坚持，你们赶快下去。张云青忍痛从地上站起来，扑到炸药杆上，抓住导火索恳求说：“组长，让我拉这次弦吧！”时间就是生命。在张云青恳求下，王硕文只好答应，弦一响，小张倒在血泊中，接着副班长孙景龙小组又送上一包炸药，刚竖起炸药杆，不幸失利，全部伤亡。等待不及的孙高亭又一次上去拉响炸药。经过七连英雄的不断爆破，城墙终于被炸开一个豁口。

肖连长借着火光看到爆破成功，命令梯子组架梯子，三排突击，火力组集中火力掩护。陈序芳等4人抬着300余斤重的梯子趟着水直奔城下。他们按照战前练兵的方法，把梯子往城墙一靠，中间用撑杆顶着，梯子前面的小车轮向上滚动，没用两分钟，12米多高，300多斤重的梯子便牢靠地架在城墙上了。突击队飞快地冲上梯子，可爬到上面一看，离城头还有一截，一时爬不上去。就在这时，被打昏苏醒过来的敌人投下手榴弹，好多人负伤，第一次登城失利。

肖锡谦命令火力封锁敌人，三排继续突击，接着七连战士们前赴后继顽强突击，但终因我军炮火已延伸，火力压不住敌人。连续

两次突击均失利，梯子也被敌炸断。七连攻击受挫，全连指战员心情沉重，怒火心中烧，第四爆破组又冲了上去。

透过敌射火力的火光，大家看到炸药包已顺着城墙竖起来了，但一分钟、两分钟……，没有听到爆炸声。这时，城上的敌人手雷、轻重机枪一起猛打，企图封锁我过河的突击部队，孙高亭看得清楚，迅速冲过护城河，扑向已竖起的炸药包，拉着导火索，孙高亭这一惊险的壮举，终于把城墙顶端炸开一个三四米宽的大口子。

不等硝烟散尽，七班长李光臣就带领梯子组抬着梯子飞身过河。但是，敌人的反应也很快，我炸药爆炸一过，敌军官就催着工事里的敌人爬出来用火向突破口射击。随着敌人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照明弹、燃烧弹一起向我突击队位置倾倒，燃烧弹打着半边街的民房，大火燃烧起来，给七连攻击造成极大困难。

营长王玉芝看到七连的情况严峻，问肖连长、彭指导员：你们连还有没有力量继续攻击？八连要求好几次了。肖锡谦、彭超焦急而肯定地说：“我们有力量，我们保证完成攻击内城的任务！我们爆破伤亡两个组，还有两个组；梯子组有伤亡，但不大；突击队伤亡一个班；三排可以合并成两个班，一排还没动呢？就是缺炸药和梯子。”“好吧，我们召集战士研究失利的原因和再次攻击的办法。你们派人到营部取炸药和梯子去。”

肖连长和彭指导员立即在阵地上召集支委和党小组长开会研究失利原因和再次攻击的方案。这时，传来两个不幸消息：营指挥所遭炮火轰炸，教导员郭奎武和负责指挥炮兵的副团长李靖受伤，右翼七十九团一度登城成功。在敌人猛烈反击下，后续部队没突上去，突破口又被敌占领，攻上城头的指战员壮烈牺牲。从西南角坤顺门攻击的十三纵队一〇九团突进两个连，经过激烈而残酷的争夺战，突破口也被敌人重新封死。

于是，攻城部队全线受挫，一时间，东西南3个方向全都处于



沉寂之中。

团指挥所一次次接到三营关于七连攻城失利的报告，大家心情沉重，沉思着失利的原因。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破隐蔽部沉闷的气氛。

聂司令员问：“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今晚继续攻击没把握，许司令说可以撤下来整顿再攻。你们意见怎么样？”张慕韩马上回答：我们把情况研究过了。七连3次攻击失利，有一些伤亡，但指战员们信心十足，再次要求继续攻击。三营还有八、九连随时可接替七连，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今晚把内城攻破。我和王济生主任马上就到七连组织第四次突击。聂司令员是七十三团的老首长，他知道这个团从来就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他关切地问张慕韩还有什么要求？张慕韩提出要20发炮弹。聂司令员爽快地说：给你们50发！并提醒说：一是不要蛮干，要在战术上多动脑筋，关键是要找出失利的原因；二要接受兄弟部队的教训，上城后要迅速向两翼扩展，巩固住突破口。二梯队上去要大胆楔入，插进敌人纵深，打乱敌人部署。祝你们成功！

9月24日零点，张团长和我来到七连前沿阵地，七连干部战士见到我们来了，就嚷：首长快下命令吧，我们研究好了，也准备好了，保证再攻完成任务！这时肖锡谦把七连3次攻击失利的情况和支委、小组长研究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汇报。随后，我和彭超到二班突击队找战士了解情况。

班长李永江正在与全班议论着什么，看到我们来了，就站起身着急地说：主任，我们早准备好了，这次突击登城，我保证在敌人没有醒过来就叫他上西天！我表扬了他们的英雄气概，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发扬后劲，最后5分钟夺取胜利。我又到爆破组、后勤组一一看望。然后和张团长来到了营指挥所，这时炮兵营长也来了。张慕韩团长主持召开步炮协同会，分析了前几次攻击失利的原因，研究

制定了不待炮火延伸，突击队即迅速攻敌登城的方案。

9月24日凌晨1时30分，第4次攻击内城战斗打响。全纵队的炮火都支援着这个方向，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飞去。直接支援七连登城的炮火，一颗颗落在城东南角上，城墙上工事被炸毁，城头上砖头、石块在空中乱飞。就在炮火猛烈轰击城头的时候，七连连长肖锡谦、彭指导员把指挥位置又向护城河边移前一步，直接指挥各组人员攻击。孙高亭率领2人，冒着砖头石块迅速过河，把炸药送上城墙。梯子组在炸药爆破的火光中过河架梯。组里有4人负伤，有的血流满面，但没有一人畏缩不前。由于梯子不够长，几个人把梯子推到顶端，他们牢牢地抱住梯脚。连长即命突击队登城。第一突击队刚冲上就被敌侧射火力打下来。宝贵的时机再也不能错过，肖锡谦命二班长李永江突击。李永江说声：“二班跟我来！”以娴熟的动作登上云梯，当他登到梯子顶一看，大吃一惊，梯子比城头短了半人高！关键时刻不容迟疑，他急中生智，一脚踏着梯子顶端，双手扒住城墙上的石头，“霍”地一下登上城头。然后机智地占据有利地形，向反击的敌人一阵猛扫。在万分紧急之时，共产党员于洪铎带领着滕元兴、周顶仁、机枪手王会、机枪班长冯立国也紧跟上来。李永江当机立断地说：老于你和小滕向西打，我向北打，冯班长和王会守住突击口，联系后续部队登城，突破口是咱的命根子，决不能丢掉！

李永江刚向北走出几步，就发现一股敌人嚷着：快占阵地！李永江用冲锋枪一个点射，敌人有的倒下，有的向后跑。李永江紧追不放，追到气象台门口，他开展政治攻势，迫使20多个敌人交枪投降。李永江发现另一处敌人不肯投降，就用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了他们。于洪铎带着小滕向西发展，没走多远，迎面上来一群敌人，于洪铎和小滕端起冲锋枪扫了两个扇子面，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扭头向后跑。于洪铎和小滕紧追不放。忽然发现从西面又跑

来一股敌人，一个军官喊：不准跑，谁跑枪毙谁！于洪铎随手把两枚手榴弹扔进敌群，小滕用冲锋枪扫，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乱成一片。有一敌机枪手还想向我射击，于洪铎一个箭步扑上去，抓住枪筒就夺，敌人惊慌地扣动扳机，子弹从于洪铎腋下飞过。正在危急之时，小滕赶来用枪托砸碎敌人的脑袋。两人又向敌人扫射，并喊话叫敌人投降，十几个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机枪班长冯立国和王会守在正面，发现左侧有敌人叫：快扔手榴弹，他们上来了！王会用机枪消灭了敌人。这一切，都发生在短暂的时间里。七连勇士们用智慧和勇敢消灭了当前之敌，继续与敌人厮杀。

在登城勇士危机之时，头部已负伤的连长肖锡谦，带着突击队登上城头。肖锡谦看到李永江等，高兴地说：同志们打得好，给你们报功！我们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誓死守住突破口，保证八连、九连登城！肖锡谦立即把已经登城战士分成3组，规定具体任务。各组刚刚就位，敌人就开始顺城墙西边和气象台北边向我反扑。这是王耀武特选的“敢死队”，一手提大刀，一手持短枪，“嗷嗷”叫着冲过来。肖连长和战士们毫无惧色，等敌人靠近我工事前沿，肖锡谦首先一枪把冲在最前面的大个子敌人击毙，王会的机枪接着射向敌群。敌军官在后督阵，敌人又冲上来。李永江依托工事对付从北边来的敌人，连续投出70多个手榴弹。他头部负伤，血流满面，包扎一下，继续坚持战斗。机枪班长冯立国腮和眼被弹皮崩伤，一时昏了过去，醒来后又继续打击敌人。一班长郑田芳右手负伤，就用左手扔手榴弹。三班王新庆腰和腿负伤，仍带着战士向西打下去。指导员彭超在登城时右腿中弹，通信员要背他下去，彭超说：我不能下去，我要上城！说着咬紧牙关，强忍剧痛，靠一只腿和右手的支撑，在通信员的帮助下，艰难地登上城头。彭超摸到气象台时，再也走不动了，倚在工事上喊道：同志们，坚决守住突破口，后边部队上来了！

城头上的混战拼杀更显出七连“常胜连”的英雄本色。部队建制乱了，干部及时编成战斗组织，战士自觉地听从指挥；自带弹药打光了，就找敌人的枪、弹打敌人，枪、弹没有了，就用石头砖块砸。

七连指战员鏖战城头是整个攻城战中最壮烈的一幕。战前七连 144 人，经过 4 次攻城和城头浴血奋战，绝大多数同志均带伤战斗，终于打垮了敌主力整编七十三师十五旅四十三团的 10 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突破口，实践了把最后一滴血洒在济南城头的誓言，再次表现了“常胜连”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指导员命令宋炳科把红旗插上气象台的顶端，在硝烟弥漫、火光闪闪中招展的红旗，鼓舞着全团和兄弟团队奋勇攻城。

八、九连登上城头后锐不可当，沿着城上交通壕向敌猛打。八连向西冲垮敌人反扑，打出 40 余米。九连向北打，恰逢敌十五旅通信营疯狂地扑过来，二班长王其鹏迅速投出手榴弹，并用冲锋枪打退敌人，乘机占领工事，和 3 个战士一起利用敌工事与敌人对阵。三营登城后经过激烈反复的混战，七连打开的突破口终于牢牢地巩固了。二营长崔玉法带部队登上城之后，敌我势态已有所改变，但敌人仍然利用火力反击，企图大量杀伤我登城指战员，阻止我军下城巷战。

团指挥所登城后，张慕韩团长为巩固突破口胜利，于 24 日晨 4 时 50 分命令部队下城投入巷战。但因背绳、布的同志牺牲了，原准备下城的绳和布没有了。正在为难之际，九连二班长王其鹏高呼“争取下城第一名，活捉王耀武当英雄！”说完，首先跳下城去，其他同志也都紧随其后，跳下城去投入激烈的巷战……

经过半天多逐街逐巷的激烈争夺战，24 日 13 时许，四连攻进旧省政府，尔后直扑新省政府。七连下城后向西攻进，转而插向西北角，打遍半个内城，所向披靡。下午 17 时又首先攻进新省政府，相继与兄弟部队会合，将突围之敌歼灭。大部敌人在我凌厉攻势面

前放下武器投降。傍晚，内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第二天，我站在城头仔细观察，东南角又高又陡的城墙，虽然被炮火、炸药炸开口子，但并不大，梯子直立距城头还差近一人高。在炮火齐鸣、炸声似雷、碎砖石块乱飞的情况下，人是怎样飞上城来的呢？我自己爬到梯顶上不去，一名侦察员从城头上递给我一条步枪叫我抓住枪托，警卫员在梯头上用肩和手推我，我抓住枪托，脚蹬人头才上来的！仅此，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昨夜七连城头争城厮杀的情景是多么壮烈。

战后，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新华社专门发表社论，表彰济南战役中建立特殊功勋的英雄部队。9月24日济南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华野：批准授予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济南第一团”称号。10月10日，在济南城东历城县的港沟举行隆重的授奖命名大会。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宣读了嘉奖令，并将一面绣着“济南第一团”的红旗，授予团长张慕韩。七连获“济南英雄连”称号，并给该连记集体特等功一次；七连二班长李永江、二班战士于洪铎、九连二班班长王其鹏3人荣膺“济南英雄”称号；七连六班长孙高亭立特等功，七连长肖锡谦、指导员彭超以及战士滕元兴、张云青、王硕文、曲传海、冯立国、李光臣、陈序芳、孙喜、宋炳科等一大批同志，都记功受奖。我团在济南外城、内城的突破、巷战中将近2000同志流过血，400余人付出宝贵生命。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了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继承他们遗志，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胜利。

## 胡耀邦在黄湖干校

杨春祥

“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到冲击，耀邦同志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同志也被下放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团中央搞行政工作，是耀邦同志手下的一个兵。1968年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要我当了一连的连长。在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军代表分配到一连来劳动改造，成了我“领导”下的一个“兵”，真是颠倒了乾坤。

军代表把耀邦同志当成“三反分子”实行监督改造，加强管制。我们一连大多是团中央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当时军代表把耀邦同志放在一连，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三反分子”耀邦同志的“改造”。

1952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调耀邦同志到团中央工作。耀邦同志曾说过，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毛主席发现了，把他从一个23岁的青年破格提拔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当时还有人说他太年轻哩！他到团中央工作也是毛主席点名的。毛主席找他谈话，问他：“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大报告吗？”“你敢给知识分子讲话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刘少奇当时还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派他去团中央：“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经验；你当过军委组织

部长,人缘好,有联系各方面的优势,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你。”耀邦同志当时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1952年,他到团中央工作的第一天傍晚,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是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的,大家席地而坐,主持人宣布:“耀邦同志和大家见面。”耀邦同志就站在花坛上讲话,尽管他的话不多,当时给我这个小青年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是我们青年团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在坐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我需要大家帮助、监督。若是有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多年以来,许多事例说明,耀邦同志对待来自机关同志们的批评告状是取欢迎态度的。这种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吗?

耀邦同志还经常教育团干部,工作中要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常说:“我们做事情、想问题,心里要装两个数,一是7亿;二是20亿。一切要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问题。”(7亿是当时中国总人口数,20亿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总人口数——编者)他要求出差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和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凡是到外地工作或出差的同志都有及时反映情况的任务。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和辛克高等同志到黑龙江办农场开荒种地,生活在太康县太和大队的群众之中。1961年春,春旱种不上地,群众怕日后没吃的,一次在太和大队至县里公路上的一条

大水坝上聚集了上百的群众，阻止运粮卡车队往县里运粮。我目睹了这一群众抢粮情况后，写信作了反映，登在团中央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耀邦同志很重视此事，指示我们进一步了解。由于我们对群众的疾苦了解不够，体会不深，加上我们有恐“右”思想，再次写出的报告，把发生抢粮事件的原因归纳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所致。”耀邦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明确指出：“群众阻止公家运粮的情况，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他指出，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然后再清查坏人。耀邦同志心中装着群众，惦记群众的困难，这不就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吗？

件件往事萦绕心头，我实在不明白，像耀邦这样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出生入死40年，怎么就成了“三反分子”呢？团中央的工作哪一点是黑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斗倒斗臭，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在他已经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还要逼他只身来到干校，剥夺他的工作权利和应有的政治权利呢？这种种政治压制迫害究竟是为为什么，当时我们一般干部是无从得到解答的，也不能公开提出来，但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作法，对于校军代表这样摧残折磨干部产生了怀疑。“五七”干校的干部是按军事化原则建制的。我们当时不能公开地抗拒军代表的一些做法，只能尽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耀邦同志以关照和帮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被“四人帮”定为“修透了”的加以改组和撤销的单位。团中央这支干部队伍在军代表眼中自然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改造。从机关的最高领导层书记处的11位书记（团中央原有13位书记、候补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长期的乱批乱斗中，书记张超、候补书记惠庶昌已被迫害致



死)到全部工勤人员和各直属单位的各方面的业务干部 2000 多人,不管老、弱、病、残一锅端到了黄湖。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宿舍被北京卫戍区占用,住在大院里面的干部有如“扫地出门”一般,带着反复精简了的日用杂物,扶老携幼到农场“安家”。军代表反复强调说:“要选有发展余地的地方做为干校校址,我们应考虑到下一代,要为他们着想,不然今后子子孙孙如何生存呀!黄湖农场这地方不错,选定为干校,可以围湖造田,是有发展余地的。”而实际上是想把团中央及其下属单位的这批经过党长期培养教育的干部统统打入另册,长期留在黄湖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在黄湖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住房子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像耀邦同志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老同志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团中央和各直属单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 2000 人,自 1969 年春至 1970 年秋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达 7 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领导干部钱大卫(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知名作家吴小武等。在这种情况下,军代表却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把打鸟、打鸭子、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广大干部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带有青少年子女的干部,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相反,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一次我因汇报连里整党情况闯进了军代表的办公室,发现他们围在炉旁煮鸡吃,我只好借故走开。他们不仅常到集市上买王八做汤食肉补养,还买王八往北京家里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的军代表特意打电报到信阳,要我代他们买活鱼,设法捎到北京,我没有

办。

耀邦同志对于被军代表定性为“三反分子”，是一直不服的，但他同机关广大干部在一起劳动，自觉性却很高。他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干活。每次出工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无论是托坯和泥，运砖拉石，推谷晒场，风车扬麦，插秧割草……什么苦累的活他都干过。比如托坯吧，一个土坯重约25斤，最棒的小伙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块，而他却用足体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块。军代表还时常要求他轮流到各连去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次到三连，正赶上“龙口夺粮”的时候，一环扣一环，个个都在紧张地脱粒、扬麦、推草、装袋。耀邦同志以他身高不满五尺、体重不足百斤之躯，也带病同大家一起忙活，累得几乎趴在麦场上。看到他身体不好，大家都关心。我们连干部有时就借宿舍需要留人值班为由，在全连大会上点名留他在宿舍“值班”，为大家晾晒被子。有时在场院劳动遇雨，在抢粮入仓时，他也争着同大家一样去扛那100多斤重的麻袋。这时我们不得不采取“派活”方式“分配”他轻一点的活如负责过秤。有一次他病重，需要去潢川县医院检查，我们当然有责任照顾他，未请示军代表，就派人陪他前去。军代表知道后，批评我们说：“劳动任务那么紧张，还派人陪胡耀邦去看病！”质问我们：“有这个必要吗？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只好编理由加以搪塞。

我们大家都感到耀邦同志和蔼可亲，愿意和他谈心聊天，甚至还可以同他开开玩笑。在一次托坯时，我笑着对他说：“老胡呀！我们几个小伙子的工资低，坯托的多；你是高工资，坯托的少。你一月的工资400多块，还不如用你的工资去买砖合算哩！……”他呵呵地笑着说：“是这样啰！是这样啰！”我们想着，像他这样的高干，长期放在干校劳动，真是对“宝贵财富”的极大浪费呀！有一次国庆

节,我和杨文玉陪他到三连去,开始他有些顾虑,主要怕个别干部对他提些问题不好解释。当我们进入三连驻地时,正赶上大家改善伙食,有的班包饺子,有的拿出从北京捎来的好酒好吃的食品,见他来了,大家都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班里去吃饭,没有人向他发难。他同大家谈笑风生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此情此景也使耀邦同志得到了一些安慰。耀邦同志在回一连的路上感慨地说:“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没有想到。”

在五七干校这样的艰苦环境中,耀邦同志仍然坚持不断读书,不断思考,这是他一贯的学习态度。当时他只能读到“三个四卷”(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选四卷)。晚上他独自坐在蚊帐中读书记笔记,经常到深夜。有一次,校部组织我们去30多里地以外的地方拉车运石头,回来后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吃完饭就睡了。可耀邦同志晚上仍然读了一会儿书,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1971年冬他要回京探亲、看病时,他一手拿行李,一手拿一摞笔记本,我看他拿不过来,就上前帮忙。可他只把行李给我,拿着笔记本风趣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不赔不起啊!”他是十分珍惜自己积累的学习心得。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耀邦同志也常同我们这些小干部谈心,甚至征求我们的一些意见。我体会到,他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耀邦同志也非常注意全党和全国的大事。他对在林彪、“四人帮”控制全党造成危难时候怎样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忧心忡忡。当时能够了解党的一些情况对耀邦同志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此,我们背着军代表,主动地让他阅读连队里的一份县团级中央文件,他非常高兴,有时还同我们议论某些党内的大事。有一次,我问他,你参加九大时,在会内会外都接触了谁?他们有何表示?他说,会内接触比较多的是邓大姐,她对我有些关照。在会外碰到过谢富

治、李志民和张体学。他说，谢富治见到他装做不认识，趾高气扬地一扭头就走开了。李志民态度比较好。张体学当时还很热情，鼓励他：“不要有顾虑，要想开些。”我说：“你应当同邓大姐取得联系。”耀邦同志表示应当如此。

1970年春节，耀邦同志和其他干部都回北京家里过年。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报告在干校的情况。后来邓大姐给他回电话，被军代表接着，邓大姐只好请军代表转告他说：“耀邦同志的信我收到了，这次就不请他来我这里了，下次回来，我们再谈。”军代表对此十分恼火，回干校后就批评胡耀邦直接给邓大姐写信，没经过军代表是错误的。军代表很怕耀邦同志和邓大姐直接取得联系，因而指责耀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但军代表不得不把邓大姐的话传达到。幸好有这一次“无组织”的行动，耀邦同志才直接同中央取得了联系。

有一次我参加军代表召开的会议，内容是推选四届人大代表，除了决定干校的候选人名单外，还把中央推荐的名单也读了一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提起这件事，耀邦同志认真地问：“中央推荐的都有谁呀？”我说听了一遍记不住。他说你印象最深的有几名？我说想起了我原来认为不可能有的两位，这次推荐名单中有。他急切地问是谁呀？我告诉他是张闻天和邓子恢。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要给出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给出路一棍子打死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从这以后他似乎感觉到他复出工作的机会有望了。

干校在进行批改时，军代表不把胡耀邦定为“三反分子”，似乎无法向上交差。因此首先要耀邦同志在干校大会上进行检查。当时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因他还没有“解放”。有一天晚上，他找我和李汉平（当时汉平是排长）说，我的检查已写好，请你俩先提意见。于是他念给我们听，当谈到团的工作17年的时候，他停下来

说：团的工作17年怎么看？我还是认为在17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我们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17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总的说17年是红线，不是黑线。在某一时期及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我一定好好地检查。”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17年团的工作，我们从心眼里佩服。之后，我被调到副业连任连长。我记得那一年“七一”过党的生日，同指导员李文耀商请耀邦同志给副业连青年讲讲长征，意欲教育青年同志艰苦奋斗。我去请他，他诚恳地表示，“我不好讲，因现在许多宣传材料都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我怎么说呢？”他当时对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十分愤慨。

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获“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军代表责问他：“你在文革初期已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翻案了？”耀邦同志说：“文革开始，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我承认是走资派。否则，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军代表拍着桌子和他吵，要他在定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耀邦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不能签。”军代表发火了。耀邦同志说：“你急什么嘛！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军代表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迅速把耀邦同志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

黄湖广大干部对耀邦同志也很尊敬。这次耀邦同志回京，我送他到信阳车站等候上车，因车站人多拥挤，没有地方休息，我就找到值班站长，他听说是胡耀邦回京候车，马上打开贵宾室，请耀邦同志进去小憩。信阳车站的站长，没有把他看作是“三反分子”。但是军代表知道为耀邦同志回京购买的是软卧票后，似乎有什么想法，问我为什么给胡耀邦买软卧。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他是五

级干部，中央还没有降他的级。我只知道他的工资已经补发，级别待遇已经恢复，全总的李颀伯，外经委的方毅，他们回京乘坐的都是软卧，胡耀邦为什么不可以？他也该坐软席了。”军代表哑口无言。为了定胡耀邦的罪，他们捕风捉影，不择手段，把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耀邦同志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做为请功的材料。几年以后，驻团中央的一位军代表被分配到国家机关一个部委任副职。曾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对耀邦同志说，这个军代表既无能力，整人又那么凶，为什么还要重用他？耀邦同志平静地说：“还是要给他出路嘛。”两相对比，耀邦同志是何等宽大的胸怀！

# 忆 1992 年智利总统艾尔文访华

朱 祥 忠

1992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智利总统艾尔文应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当时,我作为中国驻智利大使,自始至终陪同艾尔文在华访问。

## 艾 尔 文 率 团 来 华

1992 年 11 月 13 日,载着智利总统艾尔文的银白色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自 1970 年中智两国建交以来第一位智利总统来华访问。

艾尔文,1918 年 11 月出生于智利比尼亚德尔马市的一个律师家庭。1944 年毕业于智利大学法律系。1950 年以来曾先后担任民族长枪党、基督教民主党主席。1971 年至 1972 年任参议院议长。1989 年 7 月被 17 党政党联盟推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同年底的大选中获胜。1990 年 3 月正式就任智利总统。1987 年艾尔文曾率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次来访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

艾尔文一行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方陪同团团长、地矿部部长朱训夫妇、副外长刘华秋、我同夫人陈云清等迎接,并直接到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和等候在那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

主席丁石孙一起参加由杨尚昆主席主持的欢迎仪式,随后杨尚昆在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艾尔文。

## 杨尚昆同艾尔文会见和会谈

杨尚昆主席 1990 年 5 月访问过智利。艾尔文总统访华实际是对杨尚昆访问智利的回访。在会见中,杨尚昆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艾尔文总统及其他来访的智利客人表示欢迎。他在回忆了 1990 年访问智利的美好情景后说,艾尔文总统的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把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艾尔文指出:两年前杨主席对智利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强调这次陪同来访的有政府官员、议员、企业家、工会领导人等各阶层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希望通过同中国同行的接触,加强智中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开辟一些新的贸易渠道,以体现两国的友谊与合作。

杨尚昆说,中智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事务中都是平等的,应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因为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互相取长补短,以发展自己的事业。智利是南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 22 年来两国关系发展令人满意,特别是艾尔文总统阁下执政后,两国的交往大大增加。1990 年我有幸访智,今年 6 月阁下同李鹏总理在巴西举行会晤,现在阁下又来中国访问。这些访问和会晤有力地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艾尔文总统此次来访更具有重要意义。

艾尔文说,虽然智中两国人口、面积相差很大,但两国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存在着很多有利条件使双方联结在一起,特别是两国



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战胜贫困、为人民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挑战,应在平等自决、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晚上,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艾尔文一行。宴会是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也有一个小插曲。按规定,我们的国宴是四菜一汤,一般都可以吃饱,但那天我们招待客人的饭菜不是太好,都是汤汤水水的。杨尚昆诙谐地说:“这哪里是什么四菜一汤,而是四汤一菜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但智利客人对中国的烹调技术还是大加赞扬。事后,外交部礼宾司同志把杨主席的批评转告了人民大会堂的有关人员,据说后来国宴饭菜有了改进。

11月14日上午,杨尚昆同艾尔文在国宾馆钓鱼台进行了正式会谈。杨主席表示,智利已成为中国在南美大陆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同智利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他说,不久前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步伐,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智利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将有利于中智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艾尔文表示,智利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视,很感兴趣,希望了解这一变化和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智利不仅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希望加强政治和文化关系。我们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我们都希望和平,尊重人民自决,在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寻求各自国家的发展。近年来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举世瞩目。智利也是一个开放型的、具有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国家,外贸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变化都为智中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杨主席说,完全同意艾尔文总统的意见,我们要共同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国商品有互补性,贸易很有发展潜力。

智利外长席尔瓦对发展两国关系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第一,

鉴于中共十四大决定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开放型经济,智方认为有必要签署《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二,智利将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和向中国的出口,不仅是传统产品,可增加非传统产品,如水果和鱼产品等可向中国出口;第三,智利是世界上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和出口国,可以考虑双方合资在中国建立葡萄酒厂。钱其琛外长表示,中国赞同尽早签署相互投资保护协定;由于双方人员往来增加,中方希望两国签署领事条约;关于合资建葡萄酒厂问题,同意继续进行商谈;关于进口智利新鲜水果,中方准备同智方就签署两国政府间的《植物检疫合作补充备忘录》进行商谈,以便为智利水果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双方已就《地学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这次可以签署。

关于多边合作,双方就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1)智方希望中方支持智候选人竞选第27届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中方表示给予积极支持。(2)中方感谢智利政府支持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希望以后继续得到智方支持。智方允诺在这个问题上将继续坚定地支持中国。(3)中方希望智利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智方表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拉美也具有积极意义,智利将予以支持。(4)中方希望智利支持中方候选人史久镛教授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智方答应予以积极考虑。(5)智方表示,明年智利将成为“里约集团”协调国,将积极支持和推动该集团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外长组成“三驾马车”,同中国外长举行会晤,讨论中国和拉美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对此,钱外长表示同意和感谢。由于智利的推动,中国和“里约集团”八国外长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即每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同该集团外长集体会晤一次。这对促进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起了重要作用。(6)中国支持智利政府关于召开社会和发展世界各国首脑会议的倡议。智方对此表示感谢。

关于国际形势,杨尚昆表示,冷战结束后,天下并不太平,国际上出现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总的看来,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我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是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一个大国或几个大国企图垄断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联合国在建立这种新秩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各国期望联合国在其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指导下,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愿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艾尔文表示高度赞赏和同意杨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中国对有关问题的立场。他说,中国的立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和观点完全相吻合。

杨主席最后表示,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中智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一致和很好的合作,相信这种合作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这种合作不仅符合中智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

## 江总书记会见并宴请艾尔文

11月14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民盟中央副主席丁石孙等陪同下,在国宾馆芳菲苑会见并宴请了艾尔文一行。在交谈中,应艾尔文的要求,江总书记介绍了中共十四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不久前我们成功地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我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心就是一心一意、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中国经济的办法就是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这一理论是逐步形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我和钱其琛外长旧社会时都在上海,上海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我知道总统阁下在1987年访华时到过我的家乡——扬州,在场的丁石孙教授是镇江人,两市一江之隔。这一地区解放前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全国一样,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现在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十几年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这些人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最近我们也很重视西方经济学,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学说。我接触过许多国家领导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学法律的,我国的领导人多是学工程的,我是学电子工程的。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和关心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起来,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但也不能说我们过去没有市场经济,新中国建立前就有市场经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市场经济因素在全国逐步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认真

抓好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政企分开、企业应享有自主权、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精减政府机构等环节。所有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都要提高效益，优化劳动组合。这样就要裁减部分人员，对这些富余人员，我们采取办第三产业的办法来解决。中国 11 亿人口，8 亿在农村。农村实行改革以来，我们用兴办乡镇企业的办法来解决富余农业人口就业问题，让他们就地就业，不需要进入城市。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灵活，有事就在企业干活，没事就回家找活干。

艾尔文说他这次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了不起的，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学习。

江泽民说，智利经济发展较快，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中智相距遥远，但说到底也就是一洋之隔。我们两国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和很好的合作关系。拉美是一个发展潜力很大的地区，中国非常重视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国际上，我们主张世界应是丰富多彩的，不能只有一个模式。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友好相处。

同日下午，万里委员长也会见了艾尔文，双方一致认为各国议会之间的交往对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有着重要的作用。

## 李鹏总理的“电话口信”

智利实行的是总统制，艾尔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但艾尔文访华期间正值李鹏总理去长江三峡地区视察，没有安排他们会见。智方对此很有意见，智利驻华大使布拉沃几次找我国外交部官员交涉。当时我和刘华秋副外长同李总理的秘书吕聪敏联系，商量能否安排艾尔文在外地（如武汉）同李总理会见。但地方上

临时安排这样重大外事活动有困难。最后决定以李鹏总理致艾尔文总统“电话口信”的方式，向智方表示歉意，做些解释工作。由陪同团团长朱训和我到艾尔文住处转达了李鹏总理的“电话口信”，并送了花篮。

李鹏总理致艾尔文的“电话口信”的内容是：“我期待着总统阁下访问我国，但因紧急公务去了内地，难以与阁下会面，这是一樁憾事。相信阁下是会理解的。

“今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期间，我同阁下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交谈，我对此仍记忆犹新。据了解，您这次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谈得很好，我感到十分高兴。阁下是第一位访华的智利总统，您的访问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推动中智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祝阁下访问圆满成功，在我国逗留愉快。”

艾尔文对未能安排他在北京与李总理会晤表示完全理解。一场礼宾风波总算平息了。

## 艾尔文与中国经济界人士交谈

11月14日上午，艾尔文参加了由当时荣毅仁董事长领导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织的“中国——智利经济合作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始之前，艾尔文同荣毅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在场的只有智利外长席尔瓦、驻华大使布拉沃和我本人。在交谈中，艾尔文向荣毅仁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听说过去你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大资本家，今天你又搞了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气的大公司，其目的是什么？是否还想当资本家？”荣毅仁听了哈哈大笑，幽默地答道：“我曾是一个不小的资本家，但后来成了一

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红色资本家。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中国建设的深刻教训,倡导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很赞成。他说我过去搞过市场经济,懂行,所以委托我搞个公司,积累一些经验。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荣毅仁用几句简要而生动的语言,就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中国几十年的变化说得一清二楚,令在场的人敬叹不已。此时主持研讨会的人进来说时间到了,催着进场,才不得不终止了这次有趣的谈话。

艾尔文还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在那里两国企业家进行了对口会谈,具体探讨了合作的领域和项目。

## 艾尔文访华取得圆满成功

11月17日,在艾尔文结束访华的时候,中国和智利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两国元首对中智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间的广泛合作表示满意,并强调指出,中智友好合作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对外事务以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因此坚信中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保持在不断发展的最佳水平上。智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方这一表述比两国建交公报又进了一步。在建交公报中,是由中方表明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后,智方表示“注意到中方的立场”)。中智双方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签订两国领事条约的谅解备忘录》和《地学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元首决定指示两国有关机构研究尽快缔结一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已于1994年3月由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访智期间同智经济部长加西亚正式签署)。中智双方还表示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就签署一项《植物检疫合作补充备忘录》进行协商(1994年3

月中智双方代表已签署了《植物检疫合作协定》，中方允诺进口智利南方无蝇区即第六至第九大区生产的苹果和猕猴桃）。

在华访问期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尔文对这次访华作了总结。他说，尽管智中两国政治制度不同，面积大小不等，语言文化各异，但双方有很多共同点。在会谈中，我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在政治上，我们都热爱和平与独立，主张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在经济上，我们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任务，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地理上，我们同属太平洋沿岸国家，太平洋把我们隔开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发展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友好合作关系是智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正是带着这个愿望而来，又带着丰硕成果而归。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国际上，国家次序一般都是按字母排列，而中国和智利的英文字母都是“C”打头（CHINA，CHILE），所以在国际会议上两国代表总是坐在一起。因此，中国人和智利朋友在一起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和智利永远在一起。”艾尔文总统这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又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 台湾当局自讨没趣

智利和国际舆论都对艾尔文总统的中国之行给予很高的评价。唯有台湾当局不那么高兴，通过其驻智利的民间商务代表处发言人于11月17日向报界发表谈话，对艾尔文总统访华时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不满，说在中智联合公报中对台湾问题作那样表示“是不必要的”。

18日，针对上述谈话，智利代外长巴尔加斯发表严正声明，驳斥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是智利自



1970年两国建交以来的一贯立场。这一立场是始终不渝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智利必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关系。智台贸易关系近年来大有增长，智利愿意继续保持这一关系，但必须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智利不能给台湾以国际法不予承认的地位。台湾问题只能由台北与北京政府协商解决。”

智利政府的上述声明把台北驻智商务代表处发言人驳得哑口无言。台湾当局真是自讨没趣。

# 江阴要塞策反经过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经中共地下党有计划有组织的策动,蒋军江阴要塞于 1949 年 4 月 21 日凌晨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成功地举行了起义,保证解放军渡江部队在江阴东西 60 里长的江面未受阻击,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中共地下党策动蒋军江阴要塞起义的工作,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解放后又没有大量宣传,知道中共地下党策动蒋军江阴要塞起义全貌的人较少,即使直接参加策反工作的同志,也只能了解各自所经历的一段,因此对于究竟如何策动蒋军江阴要塞举行起义并获得成功的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说法。国民党人中甚至有共产党人用“五百根金条”收买起义成功的说法。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 蒋军江阴要塞的基本情况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这里地势险要,江面仅宽 1500 公尺,是长江下游最狭之处,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由于江阴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1945 年日寇投降后,蒋军在江阴要塞配备了一个守备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重火器中队,约 3000 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团(还曾配备过一个重炮营,后调去上海)。随着战争形势的发

展,蒋介石不断地加强江阴要塞军事力量。原要塞司令孔庆桂调走,1948年6月,“少壮派”、国防部陆军总部少将军械处长戴戎光接任江阴要塞司令。要塞的兵力和火力也有所加强,配备了一百毫米榴弹炮和一百毫米加农炮各12门,以及三七战防炮16门,二五机关炮2门共42门,正式编成江阴要塞炮兵总台,共约千余人,相当于一个重炮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已面临绝境,他们一面抛出“和平”阴谋作为缓兵之计,一面拼命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布置长江防务,企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进行顽抗,因而对江阴要塞的防务更为重视。1949年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对江防指挥系统作了调整,把江阴要塞划归第一绥靖区指挥(司令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兼)。还从台湾调来了一个游动炮团,约3000人,下设三个营,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工兵营,约200人。这时蒋军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约有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

1949年初,国民党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到江阴要塞视察。1月13日,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带省保安司令杨宗鼎、副司令单洪培等视察黄山炮台。1月19日,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也赶到江阴要塞视察,并召集要塞将领训话。4月初,汤恩伯偕同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秘密赶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并召集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和要塞司令戴戎光及要塞的几位团长一起开会,布置加强防务。汤还专门向戴戎光交代:“要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头,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死,越快越好。”4月17日,美军顾问团头目带了一个上校和两个上尉军官,由国民党副总长李延年陪同,到江阴要塞视察炮台,并与戴戎光在作战室内单独进行密谈。可见,蒋介石、汤恩伯等把江阴要塞视为长江防线的重点之一,倚为南京、上海的可靠屏障。

##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活动

1946年春夏间,中共华中五地委(即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四弟唐秉琳和五弟唐秉煜的来信。他俩暗示想离开国民党,到解放区来,唐即向五地委书记曹荻秋作了汇报。曹荻秋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为我们工作,指示唐君照复信,“要他们等待”,并暗示将派人和他们联系。

1947年春,五地委通过中共建阳县委派上岗区区委委员、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到上海,和唐秉琳取得了联系。这时唐秉琳已到蒋军江阴要塞任上校参谋处长。唐坚华按照组织上的指示,要唐秉琳他们留在白区,“深入国民党部队抓实力”。尔后唐秉琳把和唐坚华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唐秉煜,唐秉煜时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任上尉参谋(分管要塞业务)。还告诉了在国防部一厅任上校参谋的吴广文(唐秉琳的姨表兄)。1947年,五地委分为五地委和十一地委,由十一地委派共产党员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阴城内设立了地下联络站。

不久,中共苏北区委员会成立。唐坚华的工作关系,唐坚华与唐秉琳、唐秉煜的联系都移交到苏北区党委,唐仲衡的地下联络站亦转到苏北区党委,由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宋学武和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具体掌握。

1947年秋,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做好准备,华中工委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一个重点。唐坚华对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了解考察,同意介绍他们三人参加共产党。1947年11月,管文蔚代表华中工委正式批准唐秉琳等三人为地

下特别党员，从此江阴要塞内有了我们的地下党员。

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十分重视，明确指示地下党：要加强“做上层工作”，“要抓实力”，“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孔庆桂”。工作上要注意“特别谨慎”，“要绝对保密”，“要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这样，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活动，有了正确的方针、方法。

唐秉琳等入党以后，即根据“要抓实力”的指示在要塞内部开展了工作。在戴戎光接替孔庆桂担任江阴要塞司令以后，唐秉琳就利用戴戎光上任后搞扩编的机会，设法把吴广文调到江阴要塞当了守备总队长。又通过吴广文把吴在黄埔的同学王德容（1949年2月入党）弄到要塞当了参谋长（1949年初改任游动炮团团长），自己当了炮台总台长。由于唐仲衡、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都是弟兄亲戚关系，相互熟悉了解，因此有事经常秘密在一起商量研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地下党小组。根据华中工委“要在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的指示，唐秉琳等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到起义前，在炮兵总台、守备总队以及游动炮团、司令部直属分队等部门中间团结了一批军官。如司令部通讯连副连长李容有（唐秉琳的妻兄）、第一大台长孟怀高、第一中台长毛介平、第二中台长丁佩基、第六中台长吴钟琪、第二大队长傅仲山、工兵营副营长龙潜等。他们还利用要塞司令戴戎光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以及和中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造成上下不和，以削弱敌人的力量。我军渡江前，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武装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等地下特别党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这就为江阴要塞成功地举行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6月，唐坚华去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回江阴途中在泰

州被敌特逮捕，未暴露身分，年底获释，奉调回解放区。11月，华中工委改派吴铭担任江阴要塞政治交通员，负责江阴要塞地下党与江北上级领导的联系。

## 起义前的重要准备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部署渡江战役。为了准备人民解放军在江阴一线顺利渡江，华中工委、三野十兵团领导先后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在我军渡江作战时的基本任务、方针、方法等作了具体指示。1949年3月间，华东局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澂明从山东到华中，由华中工委安排他打入江阴要塞负责整个策反工作。华中工委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在淮阴亲自找王澂明谈话。管文蔚明确指出：江阴要塞的任务是“配合我军渡江”，“工作上要绝对保密”，“工委由我俩（陈、管）直接掌握”。要求江阴要塞地下党把江阴60里江面情况画一个详图送华中工委，并强调“不能暴露”，“不准瞎活动”，“服从隐蔽”。陈丕显对在敌人封江严密的情况下，做好江南江北交通联系和江阴要塞如何配合我军渡江，以及起义后的政策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示。王澂明接受任务后即和华中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一起，带了电台、报务员、机要员等有关人员到江阴要塞对岸的靖江江边开展工作。3月，人民解放军已集合江边待命，准备渡江。为有利于配合渡江，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由华中工委移交给了三野十兵团直接掌握。同月，十兵团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在兵团司令部和王澂明谈话，对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叶司令、韦政委在听取王澂明汇报情况以后指示：江阴要塞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见到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我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响，完成即渡江第一功。”

3月底,十兵团领导为更有把握地控制江阴要塞,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策反起义,特从二十九军选派了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团、营级干部,分别在交通员吴铭带领下,由一地委所属江南工委派交通护送到江阴,打入要塞内部。李干到唐秉琳身边当“卫士”;徐以逊、陆德荣到游动炮团当“副官”;王刚到特务连卫士排当“卫士”。这批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打入后,使要塞内秘密共产党员达10人之多,力量大增,要塞起义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时王澂明也准备直接进入江阴要塞,只因4月15日接到叶飞司令关于“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20日以后”,“暂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后去更好”的亲笔指示信,延至4月18日晚才由江南工委交通员护送到了江阴要塞。王澂明到要塞后,即召集唐秉琳、唐秉煜、李干、李云葵(原要塞守备总队副总队长,后升总队长)等开紧急会议,传达十兵团领导的重要指示,要求大家各就各位,掌握好军队,准备迎接大军渡江。会上还作了具体分工:陆德荣、徐以逊负责接应渡江先头登陆部队;李云葵负责控制守备总队;唐秉琳、李干负责控制炮台;王刚和李容有控制对内对外的通讯联系;王澂明以王德容(游动炮团团长)“卫士”的身分为掩护,和王德容一起掌握游动炮团;唐秉煜(1949年初任要塞工兵营长)和吴铭作机动,担任内部联络。会后,地下党每名党员都充分准备,分别向团结争取的中下层军官打招呼暗示,对中间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训话。

## 江 阴 要 塞 起 义 经 过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要塞司令戴戎光随即接到第一绥靖区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下午即从江阴城内的司令部驱车赶到要塞黄山炮台,在总台指挥所坐镇指挥。入夜,解放军炮击江阴对岸八圩港蒋军二十一军桥

头堡阵地。蒋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参谋长打电话给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说“前沿阵地遭到共军袭击”,要求“炮火支援”。这时唐秉琳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故意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公尺,12发急速射。炮弹全部打到了二十一军一四五师阵地上,蒋军一四五师师长气得直骂,要求停止炮击。

零时刚过,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即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长山原属要塞防区,敌人在4月19日突然调防,由蒋军二十一军控制。但因要塞地下党员事先有意安排,使二十一军来不及构筑工事,防御不严密,让出正面大片空隙阵地,解放军在渡江和登陆时都未遇到抵抗。分工接应渡江部队的陆德荣在长山接到了先头登陆部队后,即率领部队从长山中间向长山东西两头守敌二十一军出击,迅速地击溃了守敌,控制了长山,然后带领部队继续前进。这时徐以逊也在肖山接到了渡江先头登陆部队。4月21日2时左右,正在游动炮团团部的王澂明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判断解放军已经渡江,便果断地打电话给要塞总台长唐秉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名义,下令“要塞官兵立即行动,调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因戴戎光在总台指挥所,唐秉琳即到了第一大台指挥所。当戴戎光发觉解放军大举渡江时,急忙命令唐秉琳开炮射击。为了继续迷惑戴戎光,不过早地暴露,唐秉琳即打电话给第二中台长丁佩基,要他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即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戴戎光发现打出去的炮弹没有爆炸声,就气急败坏地叫嚷:“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是打的欢迎礼炮呀!”这时唐秉琳、李干、唐秉煜通知王刚和李容有切断了江阴要塞和江阴城内戴戎光司令部及蒋军二十一军之间的电话线,使戴戎光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唐秉琳命令除丁佩基台继续执行监视江中敌军舰等任务外,其余大炮全部掉转方向,宣布江阴要塞起义。不得已,在黄山总台指挥的要塞司令戴戎光也被迫放下了武



器。起义造成的形势，正如李宗仁回忆说：“孰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无法挽回了”。

21日早晨7时左右，起义后的江阴要塞召开了军官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官兵会议，宣布江阴要塞起义。

起义后的江阴要塞，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接管。当日，三野特纵司令陈锐霆到达江阴要塞黄山总台指挥所。几天后，三野粟裕副司令员也视察了黄山。

4月26日陈锐霆司令写信鼓励要塞全体起义官兵，说：“当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指向江南解放全中国之际，你们勇敢地脱离国民党反动派阵营，毅然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加入解放军并调转炮口用巨炮轰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军舰及其他尚图顽抗的军队，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大军的作战”，“由于你们的起义，名著全国的江阴要塞迅速转入人民之手”。前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游动炮团团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吴广文特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报告了江阴要塞起义这一正义行动。

中共地下党策动蒋军江阴要塞起义是成功的，在解放军渡江时蒋军要塞守军不打枪，不打炮，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在江阴一带安全渡江，迅速登陆，打开了蒋军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解放军从江阴渡江的部队，在当日上午8时左右就切断了沪宁线，促使蒋军防线迅速瓦解。李宗仁“认为南京无法再守”，即在23日晨乘专机逃离了南京。

〔参加调查整理者：毛 微 周培基 陈伦军  
赵鸿飞 孙浩中〕

#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 官僚资本和在华外国资本的政策

刘 志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进一步实施了没收官僚资本和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的方针,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基于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开展的经济合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曾经对外国投资和中外合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一、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政策

### 1. 没收官僚资本和消灭官僚资产阶级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政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

机会主义的错误。”<sup>①</sup>《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sup>②</sup>

没收官僚资本是与解放战争同时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东北和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接管城市的经验，在摧毁国民党政权机关的同时即开始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与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他们的机构，而是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受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sup>③</sup>。这样，接管工作既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

从解放战争后期到经济恢复初期，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金融方面有：四大家族把持下的“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系统和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共2400家；还有国民党官商合办的其他银行中的官股。中国银行等在海外的分支行职工也纷纷起义，接受人民政府领导。

工矿方面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企业；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企业；四大家族和其他大官僚的“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9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737页。

③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业；以及各省地方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合计共有工业企业 2858 个，职工 129 万余人，其中生产工人约 75 万人；其中发电厂 138 个，采煤、采油企业 120 个，铁锰矿 15 个，有色金属矿 83 个，炼钢厂 19 个，金属加工厂 505 个，化学加工厂 107 个，造纸厂 48 个，纺织厂 214 个，食品企业 884 个。在全部工业资金 91 亿元（不含手工业）中国营工业（包括公私合营工业）为 70.9 亿元，占 78.3%。

交通运输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辖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铁路通车里程 21989 公里，机车 4069 台，客车约 4000 辆，货车 47000 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 30 个，各种轮驳船 5698 艘，共 37 万吨；公路通车里程 80768 公里，货物运输汽车 32543 辆；在香港的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 12 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也回到祖国怀抱。

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贸易公司。

通过没收上述官僚资本，国家控制了整个经济命脉，为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 年，社会主义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34.2%<sup>①</sup>，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41.3%。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 58%，原煤产量的 68%，生铁产量的 92%，钢产量的 97%，水泥产量的 49%；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铁路和大部分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事业。<sup>②</sup>

在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政治、经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76 页。

② 董志凯主编：《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 页。

济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采取分别情况,有秩序、稳妥地进行接收。如在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海外资本(主要属于国家资本)的接收和处置上,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就《关于接管国民党政府留港资产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建议:“(一)由我外交部委派接管负责人进行接管前应有之外交步骤,并准备进行接管。(二)组织机构接管。内分经济及外交二部门。中央指定主要负责人主持,由留港中央、华东、华南三经济机构负责人及两外交特派员公署人员(现是外事处)协助。以上二部门均由中央再派若干干部协助”<sup>①</sup>。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声明:最近起义驶往新加坡的海玄轮,及在香港起义的各轮,和在各国港口原属于伪国民党政府及中国官僚资本所有的各轮,均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直接管辖。声明要求人们保护国家财产,并向各国政府申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对官僚资本中所涉及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政策上也有所区别,特别是对后者的清理要求审慎地掌握政策界限,以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官僚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主要指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经营的企业以及国民党的各级党营企业。在处理这类资本时,要区分历史阶段,稳妥进行。1950年,中财委私营企业局提出了《关于处理官僚资本的初步意见》,指出:“官僚资本的定义应该是凡利用政治特权,积累巨大财富者谓之官僚资本,时期则以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起算,国统以前的官僚资本(除汉奸外)概不追究。”<sup>②</sup>

意见认为,“如果把北洋政府时代以来的官僚资本都算上,那

---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107—109页。

它所牵涉的范围,就非常之广泛,我们的打击面也一定很大。同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所有的公私企业多多少少不免要与国民党官僚资本有些勾结,否则就不能存在。我们今天清算官僚资本,在政治上要考虑到他们今天的政治倾向,凡它向人民低头,愿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工作的,除罪大恶极的以外,均不清算;在经济上要考虑到不至使私人投资有所顾虑,不至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情绪,同时更重要的还要争取台湾之更有利的解放,争取外逃资金之返回国内,从事生产。因此,在原则上,清算官僚资本所要打击的面是愈小愈好!”

意见提出对国家官僚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以及牵涉其中的私人资本,分为下列 13 种情况,加以处理:

1. 凡国民党政府国营企业,不论其是否为官僚资本,一律没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成为人民的财产,但国营事业中,如有商股在内者(如中国、交通两银行之商股),仍当承认其股权。

2. 官僚资本以私人名义所办的企业,应当没收,如有化名隐匿或非法转移者,应彻底清查,但真正的商股仍予保留或发还。

3. 凭藉特殊地位,利用人事关系,套购外汇或四行贷款,而博取巨额利润,较为特出者,及假公济私,化国家资本为私人资本者,应加清算或没收。

4. 国民党党团假借名义所办的经济事业,一律没收。

5. 伪国家四行二局名义投资所经营的事业,应视为官僚资本,收归国有(至于中、交两行有少数商股,乃另一问题)。

6. 伪省银行及官僚资本银行投资的事业,亦视同官僚资本,收归国有。

以上 5、6 两项没收时仅以银行投资的那一部分为限,并不没收整个企业。如果四行(或省行,官僚资本银行)投资在该企业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则将该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倘所占比重不大,

则改为公私合营或将公股折价售给私人经营。

7. 各私人企业向伪四行或官僚资本银行之借款,其已偿清者,不再清算,尚未偿清者,应根据当时币值,加计利息,重行清理,或令其偿还,或作为公股视为国家之投资;私人企业中向国家行局贷款数额巨大,较为特出者,特别要清算。

8. 民营企业在国统时期为应付环境,利用国民党要人出任公司董事或董事长者,得分别情形,加以处理。若仅挂一空名,既未出资,亦未操纵公司行政者,不加清算,若实际出资者,应将官僚资本部分没收归公,或让原主备价收回,或由政府作为股款,采取公私合营(未出资之“红股”亦应没收)。

9. 在国民党接收时期,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无代价或廉价取得之敌伪产业及善后救济总署物资,应重行清查,加以没收;若非官僚资本家在胜利后廉价取得之敌伪产业,及善救物资因私人经营已久,为鼓励私人经营之积极性,以不清算为原则。但其数额特别巨大,情况较为特出者,仍应加以清算处理。

10. 利用其国民党时期之特殊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运用国家资金,作私人投资,应视作官僚资本,予以没收。

11. 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利用职权,侵占、盗窃或隐匿公有财产,据为己有者,应予没收。

12. 国统时期,贪污有据,臭名昭彰,而积聚财富者,应没收其贪污财产。

13. 地方官僚资本亦照上项原则处理,起义将领,所经营之生产事业不加处分,违法经营者,应加调查清理。

1950年,中财委私营企业局提出《关于处理敌伪产业的初步意见》,指出:“敌伪产业,包括敌伪本身生产事业及敌伪强占的私人生产事业两部分而言,其他不属于生产性质的事业,不在此处提出处理范围之内。”这个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以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为

目的,尽早解决历史纠纷,彻底清理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

在接收官僚资本的过程中,由于主要采取革命的强制手段,在面对复杂的企业资产和股权,特别是对过去的公私合营企业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为此,1951年1月5日,政务院第66次会议通过(2月4日颁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开始清理公私合营企业和有公股公产的私营企业中的资本。该办法明确规定要清理的“公股公产”为:一、国民党政府及其国家机关、金融机关等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二、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三、业经依法没收归公的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等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四、解放后人民政府及国家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对企业的投资。<sup>①</sup>这一办法也是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即向公私合营经济领域的拓展。

在实施《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的过程中,为了把握政策界限,政务院又颁布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指出:

一、凡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的股份和财产,应予依法没收时,必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审核后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方得执行。在未得批准前,为了防止破坏、转移、隐匿,只能予以登记、冻结或查封,不得宣布没收。

二、属于前条以外的一般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经县(市)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时,应由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之专署)批准执行;经省(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者,得不经报请批准手续。

三、过去经由县(市)人民法庭、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或各级人民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452页。



政府决定没收的前两条所称之财产,业经执行而无异议者,不再变更。

四、企业中有本指示一、二两条所称之财产尚未经政府没收者,该企业业务执行人应按照《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第 22 条之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否则依法处罚。<sup>①</sup>

经过清理,作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在新中国经济中获得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的大部分是由于人民政府没收一些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作为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投资而形成的。<sup>②</sup>公股公产清理出来后,作为私营企业中的公股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委托交通银行统一管理。新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 2. 对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促进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认为,官僚资本企业有两重性,可以利用它,先接收后改造,建成国营经济。根据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方针,这一点体现在《共同纲领》之中,第 32 条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sup>③</sup>

1949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为纠正济南铁路大厂所犯开斗争会错误复示山东分局:完全搬运农村斗争方式是非常有害,必须坚决纠正的。强调对企业中的一般旧职员的基本方针,应是团结、争取和改造,争取和改造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 111 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8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739 页。

针对没收官僚资本初期的政策,在建国后政权和社会趋于稳定,人民政权开始着手国营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以清除这些企业中残存的封建制度、反动党团系统和裙带关系。1950年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纺织企业的“搜身制”、工头制和煤炭生产企业的“把头制”;进行人事调整,裁汰冗员。<sup>①</sup>通过民主改革特别是镇反运动,国营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强调政治面貌和态度,政治思想工作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企业民主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一套新型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建国前后企业改革的口号是“经营企业化、管理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是建立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

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会管理企业》。社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应当实行一定的计划性。这就首先要求国营经济各部门有统一的管理以及生产组织,有经济核算、业务经营、企业管理、工资待遇等各方面的统一的制度。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已建立起各产业部门的统一管理机关。各管理机关的首要任务,不仅要根据需求和客观的可能,将工厂企业的管理逐渐统一起来,而且要赶紧制定可能实行的各方面的统一的制度,以便制定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以统一的、合理的、科学的制度,逐渐代替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混乱的、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是目前管好企业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社论指出:“新民主主义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和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另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一切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依靠压迫方法来强制工人劳动生产,是使‘工人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每天每时都被机器、被监工,首先被各个有产者——工

---

<sup>①</sup>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第113页。

厂主本人奴役着’(《共产党宣言》)。这样必然造成工人对劳动的日益增加的厌恶。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企业的管理,则必须启发和依靠工人群众主人翁的感觉,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工人群众能够自觉地进行劳动。把原来被机器支配的奴隶,变成管理机器的自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机器和技术在被自觉的人所掌握的时候,才能进一步发挥效能。这就是为什么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得多的原故。这就是为什么原来比英国德国落后50年到100年的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能在短短的20年(实际上是13年)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和德国的生产水平的原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初步实行了管理民主化的企业在解放后不到1年的时间,就超过了敌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生产水平的原故。因此,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中,必须坚决地改变旧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以启发工人的主人翁的觉悟,发扬工人的自觉的劳动热情。这是改造旧企业、管好人民企业的基本环节。”

社论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企业行政管理干部,对于依靠工人群众的帮助来管好工厂企业的基本思想还没有搞通。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在1948年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所屡次说明的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指示,不愿很好执行,甚至不执行。因此,有些公营企业中,就还保留旧的一套依靠强制压迫的管理制度,在个别的工厂企业中甚至还保留着把头制度和侮辱工人人格的抄身制度。这种现象,必须坚决消灭。<sup>①</sup>

为贯彻、落实上述社论精神,中财委要求各地财经委员会指导

---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4页。

并督促所有国营企业的行政人员学习该社论,立刻着手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并重新印发了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50年2月28日,中财委发布《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要实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伟大任务,“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必须把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sup>①</sup>在企业民主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建立了一套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与此同时,国营企业以生产改革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革新活动,推进了生产现代化的步伐和生产力的发展。

1951年,经过讨论,中共中央在企业管理实行“党委领导制”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了国营企业的基本领导和管理体制。

## 二、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国资本的政策

### 1. 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国资本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时,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有1000多家,主要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拥有职工12万余人。分布在造船、石油、煤矿等重工业和食品、制药、纺织等轻工业领域,还包括一些城市公用事业,以及金融、贸易、仓储和房地产等企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194页。

业<sup>①</sup>。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依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发展起来的，特权被取消后，它们就失去了依靠。同时，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也使许多依靠进口商品和原料的在华帝国主义企业的业务陷于停顿状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sup>②</sup>《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根据这些决议和规定，各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管理的海关，统制了对外贸易，实行外汇管理。

朝鲜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英美等国在华资本的终结。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以报复美国1950年12月16日宣布的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的措施。中国政府下令管制了全部美国在中国的财产。

英国政府也几次劫夺中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因此，中国政府下令征用和代管了部分英国在中国的企业。1951年4月17日，周恩来召集中财委、人民银行、贸易部、交通部、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商议香港英国政府以征用名义劫夺我永灏号油轮的对策，认定：既然英国借口军事原因、公共利益征用我国油轮，我即以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为理由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报复它。这样做，

---

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3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594—595页。

不仅来得直截了当,并可致波及其他英商企业。由于该公司分设在中国 15 个口岸,并有 60 多个推销处,因此,这一回击是重的。“在今天,我们对英国尚只限于局部报复,但也应准备,如果英国敢于扩大报复,则它在华的两亿英镑投资,便是报复代价。”随后,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局并上海市委电,征求对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的意见,并说明宣布征用时间拟在 4 月底,可先在全国宣布,由各地加以管制,然后逐步接管。4 月 30 日,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命令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财产及征购其全部存油。<sup>①</sup>

通过上述方式,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有的因陷于困境而自动歇业,有的以残存的财产抵偿对中国的负债,以转让或申请由中国政府代管等形式,陆续为中国人民收回转入国家手中。<sup>②</sup>

为了进一步清理历史旧账,1951 年 4 月 12 日,中财委提出《企业中资产来自庚款者一般应作公股公产处理》的指示:“庚子赔款系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对我国之勒索,所谓‘退还’不过是将劫掠我国人民的财产仍归还我国,并‘指定用途’,以达到其对我进行经济侵略及文化侵略之目的,我人民政府自不能予以承认。因此,企业中资产,不论全部或一部,其直接来源属于此项退还庚款者,原则上应作为公股公产处理,不应视同外资津贴。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当地主管机关酌情处理。至私营企中曾有指定用途之庚款补助,已经全部消耗者,可不必再予以追究。”

在这些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华外国资本逐步在中国消退。以金融业为例,在实施监管之后,外资银行所依恃的特权和由此而产生

---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8—149 页。

② 吴承明:《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 2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6 页。

的巨额利润消失了,多数外商银行相继申请歇业。1952年以后,外商银行继续在华开业的只有在上海的汇丰和渣打(麦加利)两家英商银行<sup>①</sup>。

到1952年底,我国政府通过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方式,使有关国计民生和带有垄断性的外资企业,如煤矿、石油、造船、机器等重工业全部转归我国所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sup>②</sup>。据统计,到1952年底,外资在华企业已由建国时的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由12.6万人减至2.3万人,拥有资产由12.1亿元减至4.5亿元。到6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外资企业基本上消失了。

## 2. 新型合资企业的建立

《共同纲领》中对新中国经济的规定是“五种经济成分”,对外国资本的存在没有作更多的论述。建国初期,基于与社会主义苏联开展的全面合作关系,并且建立了新型的合资企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始对外国投资和中外合资问题进行认真探讨。

在对待外国资本的问题上,包括中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于有过近百年半殖民地生活史的中国人民有较为强烈的怀疑情绪,在中苏经济合作初期,北京的学生表示了不满,甚至组织了请愿活动。对此,刘少奇在《中央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以后新经济政

<sup>①</sup> 《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sup>②</sup>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sup>①</sup>

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有利于中国建设的中苏合作经济》的社论，其中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有了一定的变化：“有人提出问题：利用外国资本来发展中国工业，和外国资本合作开办合股公司，是否应该被允许呢？我们完全可以负责地答复说：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这在原则上是许可的。不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国家以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不独开办这三个合股公司，就是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原则上都是许可的，在事实上也还是需要的。”<sup>②</sup>

社论提出要从苏联吸收外资经营企业的经验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收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经济技术人员），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苏联不但没有因此丧失主权变成殖民地，而且是变成了世界的工业强国。相比之下，中国更加落后，因此更加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会管理经济业务和学会生产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吸收外资来共同经营我们的企业。

随后中国和苏联、波兰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金属、石油和航运等方面也开始组建合股公司，进行合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吸引外资的余地越来越小，中苏合作成为主要渠道。到6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也基本上消失了。

---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01页。

② 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



#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制度,推翻“两个估计”

黄如军

高考制度被废除和对建国后 17 年教育全盘否定的“两个估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所谓“教育革命”,从而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全面否定、遭受严重破坏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十年动乱结束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是以恢复高考制度和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取得全面进展的。这不仅调动了整个社会读书、受教育的积极性,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高考制度的废除和“两个估计”的出台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高校招生一直实行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录取的制度。与此相适应,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也实行较为严格的考试录取制度。这种录取制度适应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例如,导致学校和学生片面追求升学率、追求分数,并因此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这些问题,无论在教育界和群众中,还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层里都已引起了一些不满意的和要求改革的呼声。

60 年代起,随着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看法的更加“左”倾,党和毛泽东对我国教育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1964 年到 1965 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几次讲到教育问

题。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从他多次讲话和有关批语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课程要减少,学制要缩短;教学方法不要满堂灌,不要死记硬背;考试应公开,可以看书本;强调接触工农,重视实践经验;等等。其中,他最为不满、批评也最为激烈的是考试制度,他认为,那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整学生”,因此,“要完全改变”<sup>①</sup>。

应该说,毛泽东看到了当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他的上述思想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有些问题,即使在当前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也是亟待解决的。但是,那些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的思想,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的日趋“左”倾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逐步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极端。

1966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即,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五七指示”)又提到教育问题,他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sup>②</sup>

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首先拿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开刀”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sup>③</sup>中明文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4页、34页、96页、39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③ “五一六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党和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和所谓“教育革命”的基本思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深受其害。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1966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这个通知,并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号召把资产阶级的高考招生制度“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因为,“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因此,废除招生考试制度,“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

一个多月后,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高校招生的通知,作出“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实际上,这个规定已经无法落实了,在“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当年,高校停止了招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大中小学学校陷于一片瘫痪,师生员工大多被卷入内乱之中。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乃至校舍等等,大多被砸、被毁;校长、教师大多被无辜批斗、受到迫害;整个社会刮起一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与此同时,以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名,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招生、办学、教学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制度,以及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起来的大批有用人才。后来,虽然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相继“复课闹革命”,但是,“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sup>①</sup>在那样一种动乱局面中,在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和教学秩序已经遭到破坏、教师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复课闹革命”的效果是不难想象的。不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一些高校或被撤销,或被迁往农村,大学教师则“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实际上已经停办。

不过,完全不办学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本意。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就大学教育改革讲了一段话。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几天后,毛泽东在修改由陈伯达、姚文元组织的调查报告稿时又提出:“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sup>②</sup>7月2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由新华社发了通稿。7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加了编者

①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05页、509页。

按,在编者按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根据这个谈话,后来概括出了一个高校办学的“七二一道路”。

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长达4年之久后开始招生复课。197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恢复招生的试点,但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则缩短为2至3年。工农兵学员在学习期间的任务被确定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sup>①</sup>。这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学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打乱了原有的教学体系,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它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小学里也造成了教学秩序的混乱和教学质量的下降。

为了推动“教育革命”的开展,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姚文元修改,由张春桥定稿的《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即“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出发,会议及《纪要》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所谓“教育革命”的政策,例如“工宣队”、“贫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

---

<sup>①</sup>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的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和“七二一道路”；“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等等<sup>①</sup>。从那以后，《纪要》及其作出的“两个估计”，就成了戴在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邓小平整顿教育的努力

对于“两个估计”和废除高考招生制度等“教育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内外干部群众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曾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抵制和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不同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曾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两次比较有影响的整顿。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当张春桥、迟群等提出建国后17年教育“黑线专政论”和“两个估计”时，与会的一些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因此同迟群等人发生了争论。得知情况后，周恩来于7月6日约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争论，他明确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sup>②</sup>显然，这是不同意“两个估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领导批极左思潮和进行一些工作整顿时，对文教工作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1972年7月2日和14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著名美籍华人学

---

<sup>①</sup>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年7月27日。

<sup>②</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页。

者杨振宁。杨振宁对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才交流、培养,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认为这些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强。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当场对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sup>①</sup>

不久,在会见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时,周恩来又谈到了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教育问题,他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他还强调,“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我们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他还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sup>②</sup>

周恩来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两个估计”的不同看法;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三是高等学校可以从中学毕业生中直接招收一部分学生。这些与“教育革命”的那些论调和做法是不相同的,它说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人一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提出一系列旨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的思想。《人民日报》等报刊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类似的文章,提出了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水平要求。这些文章实际上是批判了“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来备受压抑的教育、科研部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立刻遭到“四人帮”的围攻。

---

① 周培源:《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见1977年1月6日《北京日报》。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58页。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宣称：“不管周培源的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四人帮”还指使《文汇报》等报刊连续刊登文章，“批判”周培源的论点。尽管由于“四人帮”的竭力阻挠，周恩来整顿教育的这些思想和努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时，强调“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sup>①</sup>。针对科技和教育部门不重视知识、不关心人才、不抓科研、只讲“红”不讲“专”的歪风，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作了严厉批评，他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sup>②</sup> 这些讲话，矛头直指“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和所谓的“教

---

<sup>①</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第33—34页。



育革命”。

在部长周荣鑫的领导下，教育部积极贯彻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指示精神，多次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和汇报会，对“教育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例如，建国后 17 年教育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1972 年的教育工作是不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要整顿的要求，教育部起草了向国务院呈送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教育整顿的具体措施。在汇报提纲<sup>①</sup>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25 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因此，他要求教育界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sup>②</sup>

但是，如同其他方面整顿的命运一样，“教育要整顿”的问题一提出，“四人帮”就以所谓“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右倾回潮”、“右倾翻案”为由，在报刊上、在教育和科技部门，以及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了多次围攻，诬陷邓小平支持和领导的教育整顿，是“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并断言，“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他们强调：要“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就

---

① 这个汇报提纲因周荣鑫遭到“四人帮”的打击迫害而未能定稿。

② 国家教委：《光辉的典范，历史的丰碑》，见《回忆邓小平》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7 页。

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sup>①</sup>。他们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sup>②</sup>。

在毛泽东的错误支持下，中央对教育整顿工作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学校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sup>③</sup>。紧接着，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只进行了2、3个月的教育整顿，同其他方面的整顿一样被迫中断。

### 恢复高考制度，推翻“两个估计”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在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尽快清理和改变“文化大革命”给教育造成的混乱状况，就具有不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1977年5月，尚未复职的邓小平两次就教育和科技问题发表重要意见，特别是在5月24日批评“两个凡是”的著名谈话中，他针对教育工作的现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还针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sup>④</sup>

---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

②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第48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1页。

但是,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人们心底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许多人在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某些明显错误时,依然心有余悸,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6、7月间,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揭批了“四人帮”和他们制造的那个“白卷英雄”对教育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但是在讨论到会议的主要议题,即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时陷入了困境。问题的症结就在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奉行的“两个凡是”上。因为“教育革命”和“两个估计”,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招生制度,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倡或批示同意的。虽然大家都看到了“教育革命”的危害,但是,在当时,否定现行的招生办法,就有可能要承担“复辟17年资产阶级统治”、“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政治风险。

当然,对于招生制度要不要改革与怎么改的问题,会上还是发生了争论。有人提出应按照1972年周恩来提出的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意见,恢复高考录取制度,允许选拔一些高中生直接升大学。但是,由于不敢否定“两个凡是”,会议没有接受这些意见,最后还是决定维持现行的招生办法,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小的修补,即根据周恩来1972年有关指示精神,试招收占总人数2%至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sup>①</sup>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维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关于文化考查,仍如往常一样要求“重视文化程度”,“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

---

<sup>①</sup>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99页。

又认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总之，太原会议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老路。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任务又落在了这位三落三起、刚刚复出、但拨乱反正的气魄丝毫不减当年的邓小平的肩上。复出伊始，他就向中央提出，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sup>①</sup>

7月29日，恢复工作仅仅一周的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就教材的进口和编写、在大中小学办重点学校、清华和北大的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和科研的中心、研究生的培养、教师的待遇、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

两天后，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时，再次就教育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比较急迫的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sup>②</sup>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8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30—32页。

紧接着,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拨乱反正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科学家和教授座谈,当面听取他们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意见,“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sup>①</sup>

座谈会集中谈了当时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又特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两个估计”问题。再一个是高校招生问题。与会的科学家、教授们认为,“两个估计”对教育破坏极重,但是非至今没有澄清,这就使干部不敢抓工作,教师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澄清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的是非;重新树立起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文明的风尚;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待遇。

高校招生则是座谈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大家在发言中纷纷揭露推荐上大学的弊病,认为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主张立即恢复文化考试。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后来他成为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发言中强烈呼吁,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的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

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sup>①</sup>

这一番话，引起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教授们的强烈共鸣，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改革现行招生制度。座谈会上，邓小平就这个问题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sup>②</sup>他还当场要求参加座谈会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将教育部刚刚报送国务院的、维持原有推荐招生办法的报告追回来。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就科学和教育工作发表讲话<sup>③</sup>，讲了6方面的问题。他着重讲了广大知识分子最为关心的“两个估计”问题，明确肯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他还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因此，“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对于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

---

① 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 国家教委：《光辉的典范，历史的丰碑》，见《回忆邓小平》中册，第151页。

③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58页。

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个讲话很快在教育和科技界传开了,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但是“两个凡是”仍被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包括教育部的一些领导视为禁区。

科教座谈会后,就在党的十一大开幕的第二天,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尽管邓小平已有明确指示,但是,对于废除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不少人仍心有余悸,“两个凡是”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十一大仍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到招生工作会议上,引起了一些人的犹豫和动摇。但是,大多数与会者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强烈呼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为了让中央领导更加了解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要求,推动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招生工作会议期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出席会议的6位省部级分管教育、科学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回顾与分析了“两个估计”出台的背景。这6位同志都参加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了“两个估计”的出台经过。经过座谈,大家取得了共识:“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是教育工作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彻底否定;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也很难再前进一步。《人民日报》的同志还专门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形成经过写成材料,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邓小平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材料,他认为,“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根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专门找教育部领导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他指出:《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

题了”。对“两个估计”究竟怎么看？他明确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邓小平还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领导，要他们大胆解放思想：“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了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sup>①</sup>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促使招生工作会议迅速作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从而给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和写信，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sup>②</sup>

9月25日，长达44天的招生工作会议结束。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重新制定的招生工作文件。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招收研究生制度，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大学生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

---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6—71页。

② 国家教委：《光辉的典范，历史的丰碑》，见《回忆邓小平》中册，第152页。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新的招生规定一经公布,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1977年冬天,570多万知识青年走进了已关闭11年之久的考场,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各大专院校录取。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隔半年。1979年,468万人报考,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占66%以上,高校又录取27万人。这3年,全国高校共招生94.5万人。此外,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210所高等学校和162所研究机构共录取1.07万名研究生,还有26所重点高校在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sup>①</sup>从1980年起,高等学校就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制度。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轻视科学文化、轻视知识分子观念,开始转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这不仅为被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提供了通过考试、靠自己努力和平等竞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也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偏见,从而在社会上和青年中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高考制度恢复后,不仅年轻一代从多年沉闷的精神状态中奋起,广大教师也倍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改变。

招生制度改革后,“两个估计”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和否定,一

---

<sup>①</sup>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99、507、519、548页。

些深受“两个凡是”之害的人仍顾虑重重。正当教育部门为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而犯难的时候,有关方面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一份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一段谈话记录,汪东兴这才表示同意否定“两个估计”<sup>①</sup>。根据记录,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17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sup>②</sup>在“两个凡是”依然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找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记录还是很起作用的。据此来批判“四人帮”、否定“两个估计”,就使得那些因“两个凡是”而心存顾虑的人们也无话可说。

在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后,又因为找到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教育部领导的态度开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接着,1977年11月18日,根据邓小平9月19日谈话精神,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开始公开批判“两个估计”。这篇文章刊载于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和同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及其对教育的破坏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教育界、知识界终于推翻了多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的拨

---

① 张德成:《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始末》,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乱反正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此前后,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陆续从所有大中小学撤出“工宣队”或“贫管会”,恢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1978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发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学制度。2月17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办好重点高等学校,并确定第一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其中恢复原有的60所,新增加28所。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在高等学校全面恢复教师职称评定工作<sup>①</sup>。在此基础上,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针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和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强调,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师质量,提高教学水平,加强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纪律。他还提出:“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sup>②</sup>至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的混乱状况,开始恢复正常。

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同其他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一起,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又有力地推动着拨乱反正的进一步深入。正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思想解放的大潮。

---

<sup>①</sup>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508—512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9页。

##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

丁 敏 京

1998年是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65周年。这年5月，应俄中友好协会及国际儿童院的邀请，40多名曾在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中国学生回到阔别近50年的校园，参加庆祝活动。他们在原来的校舍前留影，拜访已97岁的原儿童院的老师……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童年时代的生活影子，重温当年的那个大家庭生活。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3月，共产国际建立。为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后代，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准备发起创办国际儿童院。

1926年，瑞士女共产党员曼托娜·莫泽尔将其父亲——著名的莫泽尔钟表公司经理留下的遗产，捐献给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以资创建国际儿童院。在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的组织筹划下，1929年8月1日，国际儿童院在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落成。这一天正好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纪念日，因而瓦斯基诺儿童院亦称“国际红日儿童院”、“国际八一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最初可接收六七十孩子，后来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斯塔索娃倡议在距莫斯科以东300公里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伊万诺沃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得到伊万诺沃市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热烈响应。1929年8月20日，数万名伊万诺沃工人在纪念1905年革命的集会上，号召为

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募集资金,随即开始了坚持几年的星期六、星期日义务劳动。伊万诺沃市工人群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各地做出了榜样。很快,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及其他城市的群众,也以同样的形式为建设儿童院捐款。1931年,由H. II. 巴尔胡洛夫设计的儿童院开始施工。1933年5月1日,一所规模大、设备全的儿童院竣工。为表彰斯塔索娃,儿童院被命名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又称国际第一儿童院。当年夏,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全部迁移至此。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又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国际第二儿童院。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抗战,决定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定为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用。1941年,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世界战争的影响,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孩子们又重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领导的儿童院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几十年来,国际儿童院共培养近30个国家,70多个民族的2000多名儿童。现在还有300多名亚非拉等地的儿童在那里学习。校名已改为“国际住宿学校”。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许多人被迫隐姓埋名,转入“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后代流离失所,陷入极其悲惨的生活境地。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生母杨开慧牺牲后,便流落在上海街头,做小工乞讨度日;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武汉被迫当了童养媳;朱德与其在襁褓中的女儿朱敏17年后才见面;有些孩子的父母在战争中牺牲了,而他们至今都不知父母们的模样及生死下落……。当时,为了保护和抚养这一批孩子,党组织决定,将流落在各地的孩子,陆续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其中极少数孩子从法国转道苏联或从大连、东北到达苏联外,绝大多数经由新疆赴苏。新疆军阀盛世才阻断这条国际通路后,被送往苏联去的孩子也大大减少。1941年,

最后一批中国孩子到达苏联。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百名中国孩子(其中有 20 多人出生于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受到教育,不断成长。瞿秋白、苏兆征、赵世炎、林伯渠、刘鼎、沈志远、蔡和森、张浩、毛泽东、任弼时、张太雷、郭亮、李富春、林彪、曾三、韩铁生、刘少奇、陈昌浩、邓发、高岗、陈伯达、秦邦宪、王一飞(湖北人)、罗亦农、朱德、王一飞(浙江人)、谭忠余、伍云甫、武胡景、李俊夫、沈泽民、柴国栋、肖寿煌、萧三等先驱者的后代都曾先后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

前后三所国际儿童院虽然实行了不同的院内生活学习与院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但是按照苏联 10 年一贯制的教育制度实施教育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为中国孩子们各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产生了终生的影响。这些孩子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原受有教育程度的差异,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除个别孩子在修完 7 年课程便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外,大部分修完 10 年制课程,又考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有小部分未学完全部课程便回国工作。学生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学、动植物学、俄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宪法、俄语、德语及本国语等。此外,也参加了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如:歌咏、舞蹈、摄影、绘画、滑雪、打球、拉练、冷水浴、篝火晚会等,并在老师的辅导下进行了多种劳动,像缝纫衣服、打扫卫生、修理桌椅、制作工具、种菜养马……这不仅陶冶了他们的情趣,锻炼了体魄,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习惯,而且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国学生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如:蔡博(蔡和森之女)、林莉(张浩之女)、郑耀华(郑一俊之女)以各科毕业考试均为五分的成绩而获得“金质奖”殊荣;林琳(林伯渠之女)继从八年级越级进入十年级后,又以全优的成绩中学毕业,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

当年，国际儿童院敞开了广阔的胸怀，接收了来自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日本、朝鲜、法国、英国、伊朗、美国和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孩子。除苏联外，德国、保加利亚派出了自己的教员。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师哲、郑一俊、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等到儿童院先后担任教员。学生们得到了各国领导、政府与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主席皮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利、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萧三等都曾到儿童院看望过学生们。学生们也常到鲍罗廷、野板参三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领导人家中做客。苏联政府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学生们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学习、生活和娱乐条件。在“生死之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卫国战争时期，伊万诺沃城的许多工人从自己很少的粮食定量中挤出一部分送给学生们；儿童院的教师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附近农村为学生们弄食品；为了寻找不幸落入德国法西斯手中的朱敏（朱德之女），斯大林发出了“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的命令……这一切温暖了这些失去父母、远离父母或不知父母音讯的学生们的心，造就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和观念促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当法西斯的侵略战火燃烧到身边，学生们勇敢地拿起刀枪，竭尽全力和苏联人民一起投入到血与火的卫国战争中。这批中国学生中，11岁以上的都经过卫国战争的战火考验。为了保卫莫斯科，他们曾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挖战壕，冰冻的土地硬得像铁，十几斤重的镐，一镐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刨几下虎口震得

流血,但他们硬是按计划完成了任务。由于顿巴斯、乌克兰煤矿基地被德军占领,苏联各地冬季取暖燃料十分缺乏,为保证供暖,男女孩子都参加了伐木工作。他们住在森林附近的帐篷内,每天吃一点点粗粮做的黑面包,却要完成1立方米的伐木任务。不少孩子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晕倒,但最终都胜利完成了任务。较大一点的孩子参加了苏联红军预备役,接受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中沈林如(沈志远之子)、赵施格(赵世炎之子)被授予少尉军衔,毛岸英被授予中尉军衔。李特特(李富春之女)、郭志成(郭亮之子)分别获得“马克西姆机关枪手”和“反坦克手”的光荣称号。长期革命思想的浇灌和成长道路上的各种磨炼,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在他们回国后,尽管生活和工作历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始终不渝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生们虽身居异国他乡,但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们中的一部分出生在苏联,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幼儿,但是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大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这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初进儿童院的大门,学生们上的第一课即是爱国主义的教育课。1942年7月1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学生们的回信中告诫大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的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要记住,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是时时关心着这批在苏联生活的孩子。1946年1月8日,毛泽东给蔡博同学的信中写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



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这一切使孩子们深受鼓舞。毛岸青在中学毕业作文考试里,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儿童院的学习生活,立志勤奋学习,并勉励周围同学,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好为祖国作贡献。通篇文章充满了对祖国人民诚挚朴实的爱,获得了全体主考老师的好评,并在电台播送。

学生们身在儿童院,但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学业选择时,都充分考虑将来祖国的需要。1950年中国与苏联政治局达成协议:凡在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孩子们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在这块父母生长又为之战斗洒过热血的土地上默默辛勤地耕耘。像拍摄了60余部新闻纪录片及大量珍贵历史资料片,获得斯大林奖的摄影师苏河清(苏兆征之子);保家卫国而捐躯的毛岸英;核专家刘允斌(刘少奇之子);水力、电力专家罗西北(罗亦农之子)、韩模宁(韩铁生之子);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刘爱琴;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快艇艇长王苏南(王毓锋之子);培养出郑凤容、郑达真等跳高世界冠军的教练黄健(黄平之子);汽车工业的元勋陈祖涛(陈昌浩之子);钢铁专家赵施格、沈林如;白衣使者蔡博;芭蕾舞编导艺术家肖苏华(肖茂荣之子);共和国第一代水下电影拍摄工作者萧立昂(萧三之子);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的骄骄者瞿独伊(瞿秋白之女)、于彬(于炳然之女)、林莉、刘霞(刘辉山之女);曾赴燕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等人烟稀少地方考察的地质专家郑新华(郑一俊之子)……几乎各条战线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向祖国和人民献上了一颗赤诚的心。

伊万诺沃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它磨炼了学生们的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早在1905年,伊万诺沃人民在伏龙芝领导下参加了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前曾在这里建立起第一

支工人武装。儿童院经常邀请这里的老工人、老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红军指战员到院里给学生们讲述革命斗争的故事；带领学生们参观工厂和革命遗址。院里的少先队、共青团也组织学生们阅读《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布琼尼、夏伯扬、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马列谢也夫等许多英雄的事迹，时时刻刻激励他们前进。

在儿童院里，孩子们过着集体的寄宿生活，有时他们也和校外的苏联孩子共同学习生活，相处很好。平时他们经常一起阅读、讨论各国的名著和民族英雄的书籍，彼此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学习，打破了民族、肤色的差别，使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深嵌其心，对形成他们的人格力量，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从小形成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心理，没有“中共领袖子弟”的概念；他们鄙视特权，反对盛气凌人；他们崇尚公正、诚实、善良，独立地解决集体内部发生的问题，而不依靠老师的权威；他们互相勉励，虚心向品学兼优的同学学习，别人的成绩视为集体的光荣。每个人都从这种互助友爱、真诚团结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和不尽的温暖，以至几十年过去了，儿童院的共同生活依旧成为他们每个人美好的回忆，终生的情义和学习、工作和生活信心的源泉，成为他们内在美的素质和能力。

国际儿童院孩子特殊的成长道路，形成了其特有的性格和习惯。回国后他们以父辈为榜样，一方面努力适应社会，一方面将儿童院养成的美德注入社会，不向党伸手，不搞特权，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辛勤耕耘，用自己的正直、奉献与无私去获得人民的理解和尊敬。

## 解放战争时期的傅秋涛

蒋 杰 谭允智

傅秋涛,1907年8月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南乡安定区程家园的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参加了平江农民扑城暴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率领赤卫队参加攻占长沙的战斗。1932年4月当选为湘鄂赣苏区总工会委员长,次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1941年11月,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曾参加党的七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1年8月25日逝世。

傅秋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一)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傅秋涛任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

当时,我华东部队正在进行津浦战役,阻击从徐州北上的国民党军队,并迫使徐州到兖州一线日军投降。傅秋涛到任后,领导鲁南军民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组织数十万群众,彻底破坏兖州至柳泉的铁路,控制津浦铁路260余里及临城至枣庄支线60余里,切断了国民党军北上的通道。

根据华东局的指示,鲁南军区积极开展对伪军吴化文部的争取工作。吴化文原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委任他为中央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有部队2万多人,驻防在津浦路徐州至泰安一线。津浦战役期间,我军在滕县界河地区,消灭吴化文一个军4000多人,俘虏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为了争取吴化文,对该部俘虏人员,经教育后大部释放。以后通过靳文元给吴化文写信,陈述我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傅秋涛派军区联络部长胡成放到兖州和吴秘密谈判。吴化文同意和我军建立联系,并表示待时间成熟后起义。不久,吴派独立师参谋长董子才到鲁南军区与傅秋涛面谈,要求我军允许吴部驻大汶口的赵广兴团撤出。傅经上级同意后,答应了吴部的要求。以后陈毅又派华东野战军联络部长刘贯一到兖州与吴化文谈判,同意吴部暂不起义,双方建立电台联系,并签订了若干有利双方活动的协议。

1945年11月下旬,傅秋涛主持召开了鲁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七大会议的精神,分析了山东和鲁南的形势,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支援前线作战,大力发展军队,开展群众运动,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持并扩大鲁南解放区。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傅秋涛大力加强军队建设,在部队整编的基础上,从1946年3月开始,掀起“百日练兵”高潮。政治训练主要是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克服抗战胜利后贪图安逸、放松警惕的和平麻痹思想,充分做好继续作战的思想准备。军事训练主要是投弹、射击、爆破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百日练兵”运动澄清了战员的一些混乱思想,提高了斗争意志,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集中5个师5万多人的兵力,向鲁南大举进攻。鲁南区党委召开反内战誓师大会,揭露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团结对敌，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积极贡献；要求部队指战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坚决击退敌人的进攻，为人民立新功。

1947年1月，我军举行鲁南战役。根据战役部署，傅秋涛和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我军右路集团军。2日夜开始进攻，3日完成了对敌二十六军的合围，很快歼灭了敌二十六师师部及四十四旅全部，并切断了敌二十六军的退路。陶勇、叶飞率领左路集团军，攻占了大官庄、兰陵等地，分割了敌二十六师与整编三十三军的联系，从而实现了预期的左、右集团军会合、围歼第一快速纵队的战役目的。为了消灭第一快速纵队的机械化部队，傅秋涛动员群众，根据地形挖了许多深沟、陷井。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敌人的坦克、大炮、装甲车都陷入泥潭，无法行动，除几辆坦克逃跑外，绝大部分被我军歼灭。我军乘胜攻击，在峯县、枣庄歼灭了整编第五十一师及二十六师余部，活捉了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在鲁南战役开始前，傅秋涛向陈毅汇报了作战准备和支前工作，并问陈毅还需要作什么准备，陈毅诙谐地说：我什么也不要了，就是要一个马励武。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5万多人，圆满完成了活捉马励武的任务。鲁南地区共动员60多万民工支援前线，保证了鲁南战役的军需供应。

2月下旬，我军又进行了莱芜战役，一举歼敌7个师。傅秋涛领导鲁南军民大力支援了这次战役：一面广泛开展游击战、地雷战，破坏交通，阻击、迟滞敌军北援；一面组织民工大力支前，将原为鲁南会战准备的几千万斤粮食、弹药迅速北移，鲁南各县民工和常备担架队，不怕困难，顶风冒雪，和鲁中地区人民一起，胜利完成了抢运任务。

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从1947年3月开始，

对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3月下旬，敌人集中13个整编师共25万人，开始向山东重点进攻，企图先打通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全部占领鲁南解放区，然后再进攻沂蒙山区，与我主力决战。4月上旬，傅秋涛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国民党对陕北重点进攻和延安军民召开大会的情况，提出：全体军民，要坚守鲁南阵地，把好山东南大门，把敌人牵制在鲁南山区，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当时，鲁南是重兵压境，敌人十分猖狂，县城和重要乡镇均被敌人占领。在土改运动中逃跑的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乘机对乡村干部和翻身群众反攻倒算、血腥镇压、残杀无辜群众。国民党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久残杀干部、群众1000多人，泗水县的还乡团在一个村庄就活埋群众100多人。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傅秋涛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等充分认识到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经华东局同意，他们将党政军机关的老弱病残和干部家属及部分村干部等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渤海地区。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组成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所属部队及县区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4月份1个月中，与敌人作战97次，毙伤国民党部队和还乡团1400多人，俘虏500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为了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我军主力于1947年5月中旬，举行孟良崮战役。为配合这次战役，傅秋涛领导鲁南所属部队，积极向临沂、费县地区敌人进攻，歼敌300多人。之后，分路破坏敌人交通，切断其补给线，牵制了敌人3个师的兵力。同时，他还组织精干民工，冒着枪林弹雨，往前线运送物资，抢运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孟良崮战役后，蒋军集中正规部队40个团，会同地方保安团共10万多人，于5月下旬再次向鲁南解放区进行反复围攻和清

剿。傅秋涛和张光中率领部队，与敌周旋。6月6日，鲁南党政军机关干部和10几个县的干部、民兵、家属共5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在抱犊崮云涧峪一带。7日晚，傅秋涛和张光中率领部队突围，经车辆、长新桥、卡庄到芦柞鹅蛋一带，又遭三面敌人围攻，我军英勇阻击。8日下午大部军民向涌泉转移。转移途中，又遇狂风暴雨及冰雹，道路泥泞，部队群众衣服都被淋透，很多人的脚被磨破、鲜血直流，有的感染化脓，粮食也难以筹集，军民饥寒交迫、伤病员增多，病倒在途中的约有千余人，经当地群众大力抢救，大部脱险。傅秋涛与张光中当晚在涌泉宿营，安置伤病员。9日凌晨3时，在军区特务团和十七、十九团掩护下，组织部队渡过沂河，到达滨海区临沐县的店頭泉源。

傅秋涛曾说过：“这次突围到滨海区是形势所迫。在向华东军区领导汇报时，作了挨批评的准备，因为当时领导要求坚守阵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我从鲁南撤到滨海区，一定受批评。”但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听了突围情况汇报后，认为他们在鲁南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坚持过来，保存了几个主力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群众，是很不容易的，转移到滨海区休整一下，也是必要的，并鼓励他们休整后再回鲁南坚持斗争。华东局对鲁南突围的部队和干部发了慰问信和慰问品，使他们非常感动。

傅秋涛及鲁南党政领导人在滨海休整期间，对返回鲁南坚持斗争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从6月16日开始，领导机关和部队分批返回鲁南。傅秋涛返回鲁南后，立即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坚守阵地，反对右倾退却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思想。号召党政军干部，树立信心与群众同甘苦；一面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一面要搞好土改，发展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蒋军及还乡团，战胜困难，坚守鲁南战略要地。

1947年7月，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刘邓大军强

渡黄河，揭开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华野第一、第四纵队，从鲁中挺进鲁南，先后攻克费县、枣庄、峄县等地，鲁南形势逐渐好转。10月临沂敌人弃城逃跑，我军再克枣庄，进逼滕县城，将敌压缩在津浦铁路两侧的狭窄地带，鲁南山区全部光复。

傅秋涛领导鲁南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5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二)

傅秋涛到鲁南后，在领导军民加强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支持开展群众工作，并将发动群众翻身解放与组织群众参军、支援战争密切结合起来。

1945年10月，在全力支援津浦战役的同时，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1946年2月上旬，鲁南区党委发出《关于大胆放手开展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指示》，决定集中5个县的区村干部到新解放区进行为期3个月的群众运动。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控诉、公审大汉奸、大地主、恶霸、土匪头子等反动分子，没收其土地、房屋和粮食分给贫雇农和减租减息，摧毁了伪政权，削弱了封建势力，提高了群众觉悟，普遍建立了群众组织和基层政权，发展了群众武装，并掀起了参军和生产高潮，使新解放区得到迅速的巩固和发展。

1946年5月下旬，华东局在临沂召开高干会，传达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鲁南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临沂会议的精神，明确提出：目前鲁南是自卫战争的重要战场，必须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同时必须担负支援战争的紧迫任务。7月中旬，区党委组织土改工作队在滕县3区进行土改工作试



点,取得了经验,接着在滕县和整个鲁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到年底初步完成了土改任务。

1947年秋季,鲁南山区开始恢复工作。由于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镇压,群众普遍存在复仇情绪,同时,从其他地区也不断传来乱打乱杀的情况,一些地区的群众产生了自发捕抓地主乱棍打死的现象。傅秋涛等认真听取了下面的汇报,研究解决的办法,坚决贯彻了华东局《关于停止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及时作出《停止土改、严禁乱打、乱抓、乱杀的决定》,提出对地主审判要经过“人民法庭”,从而纠正了群众中一些过左的行动,引导群众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1948年1月上旬到2月下旬,鲁南区党委在平邑县王崮山村召开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华东局召开的大鲁南土地会议精神,并讨论1945年保和庄会议的评价问题。会议由傅秋涛主持。会议在讨论保和庄会议的评价时引起激烈争论。傅秋涛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弄清了情况,并请示华东局后,先后作了关于保和庄会议问题的报告和讨论总结。他肯定了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8个月以查减工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贯彻了党中央的政策,发动了群众,摧毁了封建统治,改造了基层政权,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党群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翻身农民的参军支前热情空前高潮,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指出:1945年3月至5月,在边联县保和庄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有一定错误,主要是:认为这8个月的查减运动,在“创穷根”、“算旧账”的口号下,把削弱封建势力变成消灭封建势力,背离了党的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并决定纠正群众运动的过“左”倾向,客观上起了泼冷水作用,挫伤了基本群众和运动中骨干分子的积极性。傅秋涛的总结发言受到与会者的赞同。2月21日,傅秋涛作了《鲁南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鲁南今后的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鲁南阵

地,压缩敌战区,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战略反攻。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澄清了是非,解决了思想分歧,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为开创鲁南地区的新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王崮山会议后,傅秋涛领导鲁南军民全力进行生产救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进攻,大批青壮年被杀害和抓走,劳动力减少,大量土地荒芜,群众普遍缺粮,很多难民外逃,部分地区瘟疫流行,死亡人数逐渐增加,鲁南地区的灾情相当严重。鲁南区党委根据华东局指示,停止土改,全力进行生产救灾,很快稳定了人心。外逃的灾民纷纷返回家乡,部分地区瘟疫也被控制住,群众的生活得到基本保证,从而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

经过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特别是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汉奸、恶霸和地主,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经过生产救灾运动,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为支援战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三)

1947年7月,我军战略进攻开始后,华东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由陈毅、粟裕率领西线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东线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1948年5月至7月,东线兵团进行津浦中段战役,先后恢复泰安、曲阜、邹县、滕县、济宁、枣庄等地,歼敌6.3万多人,控制津浦路200多公里地段,使山东与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济南守敌完全孤立。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华东局决定将鲁南、鲁中两个区党委和滨海地委合并,成立鲁中南区党委,任命康生为区党委书记兼鲁中南军区政委,傅秋涛为副书记、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傅秋涛在曲阜召开鲁中南地

委、专员联席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支前工作和新解放区及城市工作等问题。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举行济南战役，徐州敌人可能增援，要作“围城打援”的部署。这一仗如打好，山东可以全部解放。所以说，这次战役对山东有决定意义。要把支援战争作为中心任务，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傅秋涛作了总结发言，强调指出，打济南、打徐州是关系到打倒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的光荣任务，鲁中南地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支援前线，要加强统一领导，全力以赴，各级党委和干部都要带头把支前工作认真做好。

9月中旬，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兼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前方办事处成立，傅秋涛任主任，支前委员会成立后即全力投入支援济南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兵民工50多万人，运送粮食5900万斤，其他军用品物资45万斤，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11月4日，成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任主任。在“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等口号下，进行群众动员，战役发起前，动员60多万民兵民工，将1.8亿斤粮食运到战区。组织群众修通公路300余里，大路95里，桥梁380座，使鲁中南地区交通干线全部畅通。战役进行中，抽调干部400多人和民工积极分子4000多人，到附近400多个村庄协助地方政府就地筹粮。在4天之内就筹集粮食300多万斤，并将240万斤粮食加工后赶送到前方部队，解决了缺粮困难。为了保证前线部队的油盐供应，还成立了油盐供应总站，从12月8日至17日，调集了800多辆小车，向前方部队运送油17万斤，盐37万斤。徐州解放后，傅秋涛兼任徐州军管会主任，他在徐州动员商用汽车257辆，在18天内往前线运送粮食430万斤和大批弹药。

12月中旬以后，由于战线转移，战局扩大，参战部队增加，前

线吃粮人数约 120 万人，加上马匹等消耗，每天需粮 300 多万斤。而且运输线延长，时值冬季，雨雪交加，前线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决定由刘瑞龙（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和傅秋涛二人在徐州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召集华东、中原、华北有关地区和两大野战军的代表，共同研究急需解决的前线粮食供应和民力安排问题。经协商确定，粮食供应和民工安排分地区负责。并对新年期间前线部队的供应作了部署。会议明确了任务和分工，使各地的支前工作，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对完成淮海战役支前任务，满足战场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于 1949 年 1 月 10 日胜利结束，共歼灭蒋军 55.5 万人。2 月，华野在贾汪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淮海战役经验时，陈毅在讲话中指出：“淮海战役是怎样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他高度评价和赞扬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及广大人民群众在支援前线中的伟大作用。

2 月中旬，傅秋涛率华东支前委员会领导机关从徐州移至蚌埠。这时，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要渡淮河南下，准备渡江战役。因蚌埠铁路大桥被炸毁，铁路不通，急需在淮河上架桥。傅秋涛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一面抢修铁路大桥，由四野铁道兵出动 1600 多人昼夜奋战，19 天即架起一座木制铁路桥。一面抢修船桥，将载重 30 吨的大船连接起来，上铺厚木板，用大钉钉好，用以通过汽车、坦克、炮车等。同时另架一条船浮桥，用小船连接起来，用以通过部队人员和民工。因为桥少人多，几十万部队和民工无法按时过完，便组织身强力壮的民工和战士，分两行站在河中，肩扛门板，连接两岸，部队和民工从上通过。时值初春，河水很凉，下河的战士、民工，能喝酒的都喝酒，在河中不能持久，就按时轮换。由于采取了上述紧急措施，保证了大批部队、民工按时渡河的任务。

4 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5 月上旬，傅秋涛等进

驻南京，这时我军正在进行上海战役，需要运送大量支前物资，南京又需大量煤炭供应。华东支前委员会调集 2000 多名干部，投入江北、江淮、皖西和赣北、皖南、苏南、浙东等地区，建立支前基地，组织人力征集粮草；并配备大批干部到淄博、淮南、贾汪等煤矿，负责煤炭运输任务，用以支援部队作战和南京、上海、杭州各城市的粮煤供应。傅秋涛曾数次到浦口车站现场指挥，动员铁路员工争分夺秒，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

上海解放后，傅秋涛等于 6 月底进驻上海，华东支前委员会改为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傅秋涛任司令员，主要任务是运输上海急需的粮、油、煤。因为上海刚解放，市场不稳，许多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粮油煤等是关系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如不能保证供应，就会影响物价波动和社会稳定。傅秋涛领导全体干部像完成支前任务一样，千方百计完成了运输任务，保证了上海市粮油煤的供应，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傅秋涛领导广大人民组成支前大军，保证了前线部队和民工急需的粮油盐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完成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支前任务，保证了前线的胜利，在中国革命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章学新

1941年“九月会议”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央领导层的多数人，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基本上取得共识，但是，这条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起始于何时，“九一八”后组成的临时中央和后来召开党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特别是对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所犯右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危害，以及党内影响团结统一的宗派主义问题等，由于王明先是以攻为守，继而逃避思想斗争，讨论没有展开；加以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当时不在延安，会议只好暂时停顿。

1943年9月，为了深入推进整风运动，加紧筹备党的七大，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讨论王明的错误，消除宗派，巩固团结，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第二次“九月会议”）。毛泽东曾说：“我们虽然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是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sup>①</sup>这是第二次“九月会议”对党的七大的召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

<sup>①</sup> 1943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

##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交织 形成会议的紧张气氛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下召开的。

一是国共关系因蒋介石的政策日益法西斯化而重趋紧张。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暗示两年之内予以解决。5月，他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延安时，蒋介石的代表、时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拟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即是要搞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命胡宗南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反击下，虽暂时停止，但国共关系仍保持紧张状态。

二是面对共产国际的解散，王明再度暴露出严重的投降主义面目。长期养病的王明，对中央给予他的批评根本不认账，一有机会就攻击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整风运动，甚至挑拨关系。1943年初，他曾向从华中前线回延安的刘少奇申诉，企图争取同情，没有得逞。3月，张闻天从晋西北调查归来，王明竟然对他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更多。”他又碰了一个钉子。5月下旬，中央派李富春前去征求王明对共产国际解散的意见。他看了“国际”来电后大放厥词，说什么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可能有进一步的大变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党将与社会民主党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殖民地国家的党将与资产阶级的党进一步实行广泛统一战线。这和拉英美有很大关系；

国民党的性质除十年内战时期外，是民族联盟，带有民主革命的方向，又有民粹派的特点；苏俄过去五年内战即取得胜利，中国党十年内战未打出名堂，原因是革命方面只占偏僻的农村，没有中心城市及工业，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今后国共两党合作形式要进一步改变，这种改变不只是政治方针的变动，而且是组织形式的变动。王明还得意忘形地对李富春说：“这是我的胡说八道。”

王明的这番奇谈怪论，实质上是认为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天要变了。这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新发展，也是他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挑战。

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很久以来，中共“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今后“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sup>①</sup>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由李富春记录整理的王明自称为“胡说八道”的意见。以后，毛泽东一再就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论调进行批判，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毛泽东的批判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政治上的右倾投降。6月16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民党已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少。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01页。



7月13日,他又批评说: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和大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思想,是假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王明。对国民党打共、骂共、捉共、杀共、钻共没有义愤,不坚决反对,是右倾投降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党外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有走向当敌人之危险,如张国焘。

8月30日,从重庆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向政治局汇报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后,毛泽东在讲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时说:王明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回国后,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只分抗战与非抗战,认为中国没有军阀了,被侵略国家就没有法西斯主义。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古今中外反革命之大成,是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蒋出版《中国之命运》,主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又调兵遣将进攻陕甘宁边区,更加反动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还可进行,直到他们向我们有所表示后方可停下来。

(二)党内的宗派主义。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党从四中全会以后,就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宗派是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他说:教条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地之中央局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人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的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3年又4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

功劳,超过李立三、陈独秀,他们没有参加大革命。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上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了洛甫。遵义会议后,抗战以后,教条宗派中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个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帮派,像张国焘。

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吓唬人,与经验宗派中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王明对洛甫说:“整风就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垮,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阶级斗争和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交织的背景下召开的,而毛泽东在会前的一系列原则性讲话,对会议起着引导的作用。

### 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党内斗争 准则,把整风引向健康深入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43年9月7日开始的,之后或

因重要工作穿插,或安排党史文件的学习,或等待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回延安,会议时开时停,直到1944年5月21日结束,历时共8个半月。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和稍后到达的彭德怀等11人,王明、王稼祥、何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会议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3年9月7日到10月6日。

从9月7日起连续3天,会议由博古、林伯渠、叶剑英、陈伯达和朱德发言,揭发、批评王明。

博古揭发,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推行的是一条“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它影响到东南局及华北的若干地方,他承认自己是这条错误路线的“负责者之一”。他从王明对形势和前途的估计、领导权、斗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工作作风等诸方面揭发和批评王明另搞一套,和中央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他说王明只看到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反共到不反共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性的实质。在外国记者面前称蒋介石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说国民党“没有军阀”;两党合作似乎只少一个“共同纲领”和“共同组织”;说抗战要靠国民党,八路军在华中、华南起不了直接配合作用,不同意发表《论持久战》的文章;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说:领导权是对同盟者而言的,无产阶级对农民可以讲领导权,和资产阶级是讲统一战线,不能讲领导权。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的法,放弃独立性,求同不存异,不敢批评,不要刺激;军队则讲“七个统一”,武汉失守前不敢到敌后去组织武装,不发动游击战争;作风上“钦差大臣”味十足,张口斯大

林,闭口法兰西、西班牙,到处发通报,形成另一个中央。博古说:王明的新陈独秀主义“十二月会议”后形成,“三月会议”是高潮,六中全会没有根本解决,皖南事变中彻底破产。

朱德指出王明的新投降主义和陈独秀有共同点:一是不要革命领导权,二是看不起无产阶级的力量,三是瞧不起游击战争,四是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朱德说:中国资产阶级靠自己干革命,老实说是不会成功的,无产阶级不拒绝和它合作,但是你不来我们还是要干的。五是只讲团结,不要批评。两者的不同点是:王明有“国际”的招牌,而陈独秀则是反“国际”的。

叶剑英批评王明不知己,不知彼,不知蒋介石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上“身在毛营心向蒋”,躺在统一战线的软椅上睡觉,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9月13日,康生对前3天的会议开法表示不满,说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他听到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后,故作惊人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王明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这是个大骗局。”它比李立三路线“左”得多,“是代表‘左’的纲领”,“王明主义”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接着,他批评博古不揭发具体事实,“抽象”地批一下“这是不行的”。对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一言以蔽之说:“它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进而他向“在武汉工作过的”周恩来、叶剑英等施加压力,“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更多的揭发”。最后,他趁机洗刷自己和王明的关系。康生说:“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我虽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他)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权。我与王明的关系,如果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有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幸福。”他故作谦虚地说:“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

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

康生所谓“十年也说不清”的问题,在座的周恩来、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是了如指掌的。康生是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长的,“九一八”后,王明临去莫斯科前又提拔康生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的近两年间,康生竭力推行王明比李立三更“左”的“新策略”,先后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和《职运指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篇,乱扣“立三派”、“调和派”、“两面派”等政治帽子。1937年7月后,康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此后的4年内,他在列宁学院讲授的正是他“新发现”的王明“左”的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他不仅策动旅莫留学生联名请共产国际批准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而且还在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招待会上当众高呼“王明同志万岁!”这就是康生不愿与王明“同流合污”的真相。因为会议重点是批判教条宗派问题,康生的借机洗刷和表白,虽然拙劣,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党内两个宗派作了比较后说:教条主义是主要的,苏维埃后期,武汉时期都是教条主义为主,和经验主义者结合,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他说: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项英如没有王明,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毛泽东又指出,我党现在很不统一,目前必须强调统一;要一元化,反对闹独立性。犯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和党有同一性,是党内矛盾,但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党,必须打垮宗派主义。所以他主张先学习有关文件,大家交头接耳酝酿。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

这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9月底和10月初书记处两次开会研究深入整风的办法。10月6日,毛泽东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书记处提出的三项措施:一是为郑重起见,在政治局

委员彭德怀未回延安前整风会议停开。二是扩大学习范围,除了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外,再吸收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先讨论抗战后的问题,再逐段研讨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大会小会和个别漫谈结合。三是成立领导学习的总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书记处还向政治局提出允许参加学习的干部公开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会上,毛泽东讲了学习和形势问题。他说王明的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时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米夫支持下形成的,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全党的,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台祖始,临时中央许多文件的指导思想都从这里来的。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可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5个人,也有执行王、博路线的。没有长的时间,不能使大多数同志觉悟。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要打碎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主要打教条宗派,因为它是经验宗派的灵魂。现大家先讨论,在此期间什么文件、什么人都可以批评,七大再作结论。他告诫犯错误的人要自觉地以灵魂相见。要内力外力结合来克服各种宗派主义。

刘少奇说:在党内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八七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说话。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米夫与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最坏的方法。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和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负责同志要有随时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第二,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

首长。

周恩来是从重庆返回延安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他离开延安3年，在国共斗争最紧张时刻归来，重庆政治谣言颇多，他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欢迎晚会上公开演讲说：“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它”。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讲党内宗派主义时，周恩来郑重地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见，不认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容易崇拜打着马列主义、国际路线旗号的教条主义。他进一步指出，革命者的政治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作为共产党人需要的，但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通过整风来提升自己。有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就团结问题和党内斗争方法讲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团结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求团结，前提是坚决与他们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斗争；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帮助他们克服落后性、狭隘性和动摇性；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斗争，达到内部统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团结，要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问题不要争论才是真正不要团结。为了把党斗好，言论一概自由。关于党内斗争，毛泽东指出陈独秀后期以家长制压制不同意见，是错误的。前年“九月会议”整风，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是中央现在能团结的关键。毛泽东又说：我们所以能坚持下来，原因是有艰苦奋斗的历史传统。内战时期，大多数干部还是正确的，地方宗派中大多

数还是正确的。中央的“码头”，虽是四中全会的基础，但政治上已起了变化，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可能还是有一点残余，所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完全适用。“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

在整风进入组织“火力”、克“敌”制胜的阶段，政治局通过集体讨论，对党内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方法，好坏的传统、界限更加具体明确，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层次地分析了团结的原则和革命者的品质，肯定内战时期大多数党员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正是这种可贵的传统，使得在错误路线统治下历尽磨难的党得以坚持下来。肯定了这点，就把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区别开来；思想政治上的错误和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区别开来；错误路线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区别开来。同时，确立了党内斗争的准则，有利于缓解会议的紧张气氛。这是党成熟的表现。

### 以斗争求团结，就是提倡 自我批评，反对自发论

10月中旬，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经过两个月的研究和学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1月13日进入第二阶段。

在进入第二阶段前的党史学习中，毛泽东在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干会上对王明路线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是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是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是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他指出马列主义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又是一条。要以斗争求团结。11月初，高级学习组召开了几次大会，揭发批判王明。发言者有六大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若飞，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1931年以前他们在代表团团长瞿秋白领导下，曾和王明的教条宗派进行过斗争。陆定一



批评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就利用教条和从米夫那里学来的散布流言蜚语,排除异己,夺取党政的一套恶劣手段搞宗派活动,四中全会后把这一套带到国内,对中国党遗害很大。王盛荣和李国华以反戈一击的姿态,揭发王明攻击中共旅莫支部,反对代表团,迫害同志以及后来驻共产国际期间遥控临时中央的活动。这就形成第二次“九月会议”清算王明错误的范围更大、群众基础更广的特点。

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指出:王明以国际的旗号,马列的招牌,“欺骗党十多年,好多同志被拉过去,自己也不清楚。”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六中全会只作正面批评,党内关系根本不谈。现在我们要用恰当的方法来揭破它,最后由七大解决。他指出:统一的东西要经过分析与综合,发现问题,暴露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党内存在的两个宗派,如不揭露,党就不统一。九州万国,八百诸侯,一国三公。教条宗派、经验宗派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两者有区别。教条宗派没有参加大革命,无功;经验宗派有功有过,特别在危险时不动摇,因为无马列见解,故对假马列者跟着走。教条宗派也有区别,遵义会议如无洛甫、王稼祥分化出来,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做了件好事。打教条宗派也要分是非轻重,有一点功绩也要指出。许多问题要等候同志觉悟程度才能决定。<sup>①</sup>

毛泽东讲话后,博古作第二次检讨。他承认在莫斯科时自己是教条宗派中仅次于王明的人物,他们的“第一仗”是反对中国代表团;在临时中央他是推行新的立三路线的“第一名”,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传统,打击支持毛的干部。

---

<sup>①</sup> 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根据任弼时工作笔记本。

他们对朱德不尊重，将任弼时“外放”到湘赣；又打击苏维埃政府、工会系统和几个省委的干部，使毛不能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认错，会后思想上出现反复。抗战初，新教条主义者说，中国如和国民党统一则存，分裂则亡，从极左转到了右。他内心里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11月21日，继李维汉和杨尚昆之后，张闻天作自我批评。张是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1927年担任向忠发的俄文翻译（后由博古接替）。在1928年米夫、王明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假案排除异己时，他和王明等结合。六大以后，张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和王明等渐疏远。他们都是米夫器重的人，所以王明、博古回国后，张就成了教条宗派在莫斯科的重要人物之一。四中全会结束不久，张回国代理沈泽民为中宣部长。张说：临时中央的重要决议多是博古起草的，我多写文章。自己毫无实际工作经验，却在发号施令，指示苏区工作。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彻底贯彻“左”的路线。一方面打毛，一方面排挤任弼时。他检讨教条宗派的特点是：一，崇拜教条，不问实际；二，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浓；三，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四，从米夫那里学了一套吓人、打人、造谣污蔑的恶劣作风。

周恩来从大革命后期起，就参加党中央核心领导，经历的政治风暴最多，对党史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的发言分两部分：一是自我反省，二是检讨历史。从11月27日下午开始到12月4日止，共讲了5个下午。他按照毛泽东提示的两个宗派的思路，检讨了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他摆事实，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宗派主义有三类情况：一类是宗派观念，对某些事认识不谋而合，这种观念可能是不完整、不自觉的。一类是有宗派的行动，如对某些事商量过，但仅是一时的。他说，关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洛川会议通过了，当时

他没有深刻认识其战略意义,以为这是对民众的,部队还是运动战,因此产生急性病,主张红军快些出动。这种认识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比较接近,以致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产生动摇。整个说还是执行中央路线,但遵守纪律是不够的。一类是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有政纲,有组织活动,如张国焘。

周恩来对党的历史的检讨分7个部分:党的五大到六大;“真假”共产国际,即共产国际指导的正确和错误;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1941年以后。他从这7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1927年以来他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从对矛盾的陈述中客观公允地清理历史,用实践检验是非,把自己的言行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坦率地进行反省;又从革命的创造性、决断方针的能力和党内斗争的软弱性方面,总结自己受教条主义者迷惑的教训。他的历史检讨澄清了许多重大问题。如九一八后组成临时中央是否合法,是不是篡党?他说: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他和王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国际代表要他们离开。当时,他们还没有把中央搬到苏区去的观念。他决定进江西苏区,王明要去莫斯科,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一人。远东局代表提出组织临时中央,于是一面报告国际,一面由王明和他商量名单。最初提出在上海的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和王永成等7人;黄平和刘少奇是后来加上的。远东局召集王、周、博、洛4人开会,决定由以上9人组成,不设区书记,由博古负责,洛甫负责与国际接头。为此,对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做了说服工作,并嘱咐博古到有中央委员较多的地方应该报告。这就把鲜为人知的、在非常时期组成临时中央的过程说清楚了。

在周恩来发言后,有人说:教条宗派再想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害尚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但周恩来是坦然的,而毛泽东是全面而冷静的。他在政治局扩大整风会前的讲话中,对周

恩来的“考语”是“有功有过”四字。功在何处？他具体地说：大革命有功；八七会议坚持革命；三人团有功；反张国焘有功；促成民族统一战线有功；1940年从国际回来同中央可以说是一致的。

任弼时并不是教条宗派的成员，但他也执行过错误路线，正如他自己所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11月下旬，他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他虽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建议临时中央“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是在苏区党代大会上却对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正确观点，当作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予以批评；在宁都会议上又认为毛泽东推行“进攻路线”不得力而同意将他召回后方。1938年3月，王明热衷于搞新的投降主义时，他却奉命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国际的支持，毛泽东对他的“考语”是“功大于过”，希望他在原则斗争中“尖锐顽强点。”

11月底，第二阶段的整风会议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先后向王明夫妇谈话，希望王明正确对待错误。王明对任弼时说：“四中全会搞得不对，自己思想上有错误，至于说有什么宗派那真是笑话。”12月1日，王明向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41年9月他向毛泽东谈的关于国共关系和抗战路线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我完全放弃”那些意见；政治局扩大会议最近对他的批评，“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细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承认的必要。”信中表示要“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这封信是由王明的妻子孟庆澍起草，王明签名送出的。

为了把全党的整风引向深入，为七大讨论历史问题作准备，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向领

导机关中的高级干部“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抗战时期“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及严重损失”。这是中央指名批评王明、博古错误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表明参加延安整风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并且有步骤地扩大研讨范围。

### 分析是发现问题和暴露矛盾， 综合是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曾经说：分析是发现和暴露问题，综合是得出正确的结论。政治局整风第三阶段的特点是进行总结和得出初步结论，然后提交党的七大讨论。

12月14日，延安1000多高级干部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进一步提高认识，巩固整风成果。其中约三分之一文化理论水平高的干部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大多数干部只学习《两条路线》。从11月底后的4个多月中，政治局很少开会。

1944年3月5日，政治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2月下旬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的五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历史上的思想要弄清楚，结论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

得对的应承认。会上,毛泽东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在学习讨论过程中,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现确定是党内问题;成立临时中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后共产国际又来电批准,应是合法的;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形式上也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毛泽东重申整风是政治上治病救人,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和反李立三。那时,思想上没有彻底地讨论,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要思想弄清,结论宽大,对党有利。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在一起工作,共同点都是要打倒蒋介石,分歧是如何打倒,是策略上的分歧。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佃贫中农,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如果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纲领,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争取群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群众观点的。在解释书记处决定之后,毛泽东特别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宗派也没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反映在党政军民关系上,新老干部关系上,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上。“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

教条宗派,自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以来,16年间从国外到国内,是严重影响中国革命、妨碍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虽屡经分化,却没有系统地清理,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召开会议,除了王明以外的绝大多数有关同志,作了认真的揭发和检查。在书记处决定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党内宗派主义的总结性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的。通过这个问题的清理,使大家对党组织政治上的统一性,组织上的纯洁性,思想上的严肃性以及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都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政治局批准书记处所作的五项决定和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意见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开幕,会议主要审查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在内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汇报了政治局的结论后,一致通过对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1、中央某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和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这个结论是后来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至此,历时3年又8个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空前团结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 “西北军委”实际是中央军委

王 健 英

1935年11月3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只指挥红一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西北军委，还是实际上有权指挥全国红军的中央军委？一种观点认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如同党中央当时曾称“西北中央局”一样，只是名义上的暂时改称，实际上，它同时即是中共“中央局军委会”，并不是只指挥西北地区的红军<sup>①</sup>。这种讲法究竟有什么根据？

### 一、“西北军委”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对外称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称，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同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

---

<sup>①</sup> 见《军史资料》1986年第2期，第33页。



由军委全权决定。”<sup>①</sup>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一、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军委”指1935年2月5日在陕北苏区安定县周家岭成立的，统一指挥陕甘、陕北两地红军的军委；其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这儿的中央包括“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讲的是中央的党、政、军组织分工，岂能只考虑了党中央、中央政府的对外名义，而不考虑“中革军委”的对外名义？！

从当时实际状况看，对外采取“西北军委”称谓的特殊情况可能是：其一，中共中央、中央红军7千余人以陕甘支队名义刚刚抵达陕北，刚与红十五军团与当地党政军领导人会面。敌军大批部队尾追，新的局面尚未打开。其二，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和红军总部及红五、九军团、红四方面军已经南下川康边。实际上中革军委与红军主力部队已经一分为二。俄界会议虽然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严重错误作出决议，但并未作出组织上处理。当时和以后党中央始终承认朱、张的军委与红军领导职务是合法的。既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不在陕北，对外名义显然不宜称“中革军委”。其三，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变华北为其“华北国”。11月1日平津10所大学学生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在兴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继续派数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宣称红军主力已被“消灭”。国内形势正需要维护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发挥在抗日爱国救亡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其四，当时党中央已同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络，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也无法联络。由于密电码已交由总政委张国焘掌握，陕北的党中

---

<sup>①</sup>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央也无法与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和项英领导的中央苏区分局、军分会进行通讯联络，只能通过红军总部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络。正是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慎重认真讨论研究对外采取何种名义更好。实践证明，这对外有利于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统一，对内有利于争取南下的军委、红军领导和部队重新北上抗日。

## 二、“西北军委”的工作范围表明是中央军委

1、从职权与工作范围看，“西北军委”领导的是全党军事工作。

其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是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与军事计划。如“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20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5万”，“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sup>①</sup> 1936年3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通报电称，“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毕，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三问题。……关于军事问题，批准军委的提议”<sup>②</sup>。这儿也是关于全党的军事工作。

其二，当时实际领导全党进行抗日反蒋军事斗争的是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如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的报告和12月23日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讲的是全党全军的军事工作；11月28日与1936年2月21日两次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抗日救国

---

<sup>①②</sup>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500页。

宣言》及通电；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笔写信，给国民党军、政著名人物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曾养甫、陈立夫、陈果夫等，秘密进行军事统战，开始沟通与国民党当局接触、谈判，均属全党军事工作。

其三，从组织原则、领导关系看，当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经常向南下部队通报全国及陕北军事斗争情况；曾通过红军总部转发指令给红二、六军团“任弼时、贺龙、关向应”；通过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央华北局直接建立起对华北局军委的领导关系，指导华北的抗日军事统战工作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2、从符合党中央常委分工的原则与惯例看，“西北军委”实际上是中央军委。遵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中央军事，毛泽东协助。不久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实际上是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人。但不久，8月19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一决定于次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可看出，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行动的军事报告，并作讨论后总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议。这充分表明毛泽东主持中央军事领导工作的身分。9月12日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毛泽东以负责中央军事领导身分作报告与讨论结论的。会议决定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实际是“三人小组”加上彭德怀、林彪，毛泽东仍是核心。“陕甘支队成立后”，毛泽东担任陕甘支队政委，掌握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红军政工条例规定），自然是中央军事工作主要领导人。从此后多次电文看出，是毛泽东在直接指挥陕甘支队北上的行动。其间9月22、28日，10月22、25日，在团以上、连以上干部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均是毛泽东作军事行动的报告与结论。

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这是再次明确重申，由毛泽东主持党中央军事领导。一周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决定成立对外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显然对内即是中央的军委。

### 三、主要当事人认为“西北军委”是中央军委

其一，毛泽东在亲自过目的中共《七大代表登记表》内填写着“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查遍现有历史文献与史料，未发现1935年内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决定，任命毛泽东为“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主席。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后并未改组中革军委，也未正式重组中央军委。1935年11月28日、1936年2月21日陕北两次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通电，表明毛泽东承认“中革军委主席”仍是朱德。迄今只有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很显然，从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后，一直主持全党军事领导的毛泽东，又经10月27日中央常委分工再次确定他“负责军事工作”，至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中央对外名义，决定成立“西北军委”，他为主席。毛泽东把这个“西北军委”看成是中央的军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二，《周恩来年谱》称，1936年“5月28日……出席中央军委白区工作部部务会议”；“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领导。”对苏维埃军委同时即是党的军委很清楚的周恩来，当时显然认为对外名义的“西北军委”，实际上是对内的中央军委。

其三，当时对军委内情较为了解的李德写到，“在瓦窑堡……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但我今天已无法说清，究竟是作为政府的革

命军事委员会,还是作为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很可能是后者”;“遵义会议以后……可能中央军委代替了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的一切决议都由毛泽东作出,周恩来领导具体工作”;“第四方面军成立了第二中央,那里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委仍在原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所在的一方面军那里”。此后,李德多次把“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并列<sup>①</sup>。尽管有的讲法不切实际,如毛作决定,周做具体工作,但足证明,他认为对外的“西北军委”即是“中央军委”。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后来也承认“西北军委”是中央的军委。其一,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于1937年冬写给中央的报告称,“1936年8月20日以前,当时党中央与军委所决定的路线方针而为全党所拥护,就是迅速会合一、二、四方面军……自己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得不充分”<sup>②</sup>。其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称,“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sup>③</sup>。徐向前历来态度鲜明地否认张国焘的“军委”是合法的中央军委。其三,连自立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央机构……北上了”。“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毛泽东……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张国焘1936年12月2日抵保安后,听林育英“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

---

① 奥托·布劳恩(李德)著:《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04、214、215、218、220、222、227等页。

② 中央档案馆藏《军事文献》。

③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和书记的责任”<sup>①</sup>。这是明确承认毛泽东为主席的军委会是中央的军委。其四，1989年10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称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13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 “8月1日，方面军胜利到达包座时，中革军委即来电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党中央和军委的这些指示，对引导方面军沿着正确道路北上……起了巨大的作用”<sup>②</sup>。上引7月13日与8月1日两电均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军委发出的，可见，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向前，成员包括了四方面军健在的高级干部)承认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是同党中央在一起的“中革军委”。

#### 四、从反对张国焘分裂看，“西北军委”理应是中央军委

1. 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中央军委”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是非法的。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开会宣布成立以他为主席的第二“中央”、“中央军委”。当时与会只有党中央委员张国焘、朱德(持不同意见，未表态)和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3人，组成“中央军委”的11名委员内只有朱德(未表态)、张国焘、徐向前3名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中革军委”委员，仅占全部17人中极少数，且合法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并非新组成的“中央军委”主席。因此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又是党的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先例。在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成立非法的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的情况下，如果把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看成是只能指挥西北地区红军的地区性军委，而无权领导指挥全党军事与全国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77、268、326页。

<sup>②</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357页。

红军,岂不等于承认了张国焘的“中央军委”是合法的了?!

2.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坚决否定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中央军委”。其一,1935年11月12日陕北党中央给“朱(德)、张(国焘)”等电明确称,“(乙)中央及中央政府、红军、陕北间工作磋商与白区党及国际取联系。(丙)对时局中央已发表宣言,检查政府及中革军委工作,将来再发宣言号召抗日反蒋战争,重申诸协定。(丁)你们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任何表示。……(己)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况,应随时电告党中央。”<sup>①</sup> 这表明,针对张国焘已经宣布成立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情况,党中央并未直接指责,而是正面强调“中央及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陕北,仅指示“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使用的范围。

其二,12月5日,张国焘来电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sup>②</sup> 面对这种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讲法,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指出,“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sup>③</sup> 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称,“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sup>④</sup> 陕北党中央在耐心劝说且毫无效果后,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

---

<sup>①②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347、350页。

<sup>③</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页。

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sup>①</sup>1月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被派回的代表林育英（张浩），从陕北电告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sup>②</sup>这肯定了陕北的党中央，否定了张国焘的一切“中央”。

其三，在党中央耐心说服争取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逐步承认了陕北的“党中央及军委”。1936年6月3日张国焘等通令“各军首长：（甲）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红军领导，决定：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陈昌浩为总政主任”等，<sup>③</sup>表明公开宣布取消了张国焘自任主席的“中央军委”，但并未承认毛泽东为主席在陕北的军委。但不久身为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著文明确称“现在必须在党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sup>④</sup>这儿讲的自然指陕北的军委。党中央对张国焘等恢复“中革军委”的通令并未表态，因为对外名义上一直用“军委主席朱德”。但对内，显然仍是由毛泽东负责的军委领导全党军事工作。

其四，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承认陕北党中央与军委的领导。经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军委的积极争取耐心等待、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的明确支持，由于朱德、刘伯承及红四

---

<sup>①②③</sup> 《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352,353,368页。

<sup>④</sup> 中央档案馆藏《军事文献》。



方面军积极要求北上抗日实现全党全军团结，特别是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主张北上与党中央及军委实现统一，张国焘日渐陷入孤立，被迫同意承认陕北党中央与军委的领导。先是1936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洛甫、周恩来电提出“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建议。9月21日，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sup>①</sup>。9月25日贺、任、关、刘等致电“朱、张、徐、陈：10日电奉悉。（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健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sup>②</sup>9月26日“朱、徐、陈、张”致电“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称，“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sup>③</sup>至此，张国焘等才正式承认了陕北党中央与军委的领导。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称“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

---

①③ 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531页，537页。

② 《红军长征·文献》，第1146页。

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sup>①</sup>。10月14日、16日,“朱(德)、张(国焘)”两次致电陕北称,“中央及军委”和“党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完全同意”<sup>②</sup>。10月24日朱、张又致电,开头称“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报中央军委”<sup>③</sup>,这证明张国焘等确实承认了陕北中央军委的领导与指挥。

为何称“西北军委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将前述各方面考证、剖析综合起来看,对“西北军委”是中央的军委认识基本一致。但具体讲法却有所不同,对此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论证。

一、称“西北军委即是中革军委”有几个问题。其一、朱德的中革军委主席,陕北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从来没否认过,并且几次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联名发表过抗日反蒋宣言、通电,表明是合法的。其二、张国焘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他任主席,并未设副主席,朱德仅是常委。中共中央及时明令张取消。这个非法“中央”、“中央政府”事实上是撤销了朱德的中革军委主席,但属于非法、无效。其三、如果把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军委说成就是“中革军委”,则同时存在着两个“中革军委”主席,这既不合乎党与政府的组织原则,也不符合毛泽东等主张对外称“西北军委”的良苦初衷。因此,这种讲法不够合适。

二、称“西北军委即是中央军委”也有问题。其一、虽然苏维埃军委“同时即是党的军委”,“西北军委”即是“西北中央局军委”,但是,毕竟迄今未发现中共中央有过重新恢复党的中央军委的决定、文电。因此,不宜以推论为依据。其二、原中革军委同时即是中共中央局军委,则朱德理应同时是“中央军委”主席。但却称“西北军委即是中央军委”,而主席却是毛泽东,又出现两个中央军委主席,

---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3页。

②③ 《红军长征·文献》,第1186—1187,1194页。

显然也不合乎党的组织原则。其三、1936年12月7日正式命令称“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仍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证明“西北军委”不宜说成即是党中央军委。

三、称“西北军委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或称“履行中革军委职权，是实际上的中革军委”，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合理合法。理由是，其一，这种称谓并未否认朱德仍然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副主席。但中革军委的主体即多数成员和绝大多数机关干部是随党中央、中央政府长征到达陕北，在中央和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履行职责。其二，区分了对外名义与对内实际，客观反映了当时原中革军委和红军分裂的事实。朱德、张国焘南下，特别是张国焘成立非法第二“中央”、“中央军委”，针对这种特殊状况，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决定仍保留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名义，成立了在中央、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的军委，对外采用“西北军委”名义，对内实际是中央军委。其三，强调“西北军委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有力地否定了张国焘非法的“中央军委”，明确陕北的军委有权领导全党军事、有权指挥全国红军，是事实上的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中革军委；张国焘自立的“中央军委”是非法。从党、政组织原则上讲，既不应该同时存在两个中央的军委，也不能说那一年没有中央的军委。其四，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先后由谢子长、刘志丹、聂洪钧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均属地方性质，只能领导和指挥所在的陕甘、陕北和川陕地区的军事与红军。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前者不同，是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全党全国性质的军委，但对外也称“西北军委”，为了区别，有必要加以说明“实际上是中央军委”。

# 川南古蔺、叙永老区革命斗争历程

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古蔺县、叙永县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在革命战争时期，很早就有地方党组织活动，不断爆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移师北上，强渡赤水河，在宜宾、泸州之间横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从此古蔺、叙永的革命斗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古蔺、叙永人杰地灵，在这块热土上，曾开展过一幅幅革命斗争画卷，从太平天国起义军将领石达开由黔入川，转战川南，到辛亥革命同盟会组织的“永宁首义”，再到蔡锷将军亲率护国军人川讨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已在古叙人民心中扎下深根。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同志来川南师范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古叙有志青年傅钟（曾留法勤工俭学，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八路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陆更夫（曾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1933年在广州英勇就义）、张子玉（曾任郫县、崇庆、灌县三县特派员，负责开展工运、学运、农运工作，后病逝于上海）、刘竹贤（叙永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等深受影响，先后投身革命在外地入党。1928年8月，中共叙永地方党组织创立，1930年中共古蔺地方党组织创立。

1934年中共四川省委把工作重点放到川、滇、黔三省边区，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注：叙永、古蔺等县党组织也归由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机关由泸州迁到叙永。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等立即分头

深入叙永、古蔺、纳溪、赤水等农村，发动春荒斗争，组织农民吃大户、破仓分粮，开展“四抗”斗争。1934年7月泸县中心县委提出：川南的党是最前线的党，前线党的任务是武装斗争。泸县中心县委下属各县党组织即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建立了叙永游击队和南六游击队。同年8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指示叙永地下党组织在两河盖首山成立苗民政府，赤卫队员发展到近200人。这些武装力量提出三大任务：（一）打土豪、破仓分粮、给群众以利益；（二）恢复群众组织，彻底摧毁农村封建统治机构；（三）尽量搜集枪支、武装自己，壮大力量。两支游击队和盖首山赤卫队的建立和发展，为今后支援红军长征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川滇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转战于川滇黔边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的中央主力红军四渡赤水，四进古蔺、叙永，三次从古蔺太平渡经过，辗转经历了54天，途经古蔺9个区、66个乡、38个场镇和叙永的大部分地区。中央红军先后还在叙永境内进行了五次重要战役：三岔河突击战、黑泥湾攻坚战、漏风垭阻击战、柏杨坡遭遇战、天堂坝反击战，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打开了主力部队前进的通路，为部队顺利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红军一渡赤水后，中央政治局在叙永境内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石厢子会议”。中央红军到达石厢子（今叙永县石坝乡）时，恰逢新春佳节，于是决定在此过年。在石厢子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所迫博古还未交权等遗留问题。在石厢子会议上，博古顺利地把中央总负责的权力交给了张闻天，并决定了中央红军西进扎西（今威信）的行动路线和留下部分红军骨干组建川南游击队等重大决策。石厢子会议彻底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的统治地位，成为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会议。

此后,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包括古蔺、叙永特支)举行了多次武装暴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派军事指挥员杨其生和一些党员到石顶山,协助起义。1935年3月10日,石顶山起义爆发。杨其生、冯吉率领当地粗选中队在驻地起义后,攻占了大同区公署和五通乡公所,缴获三十多支步枪和两千余发子弹,并击溃追敌。次日,游击队在石顶山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大地主刘丕平,分其积谷,宣告正式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由杨其生任队长,李清泉任政委,下属两个中队,二百余人,另外还编了两个赤卫队,在当地配合行动。石顶山起义震惊了敌人,敌人抽调了合、赤、叙三县24个团练中队和部分川黔军阀二千余人,从四面包围石顶山,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月余,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队长杨其生壮烈牺牲。

在准备石顶山武装起义的同时,邹风平等人加紧组织大渡口的武装起义。1935年1月,邹风平到大渡。那时,大渡有六七十名党员,建立了几个支部,农会组织发展壮大。邹风平亲自主持建立了大渡特区,并派曹德渊、李代平、军事干部周一戎到大渡加强领导。3月,大渡镇分别在当地的民团、锦文团、锦衣团、三俊团以及绿林武装中控制近千人、两百多支枪。特区三次开会筹划,准备4月份暴动,并计划成功后先克大渡镇,然后攻打纳溪,再取道永宁,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大渡口武装起义已如箭上弦,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泸县中心县委秘书被捕叛变,供出暴动一事,敌人马上进行大逮捕,大渡特支书记阳湘林被捕牺牲,暴动骨干有的被抓,有的走散,暴动彻底流产。

1935年2月初,南六游击队一分队与红一军团取得联系,军团政治部指示游击队“在敌后牵制敌人”。3月初,游击队改名为“红军川南游击支队”,直属川南特委领导,仍留当地活动。这支游击队与敌交战数次,缴武器、烧碉堡、破仓分粮、宣传革命,受到百

姓支持和赞扬。9月,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队。这时两河盖首山的苗民政权赤卫队200余人也加入到川南游击纵队。

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这些武装斗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川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支援主力红军长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带动和影响了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游击纵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革命凯歌。根据中央红军的意图和敌情变化,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指示叙永特区和南六游击队,配合红军转战川滇黔边。1935年1月30日,中央纵队进入古蔺镇龙山,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刘晓接见了该地区地下党负责人邓伯明等,要求他们发展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叙永特区游击队与红三军团接上头。2月4日,彭德怀在叙永五龙山接见了游击队负责人,并勉励大家坚定信心,配合主力红军北渡金沙江。次日,红三军团介绍到游击队工作的5名红军干部,带着50支汉阳枪、6挺重机枪到了游击队。2月9日,党中央进驻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进行整编,选拔了一批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特委直属中央,领导游击纵队开展武装斗争,牵制云贵川敌军,创建边区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中央决定,由徐策(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政委)、戴元怀(红三军团民运部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为王逸涛(原叙永特区游击队指挥),政治委员由徐策兼。纵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单位抽调成建制的连排组成。纵队成立时,周恩来副主席曾亲自动员。2月18日,纵队与原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共600余人,下设5个大队,纵队成立党总支,大队成立党支部,地方成立4个区委。

特委成立后，曾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边界的实际，发布了《川南工农群众目前斗争的纲领》共 12 条，为边区各族人民指出了灾难深重和贫穷落后的社会根源，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具体斗争任务，得到群众的普遍拥护。特委先后派出党员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威信高田、叙永田中、两河、长宁梅碛等地开展工作，成立农会、革命委员会，建立党的组织和游击队。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东进，牵制敌人，纵队向北插入川南，进至黄泥嘴、树坪一带，威胁川南重镇叙永，从而牵制了一部分尾追、拦截中央红军的敌川滇主力，为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3 月上旬，纵队在黄泥嘴、木厂梁子与敌激战，毙伤敌多人，缴枪数十支，纵队第四大队长梁亚伯也在战斗中牺牲。3 月下旬，纵队在大石盘与敌主力激战，遭敌黄锦团袭击，形势危急，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戴元怀，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率司令部通讯班顽强阻击，掩护纵队主力转移，戴元怀和通讯班 10 名战士在激战中壮烈牺牲。4 月中旬，纵队在罗布坳击退珙县叙南保商团、江安保安大队约 500 余敌军的围攻，将敌赶出威信县境。4 月底，纵队攻打驻水田寨的镇雄独立营的一个连，将其赶出水田寨，随后又在老乌沟攻占了该营副营长廖吉三驻守的碉堡，俘敌廖吉三等 30 余人，缴枪 30 余支。纵队一大队大队长董玉清也在水田寨战斗中牺牲。不久，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政委徐策兼任司令员，5 个大队缩编为 3 个大队。6 月下旬，纵队突袭长宁富兴乡乡公所，活捉乡团总等人，缴获部分枪弹。不久又袭击了长安县保安队，毙伤敌多人，缴获 20 余支枪，子弹近千发。7 月初，纵队攻占威信县城扎西，敌县长仓皇逃窜，敌独立营来援也被纵队击退。

7 月上旬，黔北游击队在四川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部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川南特委也改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下



设2个支队,共800余人,由特委书记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风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曾春鉴任参谋长。纵队在特委领导下,活动于川滇黔边区,开展武装斗争。

中央红军横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敌视留在川滇黔边的红军游击队为心腹大患,急调尾追中央红军的部分兵力,并从四川、云南、贵州抽调兵力,对纵队发动第一次“三省会剿”。7月13日,纵队在威信长官司、观音塘遭敌川军截击,纵队英勇还击,由于敌情不明,部队伤亡严重,司令员兼政委徐策、副政委张风光、代参谋长陈宏等有的牺牲,有的重伤。

7月14日,纵队转移至簸箕坝,特委在余泽鸿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由余泽鸿(任书记)、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刘复初组成新的特委。刘干臣任纵队司令员,余泽鸿兼政委,继续转战川滇黔边。12月中旬,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余泽鸿、司令员刘干臣也先后壮烈牺牲。

在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认真执行党中央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巨大压力,完成了配合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在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同时,特委和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宣传和组织群众,解除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创建游击根据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农会和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丁、抗粮斗争。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组建时的400余人发展到1000多人。特委和纵队领导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和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依靠全体党员和老红军战士,把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纵队和边区,处处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历经艰难险阻而不动摇,直至1937年1月才告失败。而由这支游击队组建和领导的云贵川三支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同敌人的“清剿”作斗争,前仆后继,顽强拼搏,尽管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仍坚持活动到1947年。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央红军和游击纵队得到了古叙人民的大力支持,古叙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仅古蔺县就有800多人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的更多,叙永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也有500多人。红军经过古蔺皇华乡树坪村,当地医生李培生开办了红军医院,收留了红军伤病员好几十人。古叙人民还为红军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四渡赤水;有的打土豪、破盐仓,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有的为红军印制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等。为此,有的群众献出了生命,有的坐牢,受尽了折磨,有的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劫。地下党团组织在群众中还组织“红军朋友会”,从各方面支援红军。

红军长征经过古蔺、叙永,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红军经过古蔺叙永后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邓伯民等于1938年春北上延安,留下熊少阳在原基础上继续工作,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大量发展党员,恢复流落红军中的党员关系,在淋滩还建立了一个红军支部,到1939年底,党员人数达183人。地下党又经过抗日战争数年的艰苦奋斗,在解放战争末期,党员人数达到2300多人,建立了地下武工队,拥有地下武装1000多人枪,对古蔺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配合解放大军行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执笔:上官燕)

# 中苏关系的转折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

马 贵 凡 译

到1957年出现的形势是，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于是我们着手进行筹备。我们商定，把这次会议安排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文件起草委员会。到开会时间时，我们又相会于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由毛泽东本人率领，我记得代表团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原文如此，实际上刘少奇、周恩来和康生没有参加这个代表团——译者）。代表团中还有孙逸仙的夫人宋庆龄。说真的，这使我们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估计她是无党派人士。确实，她是个很进步的人，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作斗争过程中的许多年间，她始终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形式上是不是共产党员或有没有党证，倒没有使我们感到特别的不安。其实，按照她的信仰，她是接近共产党的人。宋庆龄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是同志式的、兄弟式的。

整个会议是在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上进行的。代表团之间没有发生特别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时期以来最广泛的一次。有80多个党的代表来到了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

---

\* 本文选译自俄国《历史问题》杂志1993年第2期。

际形势和防止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大体上带有这样的性质：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导弹武器。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反正都会取得胜利。具体谈到中国，他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话，我们现在有6亿人，我们就是损失3亿，那又怎么样，打仗嘛，过一些年，我们会生出新的人口，恢复人口数量。”他讲的就是这样粗鲁。他发言后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默。对于他对世界大战的这种态度，谁都没有思想准备。相反，大家都在考虑怎么能避免发生世界大战。讨论如何反对世界大战，争取和平共处。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要怕战争，战争定会给我们带来胜利的口号，而如果说有损失的话，那就说打仗就是这样嘛！

这次会议后，代表团开始交换看法，我记得诺握提尼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有1200万人口，那时我们所有人口都要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们的人口数量啦。”哥穆尔卡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但是兄弟党代表的批评意见对毛泽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暂时这样的思想还没有成为他的日常行为准则，但已经感觉得到，他把自己置于其他人之上了。有时他竟允许自己做出一些通常不允许做出的事情来，而且他做这种事情时旁若无人。这也说明，毛不想控制自己，他不顾及周围情况，我行我素。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也参加了代表团。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而我们对他们也是完全信任的。但是，当我们协商会议的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某些提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的意见，说宣言应按照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文件起草委员会制定的提法通过。这时南斯拉夫人说，这样的文件他们不签字。我们没有办法，

签这个文件只好没有南斯拉夫。我们竭力讨好它的代表团，说服他们，向他们证明按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的稿子签署宣言的必要性，但南斯拉夫人坚持己见，不容商量，我甚至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有意找碴儿，他们之所以坚持要求修改一些提法，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彻底实现同兄弟党关系的正常化和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签署这个文件，似乎他们就丧失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袖地位（这些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采取了特殊的中间立场）。至少我有这种看法，因为南斯拉夫人不签字好像没有任何道理。

我们同中国人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又怎么样？他们不想签，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不签那就我们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没有去激化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还是希望南斯拉夫人最后赞同这个共同的文件，并从自己方面尽一切努力来实现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将其建立在兄弟般的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之上。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同毛泽东个人的交谈是很友好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很亲切的。但是后来发现，从中国人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游戏。当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得到改善时，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对我们说，会议期间，他们同毛交谈时，毛对我们很藐视。毛同我们讨论了如何说服南斯拉夫人签署共同宣言的问题，而当着他们的面则说：“没有什么，你们不签宣言，这是你们的事情，其实，这里不会有什么悲剧，只不过是我们的主人——苏共的代表会有些生气，以后会平静下来的。”一句话，北京在我们的背后唆使南斯拉夫代表团不支持共同的文件并给它撑腰打气，这种情况我们在当时是不知道的。

在讨论宣言稿时，同中国人也发生了一些分歧。当时我们觉得分歧不大，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分歧具有很深的根基。在起草宣言初稿时，我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授权，建议

从宣言稿中删去所有提及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的词句。我认为,在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是试图重新确立我们党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又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相互关系。

几乎所有兄弟党代表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表示同意。恰恰是中国人出乎意料地表示反对。他们说,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点应该在会议文件中作出说明,需要有个头头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帝斗争中的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更何况我们认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提出这种意见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感谢中国同志承认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功绩,但我们坚定地说,我们反对写上这类词句。其他党又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至此对文件稿的讨论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事件表明,中共的目前政策不是突然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它很早就一步一步作了准备的。

会议期间,我们同许多代表团,或者说同所有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我同毛和陪同他一起来的同志交谈多次。这些谈话表面上看是很友好很愉快的。顺便说一句,毛在私下会晤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作了评价。他的评价使我警觉起来。他是以悲观的语调,甚至我可以说是以诋毁的语调来谈论他的多数同志的。他把一切都说得一片漆黑。关于刘少奇,我现在无法逐字重复他的话,毛对他作出了很不好的评价,并列举一些“事实”作证明。对周恩来他也作出了否定的评价。甚至对朱德他也进行了诋毁。看来,朱德主要

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他是为中国工农事业忘我战斗的优秀军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毛对所有其他人也作出了很不好的评价，但邓小平除外。当时邓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指着邓说：“就是这个小个子（当时我同毛单独坐在一边交谈），很聪明，很有前途。”他极力向我夸奖邓，说他是全中国及其共产党的未来领导人。

在那次会晤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提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从中国内战刚开始就很显赫。朱旅长转到共产党方面，领导了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是中国资产阶级军队的第一批老骨干军官之一，举起了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旗帜。我也记得高岗这个名字，高也是以前为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而战斗过的战斗队的代表。当然，当时高岗已经不在，在会议期间不可能谈论他。而毛稍晚些时候把他说成是最坏的人。当他给自己周围的人作出这种评价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他同斯大林作了比较。

斯大林也这样评价过他的所有亲信，我不知道他认为谁是好人，而且他不只是作出了很不好的评价，他还从肉体上把同他工作过的人消灭了。列宁去世后，同他一起共事的那些人，多数已经不在人世。在毛的谈话中，有些口气也把他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了。在这里我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某种同源关系，确实也是很久远的同源关系。当时我无法想象，以后毛的性格会被涂上哪些颜色，他会给自己的人民造成什么样的悲剧。

毛问我们的情况怎样？我向他说，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工作齐心协力。但也谈到，在我们同志之间常常说起，应更换布尔加宁同志，把他调到另一个岗位，要提拔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太满意。我之所以向他谈这个情况，是考虑到，如果毛走后，我们开始做某种人事调整，而事先不向他通报，这不好。他会认为我们在隐瞒什么。所以我向他坦率而诚

恳地讲述了我们党内的问题、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你们想提拔谁取代他?”“我们还没有作任何决定,但我,虽然说还不是很肯定,将会推荐柯西金同志。”“这个柯西金是什么人?”我向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你让我同他认识一下吧!”我把他们都作了介绍,之后他们就到一个角落去交谈了。毛想结识将主管苏联政府工作的人,我很高兴。我认为这是希望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走了,但会议之后周恩来多次正式地或秘密地来到我们这里访问。他的来访始终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同他相处得很好,我们自己对他也很好。这些会晤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他向我们通报了中国的情况,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他们那里一切都正常。当时在中国农村集体化工作已经结束,这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过去我个人考虑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改革农业时,事先就想象到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个人会面临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我知道在我们这里这项工作进行得多么艰难,而中国是比俄国更贫穷落后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到处都是使用犁和锹的手工劳动。那里不是每一个农户都有犁。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进行集体化呢?

列宁说,只有实行机械化才能把农民联合到合作社中来。他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化。在中国,不仅拖拉机、煤油和干部没有,而且连犁几乎都没有。但尽管存在很大的困难,中国人还是实行了集体化。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要求不高,他们满足于小规模联合,当他们把自己寥寥无几的生产工具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能够把土地耕种得更好,从投入的劳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生活更有保证。我们为中共取得的这个成绩感到高兴。

我已经谈到中国工业问题。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建设了拖拉



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和生产火炮、武器装备、飞机等的国防工厂。我们以此为荣，我们很愿意帮助中国，而中国相应地也对我们表现出关心和友谊。可见表面上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在领导人会晤中，我们简直是无所不谈，我们碰到的好事和坏事无一隐瞒。我们开了很多玩笑，笑声不断。

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去各地参观时，看到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没有实行机械化的原始运土方式。中国人站成一排传递土筐，就像独特的传送带。有些人是肩扛背背。我们的一些不大高明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竟想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步行挖掘机（我不知道这种表达法是出自我们当中何人之口）。我要说，这是作出了相当准确的比较。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开了很多玩笑，中国人喜欢开玩笑，并且经常是他们主动开玩笑。当时我也向他们说了，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这些步行挖掘机是在怎样地工作。他们听了哈哈大笑。但我后来想了想：这怎么没有使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呢？其实中国人民很容易产生侮辱感的。或者，他们正确地理解了玩笑，而没有感到受了侮辱。或者他们感到受了侮辱，但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很会掩饰自己，这也是他们的特点。他们善于戴假面具，不表露他们对事情的真实态度，不表露他们的心情。

1958年，中国人请求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因为他们想再次同蒋介石进行一场战役，他们要求提供空中掩护、远程大炮和海岸炮等。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提供了。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某种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当时我们不仅没有阻止他们，相反还认为这种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便开始进行自己的战役行动，实际上这次行动变成了进攻靠近大陆海岸的两个沿海岛屿。这次行动没有使用轻武器，长时间互相进行炮击，而且美国人主动援助蒋介石。但是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我们当然非常关心他们的胜利，我们都同情毛一方。当时需要消灭蒋介

石在这两个岛屿上的战争策源地,因为这两个岛屿可以充当海军陆战队登上中国大陆的跳板。当时蒋介石还有这个幻想,而且美国人,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说,在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令我们惊讶的是,当我们看到炮击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时候,毛停止了进攻行动。炮击停止了,这次行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周恩来来访,我们同他会见时问他:“当时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啊,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怎么要有意这样做呢?你们并没有占领这两个岛屿,但要知道,发动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占领它们的呀?你们有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呀?”“我们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但我们不希望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的军事力量够得着的地方。其实,我们不仅可以用飞机来袭击这两个岛屿,而且用海岸炮也够得着。若是我们占了这两个岛屿,那么蒋介石的力量就会离我们很远,我们就会失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打搅他的能力。”“这有什么好处呀?在自己的海岸附近有敌人占领的岛屿,要防备他的登陆行动,这么近的距离其实不正是给敌人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吗?”

北京论证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放弃完成作战行动?为什么当时他们要给这两个岛屿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进行了猛烈的炮击,蒋介石甚至从一个岛屿上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只需要他们去占领撤空的岛屿。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把花费很多资金的作战行动进行到底。还在准备这次行动的时候,我们认为,也许需要更积极地援助中国。所以我们提出给他们派去歼击航空兵,即一个空军师,或者需要多少就派多少。他们突然对这个建议作出了很气愤的反应,暗示我们说,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我们就没有硬要他们接受。我们是想给予协助,因为以前他们自己曾找到过我们。我们向他们提

供了飞机、大炮，派去了空军教官以及当顾问的将军。但是，当他们不同意我们派出空军编队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这个建议作出不好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巩固他们的国界和统一国家外，没有追求任何别的目的。其实，我们始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旨在消灭蒋介石政府、归并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努力。

进行这次作战行动的时候，也发生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插曲，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同我们友好方面的真实面目。当时在中国上空进行了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了携带“空对空”导弹的美国飞机。蒋介石分子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某些导弹未爆炸，落到地上，其中一些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后向我们作了报告。自然，美国的新式武器，特别是与导弹有关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是很小的“响尾蛇”导弹，但其结构很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了了解美国技术的可能性。正如常言所说，美国人自己通过中国给我们送来了样品。我们写信给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导弹，我们想加以研究，然后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来利用美国的技术。他们未作答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提醒一次，他们还是未作答复。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怎么会这样？我们向中国提供了一切，如我们的秘密军事技术、图纸、生产工艺卡、样品等，直接武装了中国人，而现在他们缴获了战利品，却不想提供给我们。对此莫斯科很不理解。我们坚决要求他们提供给我们，这时他们回答说，他们自己现在在研究这个导弹，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所以不能提供给我们。待他们研究后再同我们交换信息。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还没有处在能够迅速而在行地研究新型导弹的技术发展水平上。我们认为，我们对这种工作有更多的准备，因为我们已经制造了这种导弹，并武

装了部队，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来作比较。他们的答复使我们很生气，实质上伤害了我们。处在我们位置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没有对中国保守任何秘密，向他们提供了一切，援助他们设备、顾问、装配工、工程师和设计师，我们几乎是兄弟般地分享最后一块面包，而现在他们得到缴获的武器，却不想把它提供给我们。

可是没有办法呀，武器在他们手里。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某种压力，当时我们给他们准备了生产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他们催促我们赶快提供。我们指示我们的军事顾问在会谈时表示我们的不满，并从个人角度说，我们向中国提供了最新技术，而他们连缴获的导弹都不想提供给我们，这使我们感到难堪。顾问们要暗示，我们在转让生产导弹的资料方面出现了“技术上的困难”，可能我们不能按约定的期限转让。我们确信，这样的谈话定会传到该听到这些话的人的耳朵里。确实，很快我们就得知中国人同意将导弹交给我们。他们将它交给了我们的顾问，让他们发往莫斯科。在这里，北京还在保密方面搞了一个不明智的游戏。当然它给我们的关系打上了某种烙印。我要说，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俄国谚语所说，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我们收到了这个导弹，放它在离莫斯科不远的科研所里。不久我们的设计者报告说，这个导弹很有意思，我应该去看看。我去了这个研究所，他们为我表演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使用的角度看，它是很有意思的。它很容易组装和拆卸，只借助于一把钥匙。我们的导弹不错，但工艺较差，组装更复杂，而且分量较重。从作战性能来说，我们的导弹不亚于美国的导弹。但我们还是认为美国的导弹做得更好些。我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正是这样很客观地作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稍加改进的这种导弹。

后来设计师经常向我报告对这个导弹的研究情况。我当时相

当多地研究了军事技术问题,因为武器装备问题很尖锐:我们认为,我们落后于美国,应该弥补主要在导弹方面和装备导弹的航空兵方面的不足。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没有给我们热导弹头的敏感部分,体积很小,有钮扣那样大。没有这部分导弹就不是完全符合要求的。我们又询问中国人,但他们回答说,都给我们了。我们没有再要求。要么他们拆装导弹时丢了零件,要么有意不给我们。后来我们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为了揭示技术秘密,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

由导弹这件事造成的不愉快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以前我们像孩子似地看待我们同中国兄弟的关系,为我们同他们有这样好的关系而高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马上就改变了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其实,中国就是中国,主要一点是,它是与我们接壤的辽阔陆地大国。现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有连在一起的边界,形成了统一的阵营,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逐渐取得了胜利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促使我们思索。我们的关系仍然本着友好的精神在发展。但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开始分道扬镳了。

毛提出了“大跃进”问题。可以说“大跃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如果要保持有如此紧密经济联系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真正友好关系,交换意见和听取各兄弟国家的看法会是有益处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加强相互的信任和在我们的国家和党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然而我们是突然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搞“大跃进”的。

当从报纸上了解到什么事情时,你会发现,作者的意图不是始终都表露出来的。我们不懂“大跃进”口号的意思。后来我们又从报纸上得知搞“小冶金”,也就是决定在中国建立家庭式小高炉。这

在那里像是一种流行病。一些集体或在物质上有保障的人为自己建立了炼铁炉。没有人考虑这种铁的质量和成本问题。也谈不上在如此原始条件下生产工业用铁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以前哪个世纪的冶炼方法。我们觉得搞“小冶金”，搞“大跃进”，这些做法是不严肃的。有人对我说，甚至孙逸仙的遗孀也在自己家旁边建了小高炉。我不知道她是否炼出了铁。这是到她那里作过客的人对我说的。她向这些客人夸耀了自己的炉子。

当时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在炼钢铁方面，要在几年内赶上英国，然后赶超美国。我们看到这些口号时，都不可能认真对待，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原始条件下解决如此复杂的任务，尽管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当时中国处在比较低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就是以前我们为苏联提出这种任务时，也没有提出这些具体期限。我们提出的是很笼统的口号：赶超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不敢提出完成这个任务的期限。后来中国开始组织公社，中国人要把所有农民联合起来，甚至连生活日用品都要实行公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肯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般说来，中国人很善于想出口号，并能巧妙地给老百姓提出。我们经常收到中国的报纸。我们的人从报上得知，我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联报纸，也提出了吸取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立公社方面的经验问题，甚至有人建议采取他们的“大跃进”形式。应该承认，这把我们吓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对能否在苏联条件下使用这样的口号发表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口号对我们是绝对不适用的。

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访问了中国，他没有搞清楚中国的事情，回来后就在保加利亚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荒谬的文章。我们发现保加利亚也采用了公社和“大跃进”口号，开

始贯彻这些思想。这表现为保加利亚已开始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并向重工业投入了过多的资金。有些保加利亚朋友对此持批评态度,我们通过他们得到了令人担忧的信息,表明这样做有可能造成很悲惨的后果。

我们不得不邀请保加利亚朋友到我们这里来,并在会谈中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说,我们认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使用中国的方法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不会有好的结果,而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具体到保加利亚,我们是这样讲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同你们有着怎样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我们想让这种关系永久地保持下去(我们同保加利亚的关系确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继续仿效中国搞“大跃进”,不按自己的财力扩大建设规模,那么就会把自己国家的经济置于危险的境地。现在你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阵营提出大量订货,付款期限一到,你们没有支付能力。我们估计,那时你们会要求我们提供贷款,而我们难于向你们提供这样的帮助。这会使你们的经济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就这样,我们向保加利亚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作出了痛苦的反应。这时我们说:“我们不要求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只是想提醒一下。如果你们将来要求我们提供黄金贷款的话,那么鉴于我们现在没有黄金储备,我们无法给予你们帮助。当付款期到来的时候,你们如何摆脱财政上的困境,你们自己要想一想。”到此我们就告别了。确实,保加利亚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集体经济划分成若干小单位等。当然,他们未能彻底纠正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未能恢复以前的农村组织形式,这是保留了许多合并扩大的农村合作社。

我在这里提到“合并扩大”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苏联,我正是合并扩大集

体农庄的倡导者,在这方面我高兴过,也有过麻烦事。我认为,我们的集体农庄耕地少,劳力少,没有发展前途,因为它们不能使用生产率高的技术。因此这样的集体农庄应加以改组,使它们具有更现代的技术基础。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做的。确实,我们也曾脱离实际地追求过巨大规模,使我们吃了亏。这是我的疏漏。许多人醉心于扩大规模,有时都不能切合实际地作出相应的规定:大的经营单位是多大?巨大的是多大?小的是多大?

可是中国人几乎把整个省划为一个集体农庄。只是没有把它称作集体农庄,而称为公社。其规模有点像我们的地区或者更大些。结果出现了无法管理的经济单位,它不可能是赢利的。保加利亚借鉴中国的这些做法,结果半年以后,他们来找我们,要求给以援助,我们提供给他们所有贷款,甚至短期贷款全用完了。短期贷款利率是很高的,年利率几乎是15%(长期贷款的利率是5—7%)。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要扒你一层皮。我们总还得从自己的储备中拿出一些钱放到朋友们的桌子上,以不至银行拒付他们的期票。银行简直就是进行偷窃,这就是经济对那些没有道理地醉心于模仿中国人的人的打击。

中国人自己决定这个问题很简单。在那里,个人意志不受监督,不讲任何经济和科学原则,事先不研究,也不作周密考虑。尽管事情好像很明显,但我们认为,这需要说明,关于公社的危险口号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我已经说过,我们有直接的原因,因为西伯利亚的一些州和边区委员会已开始采用中国的口号,在报纸上进行宣传,并说明如何能在我们的条件下使用这个口号。

那个时候,我们起草了党的二十一大关于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问题的决议,并决定在总结报告中谈谈公社问题,不直接援引中国公社情况,但要就其组成成分作出分析。正是我代表党中央在二十一大上就我国经济七年发展计划问题作了报告,顺便也分析



了“大跃进”问题，从而给我们党的领导人打了预防针，不要盲目进行效仿，并说明，这样做会给苏联带来沉重的打击，会给我们的经济，进而也会给我们的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要知道，政治是很受经济制约的。因此要注意照顾到这两个方面，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国家的发展有损害的东西。

中国人出席了苏共二十一大。在他们听到我的讲话和看到报告稿后，就不需要再向他们说明我们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了。看来，这个情况也不是鼓励他们去加强我们的友好关系，而相反，是冷却我们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在根本的发展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现在，自然我们已经开始公开地批评中国广泛采取的措施。还在“大跃进”之前，那里就广泛宣传“百花齐放”口号（对这个口号大肆加以宣扬）。我们在了解了这个口号并研究了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既不能理解它，也不能接受它。“百家齐放”是什么意思呀？每个农民都知道，一些花需要扶植、栽培，而另一些花则要锄掉，因为杂草也开花结果，它们是苦的，或者说对身体和作物是有害的。这样的口号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宣传员已向党中央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苏联人看报，这个口号也传到了苏联各地。当时我们给报刊和宣传员提出的指导方针没有专门谈及这个问题，而是绕过了。其实，这个口号是中国人给自己国内提出的，因此，也许对他们来说它具有某种意义，而在我们的条件下它是不适用的，所以我们没有接受它。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人立即明白了我们的行为：既然我们不宣传他们的口号，那就是说我们不拥护这个口号。虽然这个口号没有受到谴责和批驳，但每个人都清楚，我们反对这个口号。

在我们（要么是在莫斯科，要么是在我去中国的时候）举行的一次会晤中，毛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对‘百花齐放’口号怎

么看？”我回答说：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口号的含义，因此在我们那里难以使用，我们可能作出错误的解释，那样就没有什么好处。他说：“是啊！我们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这个口号是在研究了古代文人的说法之后提出来的”。他给我引证了古代文学中的例子，在哪本书中第一次见到了“百花齐放”口号。毛知道，我们不赞同他的观点，而这又无助于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在这次交谈中，我们轻轻地触及了毛的痛处，顺便作出暗示：他自己可以想出任何口号并在报纸上发表，但远非所有口号我们都能接受。毛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人，而他的上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此他所赐予的一切，据说都是为了造福于人类。自然，我们的反应冷却了友好关系，或至少起了冷却的作用。但是他作为一个聪明人作出了没有受到伤害的样子，他说：每个党都可以只采用对它有益的东西，而不采用对它不合适的东西。

搞“大跃进”，组织公社和采取其他措施，都是由毛泽东发起的。现在已经带来了不良的结果。中国经济恶化了。在贯彻执行这些口号以前，我们曾为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成就的不断增大、人们生活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感到高兴。但是，由于搞“大跃进”，整个工业瓦解了。首先是技术标准遭到破坏，因为中国人说，这都是资产阶级想出来的东西。例如，他们从苏联购买的机床，有精确确定的生产产品的极限标准，而他们把这个标准加大好几倍。设备超负荷运转，结果机床被损坏。工业的混乱时期来到时，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原料不足，设备损坏。中国出现了困难局面。那些坚持科学的技术标准的工程师受到指责，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应声虫、破坏分子等，让他们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

我们收到经使馆转来的询问：周恩来想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立即答复说，我们很愿意接待他。他来了。他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讲了中国冶金工业的严重状况，说北京请

求我们派遣经济顾问。那里已有我们的顾问在工作。除了这些顾问我们还能提供其他什么顾问呢？我们已经向那里派遣了熟练的技术人员，包括在黑色冶金领域。而周恩来要求我们再派一些更熟练的技术人员，同他们一起研究现在的状况，帮助他们作出应有的结论。我们商量后决定推荐负责冶金和采煤问题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同志去那里。他本人是采煤工程师，矿工出身，我很了解他在乌克兰的工作，他在那里领导了斯大林州的最大煤矿管理局。他是个很出色的工作人员，但有一个缺点：酗酒，喝完酒就控制不了自己。

我们派扎夏季科到中国去了。他当然给那里带去了好处。他们在他们那里逗留了几周时间，回来后报告了中国之行结果。我问他：“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扎夏季科同志？向中国兄弟提出了什么建议？”“哼，赫鲁晓夫同志，在那里提什么建议呀（他的声音有些刺耳），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自己搞乱了整个黑色冶金工业。我来到鞍山钢铁厂，一片荒芜景象。”“那里的管理者是什么人？”“是这样一个人，我同他认识了，好像是学兽医的。”

我见到周恩来时，周让我谈谈印象，我问他：“周恩来同志，在我们那里学习毕业的冶金工程师到哪里去了？据说，他们在你们农村劳动，接受所谓的锻炼，而你们的钢铁厂由一个根本不懂冶金专业的人管理。若是你们没有专家，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我们那里也发生过各种情况。但现在你们可以自由地选用专业对口的人呀。”周未能作出明白的回答。我看出，他本人也知道他们作了蠢事。但要知道这不是他想出来的，他也无力阻止这样做。

中国工业的其他领域也是一团糟。我们向那里派遣了专家和普通工人，要恢复由我们援建的并已投产的企业。我们的专家和工人开始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说：我们下班回

来,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上,箱子遭搜查,我们要求作出解释,他们对我们说,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可能你们自己没有锁门。他们否认一切。这已经不是误解,而是不信任。他们找什么呢?在工程师或工人的箱子里能找到什么呢?那里能有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的工程师帮助中国人掌握导弹使用方法,并把它们组装好交给了中国人,组装完他们就回家了。第二天,他们发现有一个导弹被拆开了。他们问:“谁把它拆开的?不应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把它拆开呀!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导弹,我们要交给你们的。”没有谁能解释清楚。看来,中国人是在夜里进行某种检查,要偷看秘密,为此才拆开了导弹(虽然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须知我们是要把所有这些导弹都交给他们的呀!)。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把它重新组装起来。由于对我们的专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还发生了许多事件。后来就开始进行粗鲁的侮辱,特别是喝醉酒的中国人。

他们指责我们的人都是“极限论者”。这是我们熟悉的术语呀!过去在苏联的某个发展阶段,我们这里也流行过这种骂人的话。我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智的。看来,这种话在我们这里也是没有根据的,它反映了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信任。那个时候对资产阶级专家是很怀疑的。我们破除了他们的标准,但并非始终都是理智的,尽管有时做得是对的。不过对中国人我们已经不建议他们这样做了,而是他们自己在这样做,在重演我们的历史。这是他们的问题。然而我们还是向他们说,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的结果。

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或者还早些时候,我们收到我们大使从北京发来的一份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报中谈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强烈不满。驻那里的大使是尤金,他本人是哲学家,派他去中国负有特殊使命。他就是作为学者到那里去的,当时毛泽东请求斯

大林帮助整理他的讲话、文章等著述，因为他想结集出版。因此需要让一位有一定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审读和帮助编辑毛的文稿，以避免出现什么理论上的错误。就这样尤金被派到了中国。毛始终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很喜欢谈哲学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强加给与他交谈的平凡之辈。斯大林决定派尤金去中国当大使，是考虑到他能同毛谈论一般哲学问题，同时能够帮助毛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斯大林在世时和他去世之后，我们常收到尤金的电报，他兴高采烈地报告了毛的情况，说他们相处得很友好，甚至不是尤金去拜访毛，而是毛本人来拜访尤金，连续几夜呆在他那里，与其说是搞编辑工作，不如说是闲聊。描述这些谈话时，尤金简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毛同我们的大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认为，这表明彼此是信任的，更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关系。

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军人建议党中央向中国政府提出允许苏联在华南建立无线电台的请求，以便同我们在太平洋巡逻的潜水艇保持联系。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正巧那个时候我们在大批量建造柴油动力潜水艇，并已着手建造核动力潜艇。自然，我们需要同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固定的联系。军人选择了可以建立这种联系的合适地点，他们无疑是对的。但是现在我认为，那个时候我们头脑有些发热，夸大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我们认为，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这些潜水艇不仅要为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要为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进行活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对建立无线电台的兴趣不比我们小。

那么为什么我们想自己建立无线电台呢？那个时候中国人难以在所需要的期限内建设复杂的设施。军人催促我们尽快开始建

设。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我们的建议伤害了毛，触及了他的民族感情，触及了中国的主权。看来，毛认为，我们是要用这种方法向中国渗透，所以对我们的建议作出了很强烈的反应，尽管以前他本人曾请求我们帮助中国建造导弹潜水艇。苏联给他们寄去了所有文献资料。中国人选定了所需要的地点，在我们专家帮助下开始建造这种潜水艇。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建造防卫设施和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在我们突然收到尤金发来的令人不安的电报时，还发生了类似性质的另一些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让我去一趟北京。我们告诉了中国同志，并得到了他们的答复，他们将接待我们。同我一起去的，好像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因为我们要讨论军事问题，还有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我们是秘密去那里的，没有见报。

在北京机场上，我们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迎接。我们下榻在国宾馆。大部分时间是在游泳池边度过的。毛游泳的那个地方设有凉棚，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当然不能和他比赛游泳。要知道，据中国报纸报导，毛在那里打破了什么纪录。后来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游泳者立即向毛举手投降了，承认他的冠军地位。一般我们都是像海豹那样躺在温暖的沙滩上或地毯上交谈，然后爬到水里，然后再爬上来晒太阳。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平静，很友好，尽管尤金在电报中谈到毛的一些很尖锐的意见。

关于无线电台问题，毛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建议。中国这么多年被人看作是非主权国家。这个建议有损于我们的威信，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马上表示道歉，我说：“我们绝对不想损害你们的主权，或干涉你们的事务，向中国的经济领域渗透，我们根本不

想做任何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事情。”“若是这样的话，请你们给我们提供贷款，由我们为你们建造无线电台。”我对他说：“这样最好不过了。好吧，我们给你们提供技术指导、图纸、贷款和设备，一句话，为了尽快建成无线电台，我们提供一切，请你们建吧！”毛说：“行，我们同意。”

好像我们迅速地解决了问题，彼此都很满意，我们的军人提出的任务将能够完成。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工程一直没有开始，中国人不断提出新的条件，他们寻找种种借口进行拖延。而在我们关系恶化之后，这个问题就从日程上彻底取消了。

我们在游泳池边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潜艇舰队的问题。我们的海军提出了他们进入中国某些港口给潜艇加油和人员上岸休息的问题。中国的海岸线很长，而我们苏联好像位于它的海岸的一端，可见海军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但是中国人又提出了威信性质的异议，毛强烈反对。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我简直不能理解你，其实这是为着我们共同的利益呀！”“不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这触及了我们的主权，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潜艇舰队。”“那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若是谈到主权问题，那就让我们采用相互原则吧！比如说，如果你们想在北冰洋派驻自己的潜艇舰队，那我们就在我们的领土上给你们提供基地，而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将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领土上拥有我们潜艇的基地。”“不行，我们也不同意这个建议。各国的武装力量都应只驻扎在本国的领土上。你的建议对我们是个侮辱，我们不能同意。”“算了，如果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想坚持自己的建议了，我们将用自己现有的条件凑合好了。我们要加强远东舰队。我们想用新式武器装备它和大大加强它，使我们的潜艇舰队成为太平洋上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我们又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

感事情。这以后我更加明白了毛在我们的交谈中遵循的是什么原则。看来,我们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是枉费心机。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不会为自己制造困难,不会向毛提出这个请求。但泼出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我知道,在类似问题上需要特别守规矩。现在我非常理解这种情况。不能损伤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国家尊严。存在主权问题,能让出主权吗?只有在双方完全同意情况下才能谈这个问题,但如果不是非常需要的话(例如,对缔约双方存在战争威胁时),最好是避开这个问题。总的说来,主权问题在很长时期还会是世界上产生分歧的焦点,并会在其意外浮现时给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造成明显的损害。

一天,在游泳池边,毛也谈起了这种性质的话题,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现在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学过算术,我算出中国约有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这么多师,苏联有2亿人口,它可以组建这么多师。”是的,是存在某种标准,他的算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他用一般方法计算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动员多少人服兵役。然后他开始计算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国家能动员多少个师,结果很少。他说:“你瞧,怎样的力量对比啊!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样的推论符合他1957年在国际兄弟党会议上提出的论点,当时毛说,对中国来说,损失3亿人,也就是人口的一半,并不是什么悲剧。而现在他又提出了那个问题,并用计算方法加强自己的论点: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他没有直接说,根本就不需要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但若是思考一下就可以得出,他的论据恰恰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毛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和平共处问题,而是备战问题,无论这场战争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多大损失,都要打垮我们的敌人。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的算法大家都清楚。但还要注意到，如果我们生活在以前的时代，即进行肉搏战或长矛、刺刀等冷兵器战争的时代，数学算法是正确的。以前就是这样，谁手中有大棒，谁就占优势。但现在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机关枪刚一出现，就使双方的力量变得有些均等了，然后力量对比又变得有利于拥有大量机关枪的一方。后来出现坦克和飞机的时候，力量对比彻底改变了，取胜的已经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最先进的军事工业并能够保证自己拥有新式武器的一方。现在我们有导弹和核武器。世界大战可能是核导弹战争。而核导弹战争可以毁掉一切，一个炮弹就能清除几个师。所以师的数量多少，现在不是实力的标志，而不客气地说是供宰割的人肉。因此我们对战争问题持另一种态度，不是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力量对比。

我们现在在加快发展工业，特别是核工业和导弹工业，以免措手不及。我们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新式武器，肯定敌人也会装备这些武器。我们的假想敌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拥有很强大的工业和很高的技术水平。”“不对，我还是认为，你错了，在力量对比上，决定的因素仍然就是人口数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论怎么说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他说他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我们未再重复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样做没有用。

毛还谈到一个问题。我们曾在报纸上发表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一个声明。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发表一个声明。我们起草了这样的声明并授权朱可夫同志发表。声明的思想是在于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它侵犯某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要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侵略者以反击。毛现在引用朱可夫的讲话说，他认为这个讲话是不对的。我问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不是朱可夫个人的观点，而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正是在那个时候中美关系紧张起来了。“我们的

坚定立场可以抑制帝国主义者。他们将知道,进攻我们的一个盟国,无论是中国还是阿尔巴尼亚,都不会不受到惩罚。当时朱可夫的声明首先涉及到与资本主义世界接壤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毛说:“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于是他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将自己作战,打10年、20年,我们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如果敌人卷入同我们的战争,那么他就有来无回。我们自己就能战胜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同中国打仗多年,他们入侵的结果是什么呢?敌人要破坏我们的经济?那就让他来破坏吧。最重要的是保存苏联。如果苏联在,并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那么以后一切都会得到恢复。中国能战胜敌人并借助于你们的帮助恢复经济。因此根本不必使苏联遭受同帝国主义阵营作战的危险。”瞧,他如何转弯的:好像中国准备自己作出牺牲,以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够保存下来。

我说:“如果我们将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义务,并让每个国家只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敌人就会一个一个地对付我们。这种态度会鼓励侵略而不是制止侵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发表声明,我们将在自己的政策中坚持声明的立场。这不是国防部长的提法,而是我们政府、我们党中央的提法。”毛回敬说:“这是个错误的提法。”到此对问题的讨论结束了。每个人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再次会晤时谈的是军事问题,带有另一种性质。我要说,毛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但与以前的意见如出一辙。

“我考虑了我们上次的谈话,并得出结论:如果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那我要建议你们不要给以反击”。我立刻警觉地问: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而我们不应给以反击?“那会是什么结果?”“你们要步步撤退,撤退1年、2年、3年,拉长敌人的交通线,从而削弱他,然后我们一起向他发起攻势打败他。”我对他说:

“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你,对我们来说,这样理解问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撤退1年?下一次世界大战恐怕未必能持续1年时间,它可能是很快就过去的。”毛继续说:“你们不是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整整撤退了2年,为什么你们现在就不能撤退3年呢?如果说那个时候你们能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那么现在就可以撤到乌拉尔,撤到西伯利亚,接下去在你们的后方有中国。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领土,当然能打败敌人。”我回答说:“不,我们持另一种态度,立即进行反击的态度,一旦发生侵略行径,我们将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以反击。我们现在拥有很强的实力,拥有很大的技术潜力,并且在逐年增大。反击的必然性会迫使敌人在下决心进犯我们之前要三思。也许侵略行为会被彻底排除。”他又说:“不会的,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

后来我反复思考,他的观点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我不知道可以怎样评价这种态度和推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毛怎么能这样思考问题呢?我无法回答自己。如果说这是他的挑衅的话,那我不认为毛会作出这样粗鲁和愚蠢的挑衅。我们不会幼稚到这个地步。他怎么也不能设想我们会赞同他的意见。如果他本人相信自己对军事战略的推论是正确的,那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能这样思考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现在也完全是个谜。所以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是考虑不周还是挑衅?但这次谈话是进行了。我完全为我所转述的毛的表达法和我的回答的准确性负责。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任何篡改。我根本不想这样做,为了什么呀?与中国相干的事够多的了,我不想再添乱,相反,什么时候我死去,如果人在死后还能想事情的话,那我会想到苏中两国人民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关系又得到恢复的那个幸福的时刻。

## 李敦白谈修订和翻译 《毛泽东选集》的一些情况

程 慎 元 译

译者按：李敦白(Rittenberg)，1921年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1940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5年9月来华，1946年10月到达延安。经王震、李先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专家。“文化大革命”中，因“特务”问题被捕入狱，1977年无罪释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回美国定居。1978—1982年，公安部两次为李敦白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补发工资。1997年9月，日本筑摩书房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一个为毛泽东魅力吸引的美国人》。现将其中有关修订和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情况摘译如下，供研究参考。

1960年初，梅益<sup>①</sup>同志告诉我，中央决定要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第4卷翻译和1950年伦敦英文版1—3卷修订小组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有14名成员。中国翻译家9名，外国专家5名。中国翻译家有冀朝鼎、冀朝铸、徐勇英、吴文涛、钱钟书、裘克安、陈翰

---

<sup>①</sup> 梅益，广东潮州人，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笙、程镇球。C·Y·W·孟<sup>①</sup>是组长，唐明照是副组长。程镇球兼任秘书和联络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翻译界的优秀人才和著名人士。C·Y·W·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46年在聂荣臻和贺龙安排下我从张家口向延安转移时，曾和孟同行，可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唐明照曾在纽约从事过左翼革命活动，现任中央联络部的英文翻译。冀朝鼎既是学者，又是政治活动家，书法家，还是古代家具收藏家和李约翰中国科学文化丛书的出版设计人。冀朝鼎的异母兄弟冀朝铸是外交部的著名译员。徐勇英是外交部中南美洲司司长，吴文涛是外文出版社的负责人，钱钟书毕业于牛津大学，是著名莎士比亚研究家，裘克安是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陈翰笙出身于牛津大学，是中共著名历史学家。程镇球也是牛津大学出身的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在5名外国专家中，有英国人夏比罗(Michael Shapiro)，他是英国伦敦斯蒂夫尼奇的共产党议员，现在是新华社专家。英国人易·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出生于波兰，还在幼儿时期就来到了中国，在天津英国人学校念书，他是左翼中国历史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的资深编辑人。专家中的美国人有3个，一个是福兰克(Frank Coe)，他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罗斯福任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任要职，以后任国际基金会秘书长，由于抵抗麦卡锡主义者调查而来到中国；另一个美国人是福兰克的友人苏·阿特兰(Sol Adler)，他出生于英国，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财政部服务，以后加入美国籍。再一个就是我本人了。

在这个专家小组之下，还有一个从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由中国优秀翻译人才组成的初译小组，他们集中在郊外的迎宾馆办公。每隔两三天，由专家组的秘书程镇球把初译小

---

<sup>①</sup> 为孟用潜——编者。

组的译稿送到我们在原法国大使馆的办公地点，专家组根据毛泽东原著对初译稿进行字句、文体、语气、准确性方面的加工整理，并最后审定。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埃德加·斯诺还在30年代就把毛泽东称作中国的列宁，与苏联决裂的今天，中国更把毛泽东推崇为超越了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言人。我们抱着如同翻译第五福音书那样的神圣心情翻译着《毛泽东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我们拼命地努力工作，以便把毛泽东的声音，把中国革命的经验传向全世界。我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大家坐在长条桌子旁边，两个人一个小组，对译文进行一行行一句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以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向大组报告，进行集体讨论，实在弄不懂的，由程镇球记下来，交组长转党中央请示毛泽东本人。工作进行得非常严肃、认真，有时一天只能审定半页，对于特别难译的哲学著作，有时一天只能进行一两行。

小组的工作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各抒己见，有时为一个词、一个字也要争论得面红耳赤、吐沫四溅。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每个人受的教育不同，生活地域语言习惯不同而导致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冀朝鼎、C·Y·W·孟长期生活在美国，他们是美国式的英语，他们坚持认为，宣传革命是最高的原则，重要的是流畅、富于表现力，强调调动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力。唐明照和徐勇英则强调译文必须准确表达政治内容。这样在小组内就产生了“意译”和“直译”的争论。我在小组中是比较挑剔的，主张“直译”。我自认为自己的汉语很好，对毛泽东的著作理解比较深，从文体到文意都比较有把握，所以，有时我对本来已经译得很不错的译文也要挑出一起“毛病”来。有一次，气的唐明照大发脾气，骂我是“最坏的译法”！但为了坚持正确地向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

们谁也不计较彼此的态度。有一次讨论毛泽东著作中一篇比较复杂的文章时,我一时疏忽,说走了嘴,说译文尽管比原著清晰、明白,但不能模棱两可。这话一出,马上受到了几个人同时瞪着眼的严厉批评:你错了,译文应忠实原文!有一些难题,经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的也让人捉摸不透。比如《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论述土地改革的文章<sup>①</sup>,其中有一句:不能杀太多的人,不能毫无目标的杀人。请示毛泽东本人,什么叫杀太多的人。毛泽东回答说,即使多杀一个人,也是杀了太多的人!

还有一次,在审查、修订1950年伦敦版《毛泽东选集》时,决定对其中的《矛盾论》一篇进行重新翻译。但对“矛盾”一词的译法产生了分歧。“矛盾”一词在英语中是把“矛”与“盾”联结在一起的意思,即“contradiction”,但在英语中,这个词有“单数形”(contradiction)和“复数形”(contradictions)之分,而汉语中则没有复数形。我和几个人认为,矛盾是一种状态,是一般概念。由于该文中说宇宙中充满了矛盾,这样矛盾状态的本质就不够明确了。那么,我们主张在标题上用单数形,在全文中就不能用单数形。另一些专家则认为,由于矛盾的概念是毛泽东文章中的中心思想,只能使用单数形,而不应该使用复数形。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争论了好几天,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看法,根据“矛盾”一词在文章中使用的不同情况,使用哪种“形”最好,就使用哪种“形”,不必强求一律。

毛泽东的语言非常丰富。翻译毛泽东文章中的乡村俚语最让人劳神。毛在一篇不太长的演说中使用了一句湖南俚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如何翻译这句话使我们争论不休。有的专家认为“懒婆娘”可以译为“slut”,我觉得“slut”在英语中有“卖春妇”和

---

<sup>①</sup> 指《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3—1284页。

“淫乱之女”的意思，而毛的文章中不含这两层意思，如果用“slut”就是指“破鞋”或“野鸡”了，所以我主张使用 slattern。牛津大辞典支持使用 slut，美英大辞典的解释则支持使用 slattern。为此我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互不相让。最后经多方请教才确定下来，还是使用 slattern 为好。

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是非常有乐趣的。他的文章和中国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比较，具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特点，他不仅吸收了孔子的思想流，而且很早就读过罗茨克 (Locke)、卢梭 (Rousseau)、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等人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常常充满了美好未来世界的梦幻，并用这种梦幻来实现其认识自然规律、清除自私自利欲念的理想社会。他比较喜欢使用的语言中就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用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的说法；他使用最多的句子是“为人民服务”。我认为毛泽东既是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充满理想与梦幻的大人物。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的问题。我主张把“服从”一词译为 obedience，因为中国语的“服从”，本来就是 to obey 的意思。唐明照坚决反对使用 obedience，他批评我不理解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党员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在党已经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即使党员认为是错误的，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反对，党员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应在适当时机向上级反映，“obedience”这个词相当消极、被动，没有强调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互相关系，应该使用更合适的词“compliance (应诺)”这个词。大家争论的结果，最后采纳了唐明照的意见。毛泽东的文章在论述共产党员应该独立思考时说，共产党员对什么事情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绝不应该盲从。通过我的观察，毛泽东在这方面是能够率



先垂范的。例如，他早年就与斯大林发生过对抗，现在又采取了抵制赫鲁晓夫的路线，这些抗争，在党外是长期不为人所知道的。我为了能够真正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必须保持批判精神，坚持真理，既使面对千夫所指，我也应该有知难而进的勇气。

在《毛泽东选集》翻译小组里，大家虽然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很激烈，但大家团结的很好，亲密无间，一起吃饭，一起娱乐，其乐融融。我本人也从翻译、审定毛泽东的文稿中得到了学习与教育，这是我一生中的极大的光荣。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我们在1962年冬天，圆满完成了《毛泽东选集》1—4卷的译审任务。1964年1月，毛泽东在勤政殿接见了翻译、审定小组的全体成员，与我们共进晚餐，犒赏我们为译审《毛泽东选集》所作出的贡献。

# 新中国军衔制概览

谭 铮

军衔制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于 1955 年至 1965 年实行军衔制度,1988 年起恢复军衔制度。

## (一)

1955 年 1 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1955 年 2 月 8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并公布实施。1955 年 9 月全军评定军官军衔工作基本完成,1955 年 10 月 1 日解放军开始佩带军衔标志和军兵种、勤务符号,并按新的服装制式着装。1965 年 2 月 18 日,全军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工作。1965 年 5 月 22 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并于 1965 年 6 月 1 日在全军实施。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分为 5 等 15 级,即元帅 2 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 4 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 4 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 4 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和准尉(授予副排级干部)1 级。军士军衔分 3 级:上士、中士、下士。兵的军衔分 2 级:上等兵、列兵(海军为水兵)。

军衔评定的基本标准是：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副、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副、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少数评为中尉；副排级，任军官职务的可评为少尉，任军士职务的评为准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授予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

这一时期，军官军衔的晋升规定是：1955年规定大尉晋少校、少校晋中校、中校晋上校3年；上校晋大校4年；大校以上按职务和功绩选升。1963年改为大尉晋少校、少校晋中校、中校晋上校4年；上校以上按职务和功绩选升。

校级以上军官最高服役年龄为：少校（现役42岁、海军43岁，预备役50岁），中校（现役46岁、海军47岁，预备役55岁），上校（现役50岁、海军51岁，预备役55岁），大校（现役50岁、海军55岁，预备役55岁），少将（现役55岁，预备役60岁），中将（现役60岁，预备役65岁），上将以上不作具体规定。

这一时期，评授和晋升高级将领军衔的情况是：

1955年9月23日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海军）、张云逸、罗瑞卿（公安军）、王树声、许光达（装甲兵）等10人为大将军衔。

1955年9月27日授予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等55人为上将、海军上将、空军上将、军法上将军衔；1956年1月和1958年3月各补授上将1人。

1955年9月授予徐立清、萧向荣、张经武、张震等175人为中将、军种、兵种、专业勤务中将军衔；1956年1月和1958年3月各补授中将1人。

1955年9月授予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等802人为少将、军种、兵种、专业勤务少将军衔；1956年补授少将1人，1957年补授少将2人，1958年补授少将1人；1961年由大校晋升陆军、海军、空军少将218人，1962年由大校晋升少将12人，1963年由大校晋升少将3人，1964年由大校晋升陆军、海军、空军少将320人，1965年由大校晋升少将1人。授予和晋升少将共计1360人。

在这1614位将帅中有女少将1名；另有侗族、壮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畲族、塔吉克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39名高级将领被授予和晋升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外国人(越南京族)1名被授予少将军衔。

## (二)

为适应新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部队的需要，根据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有关规定，1988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七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我国开始恢复军衔制。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七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并于1989年1月1日施行。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分为3等11级，即将官4

级(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3级(上尉、中尉、少尉)。根据军官所属军种和技术特点,在海军、空军和专业技术军官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名称。士官军衔分2等2级,军士长(经军事院校培训,担任基层行政或专业技术领导管理职务的志愿兵)、专业军士(服现役满5年以上,自愿继续服现役,经批准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职务的志愿兵)。军士军衔分3级:上士、中士、下士。兵的军衔分2级:上等兵、列兵(海军为水兵)。其中军事军官、政治军官、后勤军官的军衔设少尉—上将10级,专业技术军官的军衔设少尉—中将9级。

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修改为:将官3级(上将、中将、少将);士官军衔分2等8级,即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指义务兵经考试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培训毕业后,提升成的志愿兵)和四级专业军士、三级专业军士、二级专业军士、一级专业军士(指服现役满5年,已成为部队专业技术骨干超期服役的义务兵,根据部队需要和本人自愿申请,经师以上机关批准改成的志愿兵)。

1988年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中央军委委员,上将—中将,基准军衔为上将;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上将—中将,基准军衔为上将;大军区级正职,上将—少将,基准军衔为中将;大军区级副职,中将—大校,基准军衔为中将;正军职,中将—大校,基准军衔为少将;副军职,少将—上校,基准军衔为少将;正师职,少将—上校,基准军衔为大校;副师职(正旅职),大校—中校,基准军衔为上校;正团职(副旅职),上校—中校,基准军衔为上校;副团职,中校—少校,基准军衔为中校;正营职,中校—少校,基准军衔为少校;副营职,少校—上尉,基准军衔为上尉;正连职,上尉—中

尉,基准军衔为上尉;副连职,上尉—中尉,基准军衔为中尉;排职,中尉—少尉,基准军衔为少尉。

1994年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修改为: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上将;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上将;大军区级正职,上将—中将军;大军区级副职,中将军—少将军;正军职,少将—中将军;副军职,少将—大校;正师职,大校—少将;副师职(正旅职),上校—大校;正团职(副旅职),上校—中校;副团职,中校—少校;正营职,少校—中校;副营职,上尉—少校;正连职,上尉—中尉;副连职,中尉—上尉;排职,少尉—中尉。

1988年12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命令,并签署颁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具体办法》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并结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警衔分为3等9级,即将官2级(中将军、少将军),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3级(上尉、中尉、少尉)。规定警官和专业技术警官在警衔前分别冠以:“武警”和“武警专业技术”名称。士官警衔分2等2级,即警士长、专业警士。警士警衔分3级:上士、中士、下士。兵的警衔分2级:上等兵、列兵;规定在士兵警衔前冠以“武警”名称。现役警官参加评衔的范围为:武警总部、各总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挥所)、院校;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警卫部队;武警水电指挥部、黄金指挥部、交通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武警森林警察总队。

1994年武警警衔修改为:士官警衔分2等8级,即四级警士长、三级警士长、二级警士长、一级警士长和四级专业警士、三级专业警士、二级专业警士、一级专业警士。

1995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升格为大军区级,其警衔修改

为：将官 3 级（上将、中将、少将）。

1988 年武警现役警官职务等级编制警衔为：武警部队司令员、政委，中将—少将；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副政委，中将—大校；武警部队正军职以下警官等级编制警衔与同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相同。

1995 年武警现役警官职务等级编制警衔修改为：武警部队司令员、政委，上将—中将；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中将—少将；武警部队正军职以下警官等级编制警衔与 1994 年修改后的同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相同。

军（警）官军（警）衔的晋升，1988 年规定上尉晋少校、少校晋中校、中校晋上校、上校晋大校 4 年；大校（含预备役大校）以上按职务、德才、贡献选升。

授予军官军衔，上将—上校（预备役少将、预备役大校）由中央军委主席批准授予；副师职（正旅职）及以上军官晋升为大校及以上军衔的和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军官晋升为大校及以上军衔的，预备役上校晋升预备役大校、预备役大校晋升预备役少将的，由中央军委主席批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职务的军官晋升上将由中央军委主席授予。正师职以上军（警）官职务由中央军委主席任免。

授予警官警衔，中将—上校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批准授予；正师职及以上警官晋升为少将及以上警衔的和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警官晋升为少将警衔的，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批准。

1988 年 9 月 14 日，中央军委授予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朝鲜族）、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等 15 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授

予李耀文海军上将军衔；授予王海空军上将军衔。9月16日，中央军委授予丁衡高、于永波、马伟志等95位高级军官中将军衔；授予马辛春等19位高级军官海军中将军衔，授予于振武等31位高级军官空军上将军衔。授予何其宗等1251位高级军官少将、海军少将、空军少将和专业技术少将军衔。9月16日—30日，全军各部队分别在驻地举行授衔仪式。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从1988年10月1日起开始佩带军衔标志，着穿新式军服。

以后全军每年进行一次集中授衔和晋衔工作。

1989年1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首批高级警官授予武警将官警衔。李连秀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张秀夫等29位高级警官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1月22日—31日，武警其他直属部队和各总队的授衔仪式分别在驻地举行。武警部队从1989年2月1日起开始佩带警衔标志，着穿新式警服。

以后武警部队每年进行一次集中授衔和晋衔工作。

截至1998年，新军衔实行以来共授予和晋升上将军官55名，晋升武警上将警官1名；授予和晋升中将军官在330名以上，授予和晋升武警中将警官15名；授予和晋升少将军官在2500名以上，授予和晋升武警少将警官在170名以上。至少有18位女高级军官被中央军委授予和晋升为中将、少将、专业技术少将、海军少将和武警少将军(警)衔；至少有朝鲜族、满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白族、藏族、回族、壮族、彝族、侗族、苗族、土家族、鄂温克族、畲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50多位高级军官被授予和晋升为上将、中将、空军中将、少将、海军少将、空军少将、专业技术少将和武警少将军(警)衔。